



引用格式:郑忆石.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畴厘定与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升[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6):1-8.

中图分类号:B0-0;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6.001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6-0001-08

# 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范畴厘定与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升

## Definition of the scope of Marxist philosophy research and promotion of ideological discourse power

郑忆石

ZHENG Yishi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 上海 200241

**摘要:**当下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巩固和提升,有赖于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拓展其研究视域,深化其研究层次。拓展与深化,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面临的诸如意识形态与科学、现实与思想、理论基质与研究异质、宏观整体与微观局限等的辩证关系。唯有如此,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才有可能进一步落到实处。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  
辩证关系;  
意识形态话语权

收稿日期:2017-10-20

作者简介:郑忆石(1954—),女,浙江省温岭市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2013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将“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到了“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sup>[1]</sup>的高度。同年的12月16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而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权和话语权,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定为新时期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重大战略任务。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sup>[2]</sup>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从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同一问题所作的系列讲话中,足见我们党对意识形态主导权和话语权问题的高度重视。

意识形态主导权和话语权的增强,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巩固。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可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而且有助于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当今世界,高科技、智能化、新媒体、信息化,在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更频繁、更多维地与世界哲学接轨的同时,也使其面临着来自国外的各种意识形态的责难。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改革的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利益格局的变动、社会心态的变化……在促使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更进一步走进实践和现实的同时,也使其面临着来自国内的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广泛挑战。不少学者积极应对挑战,力图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分析和解决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突出

的问题:以价值中立抹平其理论宗旨、以学理性取代其现实性、以研究异质否定其理论基质、以微观分析消解其理论整体的研究倾向,在淡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特质的同时,也对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核心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消极影响。鉴于此,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些范畴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 一、意识形态与科学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意识形态,其价值指向是现实批判性与阶级性的统一。哲学在阶级社会中是以意识形态的形式而存在的,体现着一定阶级的利益并为之服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宗旨是通过揭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在代表最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中,为其指出改变自身命运的方向和途径,因而它蕴含着强烈的阶级性。因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通过对“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物质武器”与“精神武器”<sup>[3]</sup>等辩证关系的阐明,揭示了无产阶级与革命理论的相关性,凸显了哲学的阶级属性。在标志新哲学诞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更是通过对新旧唯物主义“立脚点”<sup>[4]</sup><sup>499</sup>的比较,直接表明了其哲学为无产者和人民谋利益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强烈价值取向,彰显了它的意识形态性。当然,当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性时,必须承认它与政治、法律等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是有区别的:在对社会物质经济基础的依存上,其意识形态性有间接折射与直接反映之分;在与社会阶级利益的关系上,其意识形态性有价值取向上的隐晦淡漠与显见强化之别;在理论的学术性程度上,其意识形态性有表现形

式的重理性思辨与重理想信念之异。这种与意识形态的若即若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出双重特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始终代表和体现着无产阶级的利益与愿望,强调关注现实付诸实践;作为系统化的世界观,它对现实的关注和反映,有学术性与非学术性的研究方式之不同。前者把对现实的反思与对理论的深邃思考相结合,后者则将关注度主要置于对现实政治政策的诠释解说。由于两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极易混淆,因而往往导致人们在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出现两种彼此对立的错位:或因其意识形态性而抹杀其科学性;或因其科学性而否认其意识形态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它要求客观地和辩证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实事求是地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历史的本来面目。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其意识形态性中又包含着派别性。这种派别性与阶级性之间存在着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哲学的派别性,是指它所具有的认识论属性,即划分哲学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基本标准。哲学的阶级性是指它的政治属性,即作为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性中,若仅将其派别性作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划分标准,其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之间不存在矛盾。因为这里的派别性仅仅限于表明,当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时,应当按照其本来面目对之反映,遵循事物的基本规律行事,要避免主观臆断、率性而为,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派别性原则的贯彻,将有助于实现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派别性,是认识的坦途而非歧路,是正确的理论原则而非简单的对错标准,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的集中体现。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性中包含科学性,科学性中富有意识形态性,但

是,两者各有所指,不能随意混淆。因此,决不能将认识论领域的问题与政治生活领域的问题等同,更不能在政治的意识形态性与哲学的派别性之间划等号,进而将哲学的派别性等同于政治的阶级性,将它作为哲学中划分理论的阶级属性的标签随意乱贴。若如此,必将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丧失其客观理性立场,由具有意识形态意蕴的科学理论,沦为打击政治对手或作为纯政治说教的工具。

因此,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时,不是要让它远离政治、疏远意识形态,而是要让它客观地反映实践、回归现实的具体问题,提升其理论的科学性;同样,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意识形态时,不是要让它变为政治的传声筒、应声器,而是希求它对现实问题的剖析必须上升到学理高度,即在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高度上实现其价值。

## 二、现实与思想

“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与“思想力求成为现实”<sup>[4]13</sup>,是马克思对哲学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基本要求。

现实的清醒度源于思想的深刻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坚守理论的学术诉求。尽管马克思明确反对纯粹思辨的哲学,强调真正的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实践接触并相互作用”,而且强调哲学的学术性与现实性之间不可分割。但是,他并未否认作为汇集“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的哲学是通过“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的,并在强调“哲学的世界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同时,又强调“世界的哲学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sup>[5]</sup>因此,警惕与防止以通俗性贬低规范性、以有用性淡化价值性、以现实性否定学理性、以经验性代替超验性,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

哲学研究传播与扩大思想影响力、阐释与建构思想体系的路径。否则,不但将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浅薄化、流俗化,而且会降低其思想水准和理论声誉,消解其作为真理的辐射力、穿透力。

思想的生命力源于对现实的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性,决定了对其的研究应实现思想与现实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通过强调自己的理论,只是提供研究的“某些方便”而“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时代的药方或公式”<sup>[4]526</sup>,是“研究历史的指南”而不是“现成的公式”<sup>[6]583</sup>,是“方法”而“不是教义”<sup>[6]691</sup>,通过指出理论最终目的在于“改变世界”而非仅限于“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sup>[4]506</sup>,明确强调其理论如何转化为现实的途径,表明了其对于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态度。因此,思想如果不关注和回应现实,它便没有活力并难以产生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将导致理论与现实的逐渐疏远和相互隔绝,最终沦为马克思所蔑视和批判的书斋哲学或纯思辨理论。

当下,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方面,尽管“面向中国现实”已经成为共识,但纯学院化的探求路径,以及迷恋文本、将经典著作绝对化的做法,又将现实消弥于纯思辨中,从而程度不同地割裂了思想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主旨,在领悟思想与现实之间的辩证联系中,辨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所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般哲学所言的现实——“对历史发展趋势的表征,内涵了总体性的理论把握和理想性价值诉求”——并无二致,而“‘现实’本身就内在地蕴含着‘思想’”<sup>[7]</sup>。因此,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主旨,需要更多地将研究的关注点对准那个富含理论涵盖力和实践活力的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通过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话语与现实生活

之间的关联,在探求和摸索学术研究达致现实生活的路径中,实现从“面向思想”向“面向现实”的转换。

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巩固,需要理论在把准现实问题的命脉中,展示其深刻独到性并回答现实问题。在当代中国,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因此,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代表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应的意识形态面貌出现时,致力于现实与思想的统一,将为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有力的思想武器。

### 三、理论基质与研究异质

反思既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封闭、独断、教条、僵化的倾向,致力于研究的开放、多样、个性并形成新的研究趋势,是学界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科学研究中思想认识上的飞跃,它对维护、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声誉和研究视域产生了积极作用。然而,当这种新的研究趋势走向极端,并在“平权解读”的吁求中形成千人千面的解读模式和理解结论时,这种致思路径和研究方式便不可避免地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质疑,进而导致根本怀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和价值性,从而削弱、消解其理论基质的后果和危机。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质,我们可以从研究旨趣、研究层面、存在形式三个层面来理解。

就研究旨趣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其所蕴含的价值属性,三者具有内在一致性。从研究对象来看,其理论宗旨是基于并最终归结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从研究方法来看,它强调只有运用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才能真正阐明无产阶级的

本质及其解放路径。通过强调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和根本方法对于研究结论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了其哲学内蕴的价值旨归的所指与所能。

就研究层面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肯定其研究有着学理与应用两个层面的区别,即肯定无论哪个层面的研究都存在着学理性与现实性两个维度,区别只在于侧重点不同,但是,究竟以何为研究的立论基础、分析方法、价值取向?这是两个层面的研究都无法回避也绕不开的问题。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研究的学理性是以承认和肯定其中的基本价值取向为前提的。因此,以研究的学理性为由,以貌似公允的、不偏不倚的所谓“中性”立场,或者以看似客观纯粹的自然科学实证方法,去回避和拒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将淡化、抹杀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理论基质。

就存在形式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异质与同质的矛盾复合体。从整体看,它以复数形式展现了研究形态的异质性、多样性;从局部看,其具体研究又因其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使“极端相反的性质能在同一事物里相互结合”<sup>[8]</sup>,并在各自有别的异质中体现着某种共性。这种共性作为事物的基质,舍弃了事物表面的杂多而具有抽象性,它作为思维抽象的产物是事物“何以为此”的内在根据。因此,如果说研究的异质性有助于避免各种研究落入空洞思辨的陷阱,那么研究的同质性则因它作为思维的具体,它本身是思维抽象的产物和对研究对象同质的揭示,而有助于避免异质研究陷入自说自话、莫衷一是的困局。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质与研究异质的统一,需要明晰和坚持理论导向的一元性与研究方式的多样性之间的辩证联系。

首先,激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生

机,必须认真吸取改革开放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理论导向的一元性否定和取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个性化、异质性、多样性研究的教训,在开放性的研究环境中展开其研究。同时,应警惕和防止以所谓个性化、异质性的研究为由,完全否认理论导向的引领价值,避免沦入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性的危险。此外,还应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引领视为乃至等同于单纯的意识形态,因为这将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丧失其反思批判、人文意识、理想超越的特性,丧失吸引力并导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旁落。

其次,我们应正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哲学都没有也不可能摆脱或避免政治的“干扰”和“打搅”。历史上的中外哲学,哪怕是最远离生活的纯学术研究,都无不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从而根本难以彻底逃离政治的“侵扰”。事实上,现实政治对哲学的深刻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哲学没能彻底避免意识形态的“干扰”而“洁身自好”的这一事实表明,哲学的研究无论看起来多么远离社会现实,其结论仍然或多或少地蕴含着某种价值取向,从而不可能与现实生活(包括现实政治生活)彻底划清界限。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政治意识形态,也非“楚河汉界”。承认这一点,并非表明只有以理论引导的一元性代替研究异质的多元性,并将这种一元性绝对化,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正确途径。承认这一点无非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执政党和国家的思想建设之基,具有为党纲和国法所确定的特性,它既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选择,又在意识形态领域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先天”政治印记,表明了它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所具有的鲜明政治性。因此,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而言,坚持理论基质即坚持理论

导向的一元性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而这一坚持本身也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与现实政治之间所具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承认这一联系,不表明只有回避现实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才能回归其学术本性。如若看不到这一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将在迷失其理论原则中,逐步失去其作为意识形态之理论引领的话语权力。

#### 四、宏观整体与微观局部

宏观整体性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原则之一。对此,马克思通过维护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是“总体的观点”,即“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是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因素”<sup>[9]</sup>,表明了自己对宏观整体性原则的肯定。基于这种整体性的研究方法,马克思通过考察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形态、要素结构与其变迁史,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所体现的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的辩证关系,破解了“历史之谜”。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诞生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哲学的思辨抽象,从宏观视域描述和阐释了人类历史不同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演变逻辑,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本质、动力、规律与发展趋势。在被看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宏篇巨制的《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从纵向与横向相统一的维度,在剖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的同时,再次从宏观角度论证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本质、动力、规律与发展趋势。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需要辨析宏观整体与微观局部的关系:这里的“宏观整体”是指,研究者作为社会成员,其研究结论所体现的理论基质或所贯穿的具有全局性的理论见解;这里的“微观局部”是指,研究

者作为个体,其研究活动所呈现的个性化、多样化的特征。

宏观整体蕴于微观局部,后者包含和构成前者。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宏观整体性研究基于学者各自的局部性个体化研究。因为哲学对于现实生活的思考,“从来都不是一种对精神之外的材料的简单接受,而始终立足于自身的活动,立足于一种内部的再造,即通过创新性精神而获取的、按照根据与结论而进行的理性明察的内部再造”<sup>[10]</sup>。现实中,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和探索,无疑都是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运用各异的理论素材和思维范式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各自有别的关注重心、研究方式、研究特点,以及由此形成的各具特色的研究风格,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各美其美”。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繁荣多彩,离不开不同研究者的不同视域、多维方向。

微观局部体现宏观整体,后者统摄前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宏观整体性研究,要通过“一总多分”<sup>[11]</sup>来体现。“一总”即研究中体现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多分”即具体研究要以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为引领。但是,无论具体研究的内容有多大差异,形式有多么不同,它们仍然不能回避一个最为基本的课题,即如何从现实实践和时代面临的问题中提炼出本质性和规律性的东西,以便能够借助它举一反三而把握全局,这就是认识的宏观整体性问题。在认识过程中,如果没有对这些具有宏观整体性问题的认识 and 把握,既不可能真正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全貌,也无助于拓展研究的范围、深化研究的层次。反之,对研究对象与其问题的宏观整体的认识与把握,有助于使整个研究实现寻路入境、由点到面、由表及里,从而步步深入事物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展现其“各美其

美”的同时,还蕴含着“美美与共”的理论基质,以及一些关涉理论整体的观点。这一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是通过“哲学的创造性与哲学家的自我实现融为一体”<sup>[7]</sup>的方式,实现研究的宏观整体性与微观局部性的统一。

基于宏观整体的研究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从历史条件与现实关系、社会环境与主体的人、理论逻辑与实践问题等角度,去考察研究对象,并从微观局部的问题中提炼出带有宏观整体的认识结论。为此,需从理论领域和理论范式两个方面入手。

就理论领域方面而言,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着的有机整体出发,致力于考察其系统性与综合性,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考察视域上应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力求实现学科的相互融通。具体而言,即在揭示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含的经济要素、政治要素、社会要素、文化要素的同时,凸显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这种揭示和阐释,在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性的同时,显现其结构的整体性。

其二,考察方向上应消除内容之间的隔绝,力求实现内容的相互补充。具体而言,即在梳理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轨迹、基本理论、经典文本、实践转化等内容时,分析和论证上述内容之间的相互关联。通过这种分析和论证,在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纵向与横向之间关系的同时,突出其内容的整体性。

其三,观察点上应避免对重大问题的关注盲区,力求从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入眼、着手。具体而言,即在探讨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时,注重两者的结合与互动。通过这种结合与互动,在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辨理性与现实批判性的双重特质的同时,展现其理论品质的整体性。

其四,历史回溯上应注重理论研究 with 历史事实的互补。具体而言,即在阐述理论史时,通过文本逻辑(如马克思文本的早期、中期、晚期之间的联系)与历史逻辑(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欧洲理论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史和资本全球化以来的世界历史的关系)的相互映照,来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逻辑与时代发展的历史逻辑交互呈现的整体性。

就理论范式方面而言,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生俱来的反思批判性出发,致力于其观念的创新和范式的转换,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问题方面应以更为贴近现实的姿态,反思和揭示现实存在的重大问题为研究主导,改变一个时期以来醉心于纯书斋式、独学院化的研究态度。这种改变,既要继续坚持回归原典,透彻理解并全面把握其理论和方法的基本内核与精神实质,为分析现实问题提供正确的理论引领;又要俯身当代中国的实践,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展开研究,在发掘和阐明其哲学内蕴中,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中国视域。

其二,文本方面应以更为客观的态度,看待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原典,防止和避免以“我理解的”代替本原意义上的文本,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典置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语境中还原其文本真相,得出更符合创立者本意的解读结论。同时,应力求趋向文本解读与现实问题的互动,在互动中把握文本的历史语境与当下价值。

其三,体系方面应以更为严谨的方式,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完善。这种完善,既包括吸取传统教科书体系构建的经验教训,肯定其阐释和论证的基本原理所具有的价

值,也包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蕴含的其他理论之间建立一种有机的联系。在强调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地位时,不能隔断和否定作为本体论的实践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批判性时,不能漠视和淡化这一特性与人类解放的价值取向之间的高度统一。

其四,对话方面应以更为开放的姿态,致力于由“纯向外”向“再对内”之研究视角的转变。这种转变,既包括继续吸取和借鉴西方哲学文化的精华,又包括重视和关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精华,如儒家对人的内在生命、价值安顿、道性修养的强调,道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等。承认和肯定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理论资源,对于祛金钱崇拜、物欲至上、极端功利等现代之魅有重要作用。承认这些理论资源,对于当代中国重塑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具有借鉴作用。同时,应继续肯定和吸取西方哲学文化中那些有助于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资源。通过这种内与外的双重吸取,可以强化和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说服力与影响力。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通过反思既往封闭独断、教条僵化、单一同质的研究模式,逐步走上了开放活跃、多姿多彩与个性差异,从而更具客观性的研究道路。但与之同时,我们还需要警惕以相对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马克思主义影响力的削弱与消解。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域,深化其研究层次,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拓展与深化,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面临的诸如意识形态与科学、现实与思想、理论基质与研究异质、宏观

整体与微观局限等的辩证关系。唯有如此,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才有可能进一步落到实处。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105.
- [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17-10-18)[2017-10-20]. www.china.com.cn/cppcc/2017-10/18/content\_417523-99.html.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07.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9-220.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3.
- [7] 孙正聿,杨晓. 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J]. 哲学研究,2011(3):3.
- [8] 柏拉图. 巴门尼德斯篇[M]. 陈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7.
- [9]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78.
- [10] 胡塞尔.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M]. 倪梁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
- [11] 陈章亮. 六十年:现时代与哲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88.





引用格式:陈培永,严文波. 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演进与新发展理念的新意[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6):9-14.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6.00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6-0009-06

# 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演进 与新发展理念的新意

##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ory of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new idea of new concept of development

陈培永<sup>1</sup>, 严文波<sup>2</sup>

CHEN Peiyong, YAN Wenbo

1.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2. 江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坚持问题导向,致力于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理论,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到科学发展观,再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的思想和理念日臻成熟、不断完善。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要任务,同一个命题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意蕴和不同的侧重点。今天我们讲“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当然不能把发展狭隘地理解为仅指经济发展或生产力发展,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全面发展,是各个领域相互协调的发展。所以,发展仍然是硬道理。随着中国的发展向纵深推进,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必然随之凸显并变得错综复杂。在前期渐进式探索的基础上,我党又相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新发展理念,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客观实际,直指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更加突出了人民的主体地位,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了发展观以新的时代内涵,是我们党发展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关键词:**

发展才是硬道理;

科学发展观;

新发展理念

收稿日期:2017-09-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7CKS012)

作者简介:陈培永(1981—),男,山东省单县人,北京大学副教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严文波(1988—),男,江西省鄱阳县人,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 如何实现发展? 这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国情不断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的重要理论, 为扭转我国贫穷落后局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 适时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今天, 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发展的代价、问题和矛盾出现的时候, 有些人开始质疑发展理论、质疑“发展才是硬道理”, 甚至对发展理念的更新不屑一顾。鉴于此, 重思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进路, 不但是必要的, 而且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重大时代课题。

## 一、发展还是硬道理吗?

作为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推进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改革开放以来,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于中国贫穷落后的国情, 更加强调发展的重要性。邓小平所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简单明了却又厚重有力, 其要义为之后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所传承, 并根据时代的发展赋予其新的内涵, 如“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 “发展依然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等。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 是历史发展的助推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今天这样大的进步, 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得益于对发展问题的高度重视, 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近年来, 面对中国的发展状况, 有些人却对曾经坚信的发展理念产生了疑问: 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 发展还是“硬道理”吗? 还是“第一要务”吗? 比这种疑问更为严重和错误的还有另外一种观点, 即认

为中国今天出现的社会不公平和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 正是我们过去过于强调发展、不惜一切代价搞发展、为了发展什么都不管而导致的结果。

这些观点都是片面和错误的。道理很简单, 不能因为今天的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 就质疑当时讲发展讲错了, 就质疑发展是硬道理的正确性, 就认为是这一论断催生了今天中国的很多问题。俗话说, 不能因噎废食。在发展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不能因为出现了问题就认为坚持发展不对, 就认为过去的发展不对。任何发展都会伴随着一定的代价, 一点代价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发展是不存在的。上述对发展问题的理解之所以出现偏差, 是因为他们认定发展就是仅指经济方面的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发展。不过, 如此理解发展, 也是有一定根源的。考察这个命题提出的语境可知, 发展起初确实主要是指经济发展, 这是邓小平所极力强调的。他说: “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 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 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 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sup>[1]</sup> 这里所说的“发展”显然指的主要是经济发展, 而且是更偏向于效率、突出快的经济发展。这一论断与中国当时急于摆脱贫穷落后局面的客观状况密切相关, 因而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在经济水平比较低、不发达的情况下, 即使更加强调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发展(实际上也在同步进行), 也注定难获成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要任务, 同一个命题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意蕴和不同的侧重点。今天我们讲“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 当然不能把发展狭隘地理解成仅指经济发展或生产力发展。如果我们还把发展作这样的理解, 那就有损于这个论断的丰富内涵, 这样的“发展”确实也不应该再作为“硬

道理”。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发展”有着丰富的内涵。唯物辩证法认为,发展是事物质的飞跃,是事物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运动,不是事物在数量上的简单增加。具体到社会的发展而言,它不是指对社会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一种全方位的改造过程,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过程。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基本矛盾辩证运动的结果。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力量,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最终引发社会的变革。

发展最终要落脚到人的发展上,生产力发展只是人的发展的基础。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应牢记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的遵从。但生产力发展绝对不是社会发展的全部。一味追求生产力发展,会使社会发展失去方向。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以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转变的发展,因而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sup>[2]</sup>。这是中国在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发展,这里所说的发展不仅是指社会的全面和全方位的进步,还是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现。

当下,中国的发展正在走向全面发展,我们必须立足于时代发展这个新趋势来理解“发展”这个范畴。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并对生产力作了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阐释,赋予其更为全面的意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对生产

力标准必须全面准确理解,不能绝对化,不能撇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来理解生产力标准”<sup>[3]</sup>。强调要联系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来理解生产力,强调要联系生态环境来理解生产力,这充分说明我们今天所讲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是各个领域相互协调的发展。这也说明,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只不过,我们今天讲的发展是全面发展,而不是局限在经济领域的片面发展。

## 二、发展能解决发展后的问题吗?

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取得了辉煌成就,也付出了高昂代价。作为一个后发追赶型的发展中国家,在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中国肯定会比发达国家面对更多的发展问题。我们既要解决发达国家在过去曾经遇到的问题,同时也要面对它们当前正在遭遇的问题:传统发展问题与现代发展问题交织在一起。我们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发达国家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完成的社会变革,也必然要面对资源与环境的高强度开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就是发展的“时空压缩”现象。当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过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路时,也就把各种本应在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集中在了同一时空。

随着中国的发展向纵深推进,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必然随之凸显并变得错综复杂。对发展后会出现的问题邓小平早有预见,他晚年曾经说过:“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sup>[4]</sup>他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邓小平对“不发展的问题”和“发展起来后会出现的新问题”的区分和强调,对我们今天思考中

国的发展问题有着重大指导意义。

当代中国从不发展的状况中走出来,已经开始发展起来,成了名副其实的发展中国家,自然也就要面对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sup>[5]</sup>,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做是对发展后出现的新问题的回应。我们以前面对的问题如果说只是不发展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不仅仅有不发展的问题,还有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也就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如果说不发展的问题主要是普遍贫穷和落后,主要是生产力层面的问题,那么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则是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主要是生产关系层面的问题,当然还包括腐败问题、能源资源短缺、生态环境破坏、道德信念趋弱等问题。不发展阶段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发展起来以后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则就变成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即人们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更高层次的追求。

面对这种状况,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当今中国并不是说只有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已经没有了“不发展的问题”;不能因为看到中国的发展成就,就以为中国就可以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就可以以其他领域的建设为中心了。那些动不动以生态问题、公平问题、民主问题为理由来否定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人,实则是无视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无视一些边远地区和一些农村地区还比较落后的事实。只要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们就必须重视经济建设,必须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首要,着力解决不发展的问题。

因此,我们需要强调,发展仍然是解决当代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仍旧是当务之急、长远之

策,仍旧是中国目前最大的现实问题。所以,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如此表述,可能会被冠之为“发展主义”的恶名而受到批评。因为有一种观点认为,正是发展带来了那么多问题,还想再用发展来解决,怎么可能?怎么应对这种诘难?我们可以反过来问:如果说发展不能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难道要依靠不发展来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吗?不发展怎么能行?

因此,我们千万不要陷入到发展还是不发展的非此即彼的逻辑中,而是要以科学的发展理念来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断言:如果说“发展才是硬道理”是为了解决不发展问题而提出的,那么科学发展观就是为了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而提出的。用科学发展来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这与“发展主义”是两码事。

一谈到科学发展,有些人就可能不自觉地将其与“不管黑猫白猫”式的发展、“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发展对立起来,抱怨我们为什么不早一点儿科学发展呢?现在才讲是不是已经晚了?以今天的眼光来评价,以科学发展的标准去评判,当然很容易看到改革开放初期指引我们大力发展的这两个命题的局限。但我们不能由此而忽略渐进式探索发展的价值,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去修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才能尽可能、最小程度地规避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风险。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摸索式发展为今天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必要前提,而且,再科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实践探索,再顶层的设计也不能离开“摸着石头过河”。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给出的结论!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一个渐进式、系统化的历史性工程,既有全面性,也有其

阶段性。讲它具有全面性,是说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讲它具有阶段性,是说它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而是分阶段、分步骤进行并实现的。这种渐进式的、从生产力开始的、落脚于全面发展的发展之路,是中国道路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

### 三、新发展理念“新”在哪里?

坚持问题导向,致力于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理论,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到科学发展观,再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的思想和理念日臻成熟、不断完善。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并不这样理解,他们并不认为后面的理论是对之前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反而认为是对之前理论的否定,甚至认为原来的发展理论不管用了,或者说本来就是有问题的,所以才提出新的理论去修正原来的理论。

有人将科学发展观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立起来,从而否定科学发展观同之前发展理论的一脉相承性,认为我们今天强调以人为本,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是以物为本,现在由以物为本走向以人为本,就是旧发展理念向新发展理念的转变;还有人认为,新发展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它是对以人为本的反驳,以人为本现在就不要再提了;有人搞不明白,科学发展观已经很完善了,为什么还要提新发展理念,这个“新”新在哪里?有些人片面理解当前所提出的新发展理念,认为这一理念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简单重复,或是对科学发展观的部分否定,由此割裂新发展理念与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内在联系;对理论持悲观态度的人则将理论一棍子打死,认为再好的发展理论都无济于事,因为中国的生态环境并不是越来越好了,而是越来越

坏了,不改变现实,再好的理论也没有用。

看不到中国每个阶段的发展理论所起的作用,看到中国出现的生态代价就认为发展理论不管用,这本身就是对理论的偏见。若没有各阶段发展理论的指导,就没有中国今天的进步;若没有发展理论的与时俱进,就没有中国持续发展的动力,甚至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以至于解决不了今天发展遇到的难题。当然,当前中国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并不是肯定哪种理论或否定哪种理论就可以解决的。前人针对当时的背景,就当时的问题作出了必要的理论努力,今天轻易地去否定它,不是正确的态度。没有前人所提出的发展理念,不可能提出今天的发展理论。今天所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理所当然应由现在的人来解决。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提出只有后人才可能提出的命题、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否则,既是对前人不公,也是为当代人推卸责任找借口。只有明晰了这一点,我们对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才能有一个理性而深刻的认知。

发展理念的创新根源于时代发展的需要。时代的进步必然催生发展理论的创新,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必然随着发展实际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就是毛泽东所讲的“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sup>[6]</sup>。任何理论都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我们不能一讲到新发展理念,就否定以前的发展理论。新发展理念的“新”是继承创新的“新”,而不是以新代旧的“新”。

新发展理念之“新”,在于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发展理念,它基于当前中国实际,聚焦中国现实变化,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新特征即经济发展新常态。在经济发展方式方面,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在经济结构方面,正从增量扩能为

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在经济发展动力上,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总体而言,新发展理念立足的客观实际就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离开经济发展新常态,就没有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之“新”,在于它是为了解决新常态下的新问题而提出的,直指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创新”注重解决的是发展的动力问题;“协调”注重解决的是发展中的不均衡问题;“绿色”注重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开放”注重解决的是内外联动问题;“共享”注重解决的是社会公平正义(重点是分配)问题。很显然,新发展理念深刻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确立了接下来发展的五种价值标准,即反对停滞不前、失衡冲突、透支环境、封闭狭隘、分配不公,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未来应如何走好中国道路的清醒认识。

新发展理念之“新”,在于它更加突出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为突出地强调了“依靠谁发展、为了谁发展”这一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而且还把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

结合起来。新发展理念尤其强调实践维度、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理论层面,而是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所以,新发展理念不等于发展实践本身,要赢得掌声,还得靠实践。因此,推进新发展理念的践行,在实际工作中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重要课题,也是破除“发展理论无用论”的主要对策和根本途径。

###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7.
- [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1.
- [3] 习近平. 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8.
- [4] 邓小平.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64.
- [5]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
- [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



引用格式:张端.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6): 15-21, 37.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6.003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7)06-0015-07

# 中国共产党人 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 The richnes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on Marxism thought of people as main boby

张端

ZHANG Duan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北京 100732

**摘要:**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的基本原则运用于中国实际,始终坚持人民主体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并根据实践要求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丰富和发展,产生了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成果,初步形成了以人民动力观、人民利益观和人民宗旨观为主要内容的人民主体思想,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的贯彻和运用。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人;  
人民主体思想;  
人民动力观;  
人民利益观;  
人民宗旨观

收稿日期: 2017-10-20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10920151001010);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科研项目

作者简介: 张端(1982—),女,河南省平顶山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成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sup>[1]</sup>。这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立场和人民情怀。中国共产党也正是由于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才得以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历史只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结果;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承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把它作为自己全部价值观的核心和灵魂,并在实践中对其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从将为人民服务视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到强调要充分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再到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一、人民动力观——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要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在实践中肯定并发扬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人民主体思想。

对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毛泽东同志有深刻的认识。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

力”<sup>[2]1031</sup>。针对党内一些人认不清人民群众历史地位的情况,毛泽东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坚持群众史观对于推进革命工作的重要意义,“必须明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sup>[2]790</sup>。与那些将少数英雄人物看成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相反,深谙历史的毛泽东将人民群众看成是历史真正的英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贯彻到底,始终坚持人民革命和人民战争的思想。他认为,“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sup>[3]1195</sup>,人民的支持和参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sup>[4]</sup>。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著名的“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sup>[3]1195</sup>的论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仍然多次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力量源泉,并说道:“我和大家都相信: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sup>[5]117</sup>正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迅速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参与改革、支持改革、服务改革、献身改革的积极性,牢牢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在中华大地上开启了一场新的革命。邓小平鼓励人民群众在改革实践中要大胆地试、勇敢地闯,指出“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



新”<sup>[6]143-144</sup>。正是靠着人民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劲头,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时,邓小平特别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sup>[7]382</sup>,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等。正是由于放手让群众去闯、去试、去实践,才推动了中国改革的发展。这充分彰显了邓小平同志坚持实践第一、群众第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在推进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并发扬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一思想,充分认识到改革需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才能取得成功。江泽民同志曾多次强调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主体作用,指出“理论创新的源泉在实践,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sup>[8]132</sup>，“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sup>[9]248</sup>，“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sup>[8]270</sup>，“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sup>[8]281</sup>。江泽民同志继承了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关键是人才”<sup>[9]435</sup>，“在社会的各种资源中,人才是最宝贵最重要的资源”，“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等,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充分发挥各类人才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尤其是要注重激发和鼓励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的全局中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认识到只有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只有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首次明确提出“人

民主体”这一概念,强调全国各族人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强调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对于改革发展的重要意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人民主体思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新历史伟业”<sup>[11]</sup>。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战略的清醒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事业,更是牢记使命——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不忘初心——为人民谋取幸福生活的伟大事业。人民群众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和建设者,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建设成就的受益者和分享者。

总之,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在实践中结合国情对其进行创造和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人民动力观。

## 二、人民利益观——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对利益的追求是推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历史活动的动力。马克思曾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sup>[10]</sup>时代在不断进步,经济社会在不断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也处在

不断变化、调整的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也呈现出时代性的特点。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进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党对不同时期人民群众利益需求有着充分的认识和把握。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洞察到合理的物质利益对革命和生产的激励作用。他指出,只有取得群众的拥护,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只有切实为群众谋利益,才能取得群众的拥护;“要保证人们吃饱饭,然后人们才能继续生产,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sup>[11]</sup>。为了调动农民革命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变为现实,解决了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由此满足和实现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的经济诉求和梦想,这也成为鼓舞中国农民投身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动力。在考虑人民群众物质利益的同时,毛泽东还特别重视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和文化需求。他说,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要“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sup>[12]</sup>。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与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同等重要。为了尽快摆脱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状态,他把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一起并提,并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帮助人民摆脱愚昧状态、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素质,使人民享有高尚的文明的精神文化生活。他指出,“除了钢,我们还要别的东西,还要办学校,全国人民至少要初中毕业,再过多少年,扫马路的人、大厨师以及所有的人都要能够大学毕业,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我们一切的工作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sup>[5]182</sup>。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始终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始终把劳动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需求的满足放在第一位,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要实现这一目的,其首要任务就是打破思想和体制的禁锢,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数量更多、品种更丰富、品质更优越的物质财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sup>[7]63</sup>“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sup>[7]373</sup>发展生产是社会主义的手段和途径,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sup>[6]128</sup>邓小平多次指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sup>[6]128</sup>。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人民群众整体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人民群众在利益需求方面也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层次性的特点,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需求存在着差异,不同地区、不同部分的利益需求存在着多样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的需要,提出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要兼顾各方具体利益,同时,进一步将人民利益具体化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的发展目的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人是发展的前提、动力和目的,人在社会发展中居于主体地位。以人为本的实质是以人民群众为本,目

的是要将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对人民群众利益的维护,既要从小处着眼,又要从小处入手。胡锦涛指出,以加强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应把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放在突出位置,要使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更好地体现到改善民生上,着力解决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基本民生问题,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好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更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sup>[1]</sup>。对主要矛盾的这一精准把握,体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新时代人民利益需求的发展变化的深刻洞察。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将进一步满足人民多样化的利益需求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

首先,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更加重视民生建设上面。中共十八大以来,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国民生的保障和改善水平得到了持续稳步快速的提升,改革发展的成果越来越多、越来越公平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但民生的保障和改善也存在短板和弱项。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sup>[1]</sup>。目前,我国民生领域最大的短板就是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脱贫问题。为解决这一民生短板,2015年11月,中央正式宣布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明确提出到2020年将实现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

其次,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改革和发展越加注重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向往和追求上。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近40年的持续努力奋斗,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并在总体上实现了小康,人民在利益需求方面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对物质利益需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更突出的问题是要生活得更加美好。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利益要求日益增长。面对广大人民群众利益需求的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要用健全的制度来保障人民各项民主权益,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用制度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制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只有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才能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才能为人民主体地位的实现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再次,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上。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sup>[1]</sup>。中共十八大以来,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生态保护,提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要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道路,坚决摒弃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和做法;要让人民群众呼吸上清新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切实感受到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的优美的环境效益。

总之,人民的利益需求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对利益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旨在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就在于党能够深刻洞察人民群众在不同时期的利益需求,并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状况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

### 三、人民宗旨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始终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群众史观,在实践中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将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归结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源自于其对人民的热爱。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永恒不变的魂,“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sup>[13]</sup>。

毛泽东同志 1945 年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就曾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sup>[2]1094</sup>这就鲜明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根本宗旨和价值追求。“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sup>[2]1004</sup>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需要有正确的工作方法作保障。为此,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重要的工作方法,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密切联系群众、紧密依靠群众、关心群众冷暖,在工作中反对官僚主

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当好人民的勤务员,虚心接受人民的批评和监督。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邓小平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sup>[14]</sup>邓小平还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失成败最核心的判断标准。邓小平反复告诫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能以任何理由搞特殊化。他说:“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sup>[6]218</sup>他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政治本色,要始终做人民的勤务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党群关系问题。对此,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sup>[8]279</sup>。他还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强调:“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sup>[8]572</sup>他说:“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就必然垮台。”<sup>[8]129</sup>

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根本宗旨的新认识。执政党的各项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权力的使用要体现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党员干部行使权力的目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

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做到利为民所谋,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植根人民、心系人民、热爱人民、服务人民。胡锦涛指出,“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sup>[15]</sup>。正是始终保持着同人民的鱼水深情,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广大人民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累累硕果。

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力量也在人民。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sup>[1]</sup>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而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就必须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sup>[1]</sup>正是始终坚持人民导向、人民立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为切入点,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等等,这些措施有力地净化了党内政治风气,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营造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

面对腐败这一世界性难题,中国共产党拿出了勇于自我革新的勇气和智慧,以铁腕治腐的决心,坚持反腐无禁区、全覆盖和零容忍,以壮士断腕的坚强意志,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担当,坚决严肃查处党内的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事实证明,习近平同志关于改进党的作风和积极惩治腐败的做法,深受广大人民群众

好评,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和支持,当前,在党内和国内,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得到了巩固与发展。随之带来的是,党内政治生活的新气象,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更加巩固,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

由此可见,坚持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强调“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党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公仆,在大是大非面前党始终从人民立场出发,敢于同自身存在的严重腐败问题做斗争,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本色和自我革新的勇气和魄力。

####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丰富和发展,初步形成了以人民动力观、人民利益观、人民宗旨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共产党的人民主体思想。这一思想既坚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又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可以说,以人民为主体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价值追求。我们坚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民主体思想的理论内涵会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人民主体地位的实现也将会有新的形式、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EB/OL]. (2017-10-27)[2017-11-12]. news.xinhuanet.com/2017-10/27/\_1121867529.html.



引用格式:王建刚. 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理论进路[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6): 22-29.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6.004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7)06-0022-08

# 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理论进路

## On the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the formation of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王建刚

WANG Jiangan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4

**摘要:**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中两大伟大发现之一。然而,其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长期的理论准备和逻辑演变。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经历了《博士论文》时期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观念史观、克罗茨纳赫时期以政治异化为特征的异化史观、“巴黎手稿”时期以经济异化为特征的异化劳动史观、《神圣家族》时期科学阐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要素,到布鲁塞尔时期为历史观的唯物主义转向提供理论准备,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对唯物史观的全面系统阐述。科学梳理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理论进路,有助于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要义,这对于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根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  
唯物史观;  
基本样态演进

收稿日期: 2017-10-07

基金项目: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8-ZZJH-066)

作者简介: 王建刚(1979—),男,河南省许昌市人,河南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时指出:“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sup>[1]</sup>可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离不开科学的方法论指导,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因此,对唯物史观形成的理论进路及其理论特质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在把握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科学方法论基础上,全面系统地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本文拟基于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认真研读与系统分析,梳理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理论进路。

## 一、《博士论文》时期:构筑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观念史观

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观念史观是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和初始形态。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之进行了阐发。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摒弃了黑格尔观念史观的错误立场,倡导张扬人的自我意识的能动性,并将之作为自己的历史观立场。

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谈论世界历史表现原则时提到了自我意识,认为:“从这个仍然是特殊的自由的形式提高到了纯粹的普遍性,提高到了精神性本质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sup>[2]</sup>显然,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自我意识只是客观精神逻辑展开的一个中间环节。马

克思不同于黑格尔和其他自我意识哲学家,他对自我意识哲学体系的钻研,主要是基于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政治需要,其目标是将人作为自我意识的主体,而不是相反。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是借助于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来表达他的这一观点的。

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都认为世界是由原子和虚空构成的,但在涉及原子在虚空中的运动时,二者存在明显的差别。伊壁鸠鲁除和德谟克利特共同承认原子在虚空中的运动是直线式的下落之外,他还认为原子在下落过程中存在着偏斜运动。马克思认为这一点是伊壁鸠鲁哲学的重要特征,始终贯穿于其整个哲学体系之中。马克思对此十分认同,认为这种认识打破了机械决定论和盲目必然性的支配。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原子偏离直线运动在哲学上彰显了人的能动性。

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原子只有直线运动,那就是把原子只看作空间的一个点,只有空间的规定性,缺乏自我运动的原则。而伊壁鸠鲁在承认直线运动的同时,还提出存在着偏离直线的运动,从而赋予原子以能动性。原子发生偏斜运动,必然会导致众多原子之间相互碰撞,而众多原子的冲击和碰撞的结果是世界的形成。故此,马克思肯定了卢克莱修关于原子偏斜运动的评价,承认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性。马克思虽然很重视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说所包含的对自由的追求,但他不同意伊壁鸠鲁把自由仅仅看作自我意识的衍生,看作与外部世界无关的东西。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整个伊壁鸠鲁哲学在抽象的个别性概念,即独立性和对同他物的一切关系的否定,应该在它的存在中予以表述的地方,到处都脱离了限制性的定在”<sup>[3]</sup>。可见,马克思赋予人的自我意识以脱离痛苦和枷锁的无限可能性。这种虽则抽象的观念史观却也蕴含着批判的锋芒,隐隐指向了

当时德国腐朽的现实。

基于此,马克思在《博士论文》期间,勾勒出了以自我意识为原则的观念史观,它脱离了黑格尔的以绝对精神为核心的观念建构原则,强调自我意识与外界的统一。尽管此时的马克思仍然将建构原则放置于人类自身的主体性中,但他的这种建构在本质上仍然是以某一原则为出发点的,忽视了人类的物质生存现实,隐入了用观念来说明历史的唯心史观。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开始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实践,其历史观也因此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马克思对历史观的考察,逐渐突破了仅仅从观念层面进行阐释的局限,而转向普遍的现实物质生活。但是,他此时的历史观仍然是以理性精神为基础的,本质上没有超越唯心主义历史观。

## 二、克罗茨纳赫时期:构筑以政治异化为特征的异化史观

《莱茵报》因革命倾向被查封后,马克思回到了克罗茨纳赫。在克罗茨纳赫,他继续进行新的科学研究,反思在《莱茵报》期间碰到的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通过研究,他发现了黑格尔历史观的问题所在。按照黑格尔的历史观,普鲁士国家是绝对观念的体现,是人类自由精神的实现。可是大量事实证明,普鲁士国家在思想、政治和经济上总是在极力维护封建贵族、特权等级的利益。这些不争的事实,开始促使马克思对原先信仰的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产生怀疑,并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毋庸置疑,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中心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黑格尔的看法充斥着唯心主义的味道。在他看来,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现实关系只不过是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而已。显然,这种认识是不科学的。马克思对此给予了积极的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这种把现实关系头足倒置的认识,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思辨唯心主义。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与国家间关系的深入研究,把市民社会看做政治国家产生的基础,从而否定了黑格尔之国家产生于理念的错误观点,实现了对国家概念本质认识的唯物主义转向。

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立足于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从历史发展的真实逻辑出发,系统考察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相异化的内在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在古代的奴隶社会,国家并没有采取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虚幻共同体形态,其在本质上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实体性的统一。在封建社会,政治国家同市民社会之间的统一达到了顶峰,市民社会的一般等级成为政治意义上的等级。但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内在统一被打破,变成了两个相异的领域,政治国家在本质上变成了一种凌驾于一切社会阶级之上的利益共同体,变成了一种独立于市民社会之外的力量。这种以彼岸之物呈现的状态,从本质上讲,无非是展现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矛盾即各阶级之间关系的异化。同时,马克思还认为,政治制度同现存的宗教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宗教以超验的形式反映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即以其唯心主义幻想掩盖了阶级矛盾及其利益对立。

总的说来,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系统论述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和政治国家自身存在的异化问题,构建了以政治异化为特征的异化史观,为进一步构筑唯物史观开辟了新的路径。

## 三、“巴黎手稿”时期:构筑以劳动异化为特征的异化史观

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时期构筑的政治异化史观,仅仅是将对历史观的研究置于政治层面,



而并未深入到经济层面。到了“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开始重点研究经济学,深刻剖析市民社会本身,并深入经济基础内部去分析上层建筑异化的现象,由此确立了以异化劳动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观架构。

异化劳动理论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哲学基础,其思想渊源是德国古典哲学关于异化的理论。但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囿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异化理论,而是从劳动的对象化与异化的区分入手进行逻辑建构的,而劳动的对象化与异化的区分,恰恰又是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现象学哲学批判思路的延续<sup>[4]</sup>。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着眼于对现有经济事实的分析,摒弃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色彩。

基于主体的本质规定,将异化界定为人自身类本质的分化和对立,这是德国古典哲学异化理论的特点。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都坚持了这一理论特质,即把异化问题同主客体关系联系在一起。黑格尔从绝对观念出发来探讨异化问题,在他看来,绝对观念是异化的主体,异化是绝对观念的对象化,并又重新回归自身的永不停息的运动过程。显然,他这种异化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观念异化论。费尔巴哈不同于黑格尔,他倡导一种人本主义异化理论,提出了“主体在人”的命题,将黑格尔头足倒立的异化理论颠倒过来。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理论,却又将人的本质对象化为一个独立于人的精神实体,从本质上讲,其历史观仍然是唯心主义的。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摒弃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理论的抽象性和唯心主义特质,力图寻求异化的现实根源。于是,他重点分析和研究了国民经济学,对经济学说史进行了系统总结。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家并没有真正发现异化的现实主体,他们把劳动和劳动者分开,只研究劳动而不研究劳动者。在马克思

看来,异化的现实主体既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观念,也不是费尔巴哈所强调的抽象的人,更不是纯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一般,而是长期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即无产者。

在确立了无产者为异化的现实主体之后,马克思转入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劳动的现实表现的分析。在他看来,国民经济学家不能够“弄清楚私有制,贪欲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sup>[5]267</sup>。他们将这些联系放置于虚构的原始状态。马克思认为,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应该从当时的经济事实出发来探讨异化问题。那么,当时的经济事实又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当时的经济事实充满矛盾:工人的实际生产与其所获得的财富不成比例,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其获得的则越少、变得越贫穷。这一经济事实无非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sup>[5]267-268</sup>不难看出,马克思看到了在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关系中,包括着两个不同的方面,即对象化和异化。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对象化和异化并非两个毫不相关的过程,而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劳动的对象化,不仅仅表现为劳动者创造出劳动产品,同时,它还表现为劳动者的劳动创造了一个同其相对立的异己力量。这样,劳动者与其产品的关系就发生了异化。

马克思从劳动产品的异化出发,进一步探讨了工人自身本质的异化、外化。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仅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还表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行为中。假

如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中使自身发生了异化,那么工人所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又如何会成为一种与工人相对立的异己的力量呢?循着这个思路,马克思就从对劳动者与劳动产品之间外在关系的分析,逐渐转向了对劳动者与自己劳动的关系的分析。从形式上看,资本主义雇佣制度下的劳动是自由的,不存在强制和压迫,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也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但是,从本质上来讲,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是一种极其不自由的劳动,工人所从事的劳动是一种外在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属于工人自己的,而是属于别人的;不是为了满足其本性,而是为了满足劳动以外的其他需要即生存需要。故此,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异化的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社会成了一个颠倒的世界,其矛盾必然推动着这个社会灭亡,即朝着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发展。

综上所述,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矛盾及其本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确立了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实质,从而超越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但是,从本质上讲,这种理论仍然没有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哲学传统,难免会带有人本主义哲学的痕迹。

#### 四、《神圣家族》时期:科学阐释构筑历史观的基本要素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合作的论战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系统论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要素,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巴黎手稿”时期所确立的异化劳动历史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沿着“巴黎手稿”的异化劳动思想,对历史的发源地问题展开系统阐释。历史的发源地问题

是历史观研究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以往许多哲学家们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不同的回答。黑格尔把绝对观念当作历史的发源地,鲍威尔则追随黑格尔把自我意识看作历史的发源地。

针对旧哲学对历史发源地问题的唯心主义回答,马克思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从物质生产层面来阐释历史的发源地,指出历史的根本内容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性生产活动;对某一历史时期的认识,不能够仅仅停留于研究其所处时期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要研究该时期的生产方式。因此,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天上,而在地上;不是观念,而是物质生产。

在明确了历史的发源地之后,马克思又重点考察了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方法问题。他在《德法年鉴》中指出:“犹太精神是通过历史、在历史中并且同历史一起保存下来和发展起来的,然而,这种发展用神学家的眼睛看不到,而只有用世俗人的眼睛才能看到,因为这种发展不是在宗教学说中,而是只有在工商业的实践中才能看到。”<sup>[6]308</sup>马克思在这里区分了两种认识和观察历史的方法:一种是“神学家的眼睛”,即鲍威尔唯心主义历史观;另一种是“世俗的眼睛”,即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第二种考察历史的方法。他认为,在考察历史时,必须立足于当时物质生产的客观情况,尤其是要认识这一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

在科学地诠释了历史的发源地、考察了历史的基本方法等问题的基础上,马克思紧接着又在《神圣家族》中批判了鲍威尔思辨的历史目的论。鲍威尔把真理置于历史之上,又把历史置于人之上。在他看来,真理是一台用来自己证明自己对错的机器,人生存生活的目的就是遵循真理。正像植物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给动物充饥;动物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给人类充饥;同样,历史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给理论充饥,也即证

明理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因此在鲍威尔看来,人和历史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使真理为自我意识所认识。马克思极力反对鲍威尔这种错误的历史目的论的观点。他认为,目的性是人的活动的特性,历史并不具有某种目的论的即近乎天命的神秘意旨。历史存在于人的活动之中,而不是人的活动之外。任何颠倒人与历史的关系,任何把历史看成抽象的主体、把人看成实现历史的工具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它们最终都必将走向历史宿命论。

此外,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还论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鲍威尔等人把人民群众同历史错误地对立起来,看不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把人民群众看作历史发展的阻力和障碍,认为:“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合时宜的和没有取得富有影响的成效,正是因为群众对这些活动表示关注和怀有热情。”<sup>[6]286</sup> 马克思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与他们正好相反,马克思从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这一前提出发,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认为法国大革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并无唤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和力量,据此,马克思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sup>[6]287</sup>

总而言之,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判了鲍威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系统阐释了历史的发源地、考察历史的方法,以及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等问题,从而逐渐走向全面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历史进程。

## 五、布鲁塞尔时期:为历史观的唯物转向提供理论准备

从《神圣家族》时期到《德意志意识形态》

时期,由于法国政府的迫害,马克思被迫从巴黎移居布鲁塞尔。在布鲁塞尔,他继续对历史观问题进行研究,重点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并撰写了《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两部重要著作,为其历史观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马克思批判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一部评论性著作。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极力掩盖其理论的实质,宣称德国保护关税是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马克思针对李斯特的错误理论前提进行了严厉批判。马克思认为,李斯特把生产力和交换价值对立起来,把生产力看成一种精神性力量,这是唯心主义生产力观,因为从本质上讲,生产力并非一种不可捉摸的精神性力量,而是一种物质力量。因此,对生产力的考察不能像李斯特那样,完全脱离社会制度进行抽象考察。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表明人的劳动更富有成效,同时也意味着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不断加强。这表明,马克思开始着手从现代制度视角考察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这种做法与之前撇开劳动的实现形式,从主体的本质角度考察历史发展相比前进了一大步,更接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即将全面呈现的历史唯物主义。

如果说《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着重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探讨唯物主义历史观,那么,几乎同期写作的另一部论著《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更进一步从哲学世界观的角度转入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研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指出并分析了费尔巴哈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将历史观明确奠基于实践之上。尽管此时提出的

实践观在马克思 1845 年春提出来的一些新观点中并不是主要的,它甚至不可能代表马克思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层面上的实践观的本质内容<sup>[7]</sup>,但是马克思这时的一大突破是已然将实践观点引入认识论和历史观之中。马克思明确地把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人的本质和社会生活的本质,立足于人的实践活动来考察人类社会。由此,马克思就迈进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大门。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不从实践出发来考察历史,忽视实践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作用的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历史观。费尔巴哈就是如此,“费尔巴哈独特的地方是他的人本学”<sup>[8]</sup>,但是他在理解人的本质时,仅仅把理论活动看作真正的人的活动,而鄙视和忽视实践,因此,其历史观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人本主义的历史观。针对费尔巴哈对人的抽象理解,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6]501</sup>。这个论断一方面科学界定了人的本质,另一方面摒弃了费尔巴哈关于个体和类的抽象的人本主义观点,为全面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清除了障碍、准备了前提、奠定了基础。

总之,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时期研究历史观问题所撰写的两部重要著作,突破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窠臼,分别从经济学和哲学层面探讨了历史观研究的基本思路和逻辑起点,从而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全面呈现做好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 六、《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从整体上呈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样态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的创立,都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理论出发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全面创立同样如此。那么,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出发点究竟该如何确立呢?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对施

特劳斯和施蒂纳把历史观的出发点定位于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的批判,对历史观的出发点给予了科学界定。他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sup>[6]525</sup>可见,马克思把现实的个人所从事的物质性活动,作为历史观的出发点。

在确立了历史观的出发点之后,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历史的主体、历史的本质、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历史发展的规律等问题,既汇聚了之前的研究成果,又将贯穿其中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思想系统化并进行了提升。马克思由此正式踏上了确立唯物史观的道路。

在施蒂纳看来,人是全部历史的积极主体。但是施蒂纳所理解的“人”只是观念上的一个名称而已。这种抽象意义上的人,不参加任何实际活动,也不可能创造历史。马克思对施蒂纳的这种错误观点给予了严厉批判,认为,创造历史的是处在现实交往中的现实的人。历史的真正主体是现实中的个人,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个人,而不是某种概念意义上的抽象个人。

关于历史的本质问题,马克思在之前的“巴黎手稿”和《神圣家族》中都对其作了分析。在“巴黎手稿”中,他把历史看作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在《神圣家族》中,他又把历史看作是人类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这两种认识尽管在某种程度上都涉及到了历史的本质,但是没有解决历史究竟是如何发展的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出发来探讨历史的本质,认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sup>[6]540</sup>在此基础上,各个时代的发展就形成一个有联系的、以交往形式为结论的序列。马克思由此把历史的本质理解为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发展和变化的过程。

在历史的发展动力问题上,马克思克服了以往思想家们对历史发展动力作主观化理解的局限。历史的发展动力究竟是什么?马克思对此明确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之间的矛盾。因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sup>[6]</sup><sup>567</sup>。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还深刻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通过科学地界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含义,马克思系统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论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他看来,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生产关系是人们借助于一定的生产工具,在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辩证运动规律,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综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对鲍威尔、施蒂纳和费尔巴哈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科学阐释了历史的主体、历史的本质、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历史发展的规律等一系列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尤其是对历史主体的重新界定,即将历史主体界定为从事现实活动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个人,使其从根源上彻底摆脱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窠臼,全面呈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样态。

## 七、结语

总而言之,通过以上从文本的角度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理论进路的系统梳理,不难发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充分展现了其探寻历史发展的思想演进序列,即从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观念史观、以政治异化为特征的政治异化史观、以经济异化为特征的异化劳动史观,到

科学阐释唯物史观的基本要素为唯物史观的历史转向提供理论准备,再到全面呈现唯物史观的基本样态。这一思想演进序列的形成,是与马克思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从事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以及马克思的两大思想转变紧密相连的。因此,只有科学阐释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理论进路,明晰其思想发展演进的内在原因,才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要义。唯有如此,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理论根源,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使我国在新时代的历史境遇下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EB/OL]. (2017-10-18)[2017-10-20]. news.sina.com.cn/0/2017-10-18/doc-ifymyxw.3516456.shtm.
- [2] 黑格尔. 历史哲学[M]. 王造时,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57.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
- [4] 张一兵.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1.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唐正东. 从斯密到马克思[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335.
- [8] 戴维·麦克莱伦. 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11.



引用格式:吴延溢,王健.技术时代人的主体性迷失与出路——评京特·安德斯技术批判理论[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6):30-37.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6.005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6-0030-08

# 技术时代人的主体性迷失与出路

——评京特·安德斯技术批判理论

## Lost and way out of subjectivity of the human in technological times

—Comment on Gunther Anders’s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吴延溢, 王健

WU Yanyi, WANG Jian

南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9

**摘要:**在技术时代,作为主体的人,其生存方式已被植入了越来越多的技术性元素,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进化为与作为客体的技术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技术主体。然而,技术主体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前途与命运,在技术的统治下,主体“舒舒服服”地享受着自己的“自由”。京特·安德斯在其《过时的人》中指出,技术主体面临着羞愧化、同质化和间离化的异己局面。安德斯认为这些危险局面的产生来源于技术主体自身二重性意识的缺失,即主体已沦为缺失了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存在物。然而技术主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过时”只是其存在的特殊形式,具有肯定性、实践性和社会性存在特征的技术主体,会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技术,不至于因过分悲伤而陷入“否定的人类学”,也不至于因过度喜悦而陷入“自傲的中心主义”,在批判性追问的逻辑前提下注定会走向希望性的现实生成之路。

**关键词:**

技术批判;  
主体性迷失;  
二重性意识

收稿日期:2017-08-07

作者简介:吴延溢(1970—),男,江苏省南通市人,南通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

20世纪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科学技术哲学家京特·安德斯早年师从海德格尔和胡塞尔,曾与马尔库塞、阿多诺等人交往过密。然而,安德斯与这些传统哲学家不同,他把哲学的视角转入对社会现象的慎思和批判,呼吁哲学走出象牙塔,用哲学来探讨人的生存的具体问题。他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关注点不再是主体“在世界中存在”,而是主体在科学技术桂冠统治下的“被决定与过时”。在人类头顶着工业革命带来的耀眼光环、从未如此自信的今天,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人作为主体是否真的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之中?主体在技术带来的产品面前是否真的过时了?本文拟以安德斯《过时的人》为文本依据,分析技术主体的异化表征,揭示技术主体异化的根源,探寻希望性主体生成的现实路径,为技术时代人的主体性迷失寻找出路。

## 一、从自傲到愧怍:技术主体的异化表征

在《过时的人》一书中,安德斯从否定的人类学、批判技术哲学和媒体批判哲学等视角,对技术时代的社会现象和主体的生存境况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并告诉我们:人的创造性本质使得人与其他存在物相区分,但又使得作为主体的人今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离异。

### 1. 存在性维度主体的羞愧化

作为主体的人,在享受着世界进步带来的技术成果的同时又忍受着进步带来的毁灭。主体依靠技术所创造出的产品一方面使其自身高度物化,另一方面产品反过来在力量上超过了物化的主体。在安德斯看来,具有自为本性的主体在看到如此精确、如此完美的机器时,已经羞愧于自己仅仅是一个“存在者”而非“存在物”了,甚至会愤恨自己不是被制造出来的东西、自己不是产品、自己比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

还要低劣。<sup>[1]5</sup>安德斯将技术时代主体的这一表现隐喻为“普罗米修斯的差异”,他在《过时的人》中用“普罗米修斯”这一形象来比喻主体的创造性。然而,在技术成为主宰的今天,这种创造却造成了创造者与造物主仆颠倒的局面。<sup>[1]14</sup>在“普罗米修斯的差异”中,笛卡尔、康德等近代哲学家们确立起的主体的光辉渐渐开始走向消逝,人的内心充斥着一种无法言说的自卑与失落,进而引起了“普罗米修斯的羞愧”。

现如今,产品的完善性要远远优于主体,产品的价值要远远高于主体。因此,人的眼光成了机器的眼光,人的标准成了机器的标准,人的情感也机器化了。<sup>[1]14</sup>所有的羞愧都来源于机器(产品)与作为主体的人的比较,正是在这种比较中主体认识到,自己的本质是“自然出生”,在那些近乎完美的零件组成的产品面前,自己只是一块“糟糕的材料”,自己的躯体形态是早已先验地确定了的。人的这种先验确定形态都是“错误定型”,决定了人的主要缺陷,这也是引起“普罗米修斯的羞愧”的主要原因。<sup>[1]30</sup>安德斯同时认为,主体还有一种难以克服的自卑感,即人所具有的“易腐朽性”,也就是人不能像产品一样进行工业性地再生,主体比自己的产品更短命、更容易丧失生命。<sup>[1]31</sup>当然,安德斯在这里指的并不是一件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其真实寿命真的会超过主体的生命周期,而是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主体可以精确地计算出或规定产品的生命周期,但无法预计自己的寿命。产品的永恒与主体的有限之间的差异,使今天的主体产生无休止的羞愧。

### 2. 本质性维度主体的同质化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曾指出,纯有与纯无是同一的东西。<sup>[2]</sup>从先验层面来看,主体的本质就在于其恰无本质,即正是先验的“无本质”带给经验性的主体以“丰富本质”。正是在“无本

质”中,主体的本质才得以在生命的最广维度进行拓展和丰富。生活在技术时代的主体,无时无刻不被复制品所包裹,由模具冲压成型的单一产品充斥着主体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也将为技术所奴役,成为复制品。我们会主动要求按照模具的样子将我们重塑,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缺位,主体的世界被制造为“可复制的幻象”<sup>[1]120</sup>,主体毫无目的地游荡在幻象世界里。每一个人在这些大众产品面前都被当作“大众”和“不定冠词”对待,每一个主体的丰富本质都被抽象为单一的“模板本质”,每一个主体都有一个特定的本质——“无本质”<sup>[1]80</sup>,如此,无数听众的眼睛被当成一只眼睛来塑造,千百万听众的耳朵被当成一只耳朵来灌输,每一个主体都被当作单一性的产品来塑造,活生生的主体被抽象为“无特性的大众”,今天的“我”已经失去了作为“他我”的存在意义。

在今天这个消费世界之中,主体的同质化给主体带来的再也不是塞诺芬尼关于“一”的神圣与理性了。随着主体的同质化,主体的各项机能趋向于“零”。在“文化水龙头”<sup>[1]79</sup>面前,主体消费的不过是“以图像形式出现的‘偏见’”,消费着的主体需要耗费更多的精力来察觉这些非公开性的“偏见”。在广播电视节目中,主体失去了自己的判断,更彻底地说,主体无法抗御和抵制送到主体面前的判断,这些判断依据成为不容怀疑的真实。<sup>[1]140</sup>同时,在幻象与复制的世界中,主体的行动不再需要任何目的,或者说主体的目的就是进入物的世界。今天,主体已经遗忘了康德在200多年前所高呼的“作为存在者永远不只是用作手段,而且同时本身也用作目的”<sup>[3]</sup>这一口号。正如产品一样,每一个主体都变成了世界机器里的手段,制造手段成了我们存在的目的。<sup>[1]225</sup>主体同质化的另一个表现则在于主体失去了想象的本质。在幻象的世界里,主体失去了想象的能力,这是

因为主体把所有的想象都投注到了渴望成为“制造着的产品”的欲望之中,主体在幻象面前无法想象其他存在。本质性维度主体的同质化,使得每一个主体都失去了后验地去体验世界和丰富本质的能力,从而成为被先验决定了的存在,这就是产品的“平庸化效应”。

### 3. 语言性维度主体的间离化

在《过时的人》中,安德斯把主体描述为“不会说话的奴隶”,认为电视机剥夺了人们的言说,主体成为缺乏逻各斯的存在物,主体的表达之贫乏如同他自身的贫乏一样。<sup>[1]86-87</sup>没有语言就不会有关于主体的世界,作为主体的人永远是在语言中去把握世界,而世界则通过语言与主体发生关系,变为主体的世界。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是存在的家”,活生生的主体只有始终被嵌入语言本质才能“成为我们人之所是”。<sup>[4]</sup>正是语言使主体“是其所是”,使世界成“其所是”,语言就像家园一般赋予世界万物以存在的意义。而随着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将世界“送进家门”,将世界以高速度和高密度的图像和声音展现在人的面前,感官的兴奋就只滞留在感知的最低阶段,即听和看。也就是说,图像和声音不再进入人的意识深层,只是活跃在人的感官层面上。<sup>[1]17</sup>高速度和高密度的图像和声音在慢慢剥夺着主体的话语权与其语言本质,主体在现实生活中不需要去说话,只需要被动地看、被动地听,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间离化。安德斯在《过时的人》中具体阐述了这种间离化的几种表现。

其一,从面对面的大餐桌到并排无视的电视机。在十几年前,我们还可以在家庭里随处发现那种大型餐桌,这张大桌子是所有家庭成员的活动中心,共同营造着家的温暖。尽管每一个主体都间隔着特定距离,但是通过言语的交流,他们又是如此之近。而今天,电视机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大餐桌,这种言语的交流已经被电视



机屏幕的离心力所取代,主体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只是并排坐在在一起的观众而已。在电视机面前主体把自身投入到广播电视媒体投射给我们的幻象,却忽视了作为他者存在的主体。<sup>[1]83</sup>

其二,从真实的主体到科学家的替身。语言的力量就在于帮助主体把握近与远的距离,使得主体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存在界限。而科学家则善于客观地调和远与近,善于将最遥远、最陌生的东西通过研究而使其陌生化,他们的研究对象不再具有任何感情。丧失了语言的主体则如同科学家的态度一般,我们期待着自己对所有的事物远近不分。<sup>[1]101</sup>

其三,从书信艺术到言说贫乏。在很久以前,书信是人们的主要交流方式,为了展现最深邃的主体本质,主体会冥思苦想地雕琢自己的语言。今天我们发现,在网络交流中人们开始抛弃对语言的细腻表达,多媒体让我们“封住了自己的嘴”。我们作为语言受体开始抛弃语言,我们的语言已经跟不上我们所经历的事物之繁多,我们的表达缺乏任何审美艺术。<sup>[1]86-87</sup>

孙周兴更是断言,“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世界上现存五六千种语言大部分将不再存在,估计只会留下若干种通用语言。”<sup>[5]</sup>我们认为,正是主体的在场与不在场(近与远)才构成了主体的广阔经历。而现在,一切事件都显得近在眼前,在这种无距离的距离中主体走上了与真实世界的间离之路。

## 二、从无意识到觉醒:技术主体的内在矛盾

安德斯指出,技术主体之所以面临一系列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主体的二重性意识缺失。

### 1. 对象意识的缺失

主体的对象意识具有如下的本质性规定。其一,对象意识具有他反性结构。这是指主体在实践中的认识对象是他在的,是对自身之外

的对象的反映。对象意识的他反性决定了主体的实践活动必须指向现实的世界客体。其二,对象意识具有一级反映的功能。与二级反映(主体对一级反映的再反映)不同,主体的一级反映是主体对客体进行处理和加工,是主体对不同于自身的客体进行认识的过程。对象意识的一级反映功能客观反映了关于客体的知识,揭示了客观物质世界的本质属性及其运动规律。<sup>[6]</sup>我们在前面描述了安德斯想要表达的“普罗米修斯的羞愧”及其产生的原因,而主体的“普罗米修斯的羞愧”则恰恰体现了主体对象意识的缺失。正如安德斯所认为的,技术的统治越来越暴力,主体的对象就越来越稀少。在技术的暴力统治下,作为主体的人无能为力。安德斯告诉我们,人是唯一能告别和放弃世界的存在物,主体慢慢地变成了“过时的人”和没有世界的人,完全丧失了自己应有的对象意识,这是一种以“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在”。<sup>[1]13</sup>

安德斯关于“普罗米修斯的羞愧”的论述,揭示出主体对象意识的缺失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前所述,“普罗米修斯的差异”引起了“普罗米修斯的羞愧”,从而造成了主体的高度物化。主体的物化则意味着主体在实践活动中消解了自己的对象,积极地将自我投入到物中而转变为自己的对象,这种错位在今天的世界舞台中到处存在着,如对于年轻女性来说,绝对不会在没有化妆的情况下出现在公众场合。今天关于“裸体”的定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不再单指没有任何遮掩的身体,同时也包括没有经过任何化妆、任何处理的躯体。<sup>[1]11</sup>我们无法否认作为主体的人总是具有自己的局限,而今天的主体却不断以机器的极限来试图克服自己的极限,在羞愧中主体不断将自己先验化,以此来改变人类躯体。正如安德斯套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著名语式所表达

的那样,“过去人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阐释人的躯体,而问题在于改变人的躯体”<sup>[1]19-20</sup>。可以说,主体的对象认同在今天达到了高潮,而正是在主体将自己转变为对象的过程中,主体失去了对象意识,致使主体已无法区分对象与自我。

## 2. 自我意识的缺失

主体的自我意识具有如下特征。其一,自我意识区别于对象意识的他反性,具有本己的自反性。自我意识的自反性是指主体自我意识的认识对象是自己。自我意识的自反性决定了主体的二重性:客体的主体与主体的主体。其二,自我意识是二级反映(自我反映),在二级反映结构中主体把对客体的反映过程分化、独立出来,重新对这一过程本身进行反映。<sup>[6]</sup>主体自我意识的缺失则表明它已经失去了对主体反映客体这一过程的再反映机能,于是,主体在历史的进程中就丧失了自我。正如安德斯所说的“人与之打交道的不再是人的世界”,这个世界已变成了一个“没有人的世界”。<sup>[7]</sup>技术的出现虽然让人们丧失了关于世界的对象意识,但人类并没有生存危机。然而,在安德斯的笔下,原子弹的出现则危及到了主体的生存,这时候主体所缺失的已经不仅仅是对象意识,而是已经患上了“末日失明症”<sup>[1]236</sup>,失去了自我意识。

“进步”的概念使主体患上了“末日失明症”。在没有广播电视媒体的过去,哪怕一个小小的传言就会引起人们对世界末日的巨大恐慌。而今天广播电视媒体的出现又为我们呈现了另外一幅景象,对进步的迷信阻挠了主体对末日的恐慌。在无所畏惧的进步之中,主体丧失了自我意识。其一,主体失去了历史经验的价值。在进步科技面前,主体成了新的族类,每一个主体都将自己定位为“泰坦巨神”,在这种无畏的定位中主体失去了自我意识的历史经验。<sup>[1]213-214</sup>其二,主体消解了自己的道德责任。

今天,任何一个主体都不能够接触到一个产品的生产流程的全过程,每一个主体也不需要知道自己生产的目的是什么,只需要一个指示灯告诉你是否可以结束一天的劳作。对于今天的主体来说,操纵那些手柄最终是否会造成道德责任的问题已变得不再重要了,因为从他操纵手柄的那一刻起,他就把道德责任交给了机器。制造手段成为主体的目的,今天的目的也就成了无目的的目的。<sup>[1]219-225</sup>主体的非自我认同性在技术进步的今天达到了高潮,自我意识的丧失促使主体成为失去历史、失去道德的机械存在物。

## 三、从追问到回答:希望性主体的现实生成

在安德斯看来,进入技术时代,人的主体性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今天的主体在机器面前甚至一无是处。然而,我们是否真的要做出一个流行的判决:“主体已死”?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主体的根本表征就在于他是“面向未来而在”的存在者,主体需要借“未来之维”而获得意义。<sup>[8]</sup>笔者认为,“主体已死”不过是一种悲天悯人的忧伤情怀,随着时代而死亡的只会是主体的过时的形式,主体性乃人的一项本质属性,只要人类存在一日,人的主体性就存在并向前发展一日。因此,对“主体已死”的逻辑追问就必然指向“人类主体性的发展前景也依然是极其光明的”<sup>[9]</sup>回答。

### 1. 作为肯定性的主体与存在

作为主体的人总会在强大的机器面前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迷惘,总会在奋然前进的技术面前感到一种迷失前途的悲伤。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反思能力的主体总是会否定自身。在《过时的人》中,安德斯对主体的存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今天的主体已经失去了自由、尊严和存在的意义,不断地向机器出卖着自身。

在安德斯看来,主体的世界满是荒凉,主体的双眼满是悲观主义色彩,主体的存在前途迷茫。然而笔者认为,主体的本质及其存在结构具有双重统一性:现实的主体总是否定性肯定性的统一,不仅有对过去和现在的不满与否定,还有对将来的期盼与肯定。作为主体的人总是在近乎绝望中希望着,其所内蕴的否定的品性,始终以其“不是其所是”或者“是其所不是”为主体带来“是其所是”的希望与憧憬。<sup>[10]</sup>

现实的否定性总是为主体转化为将来的肯定性。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人是一样应该超越的东西”,只有这样人才能成为“超人”<sup>[11]</sup>。一方面,主体不断地变革和美化现存社会,而这种变革和美化就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否定。主体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不可能是柏拉图所描述的理想国,总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作为主体,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发现着问题,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也同样发现着问题。于是,生成着的主体不断地对现存社会进行否定,从而获得一个肯定性的、暂时的完美社会图景。另一方面,主体“面向未来而在”的品格决定了其必定要重新对先前形成的完美社会图景进行二次否定。于是,我们对自己“不是其所是”的未来之维的否定立场诠释了主体的肯定性品格。但是,主体对自己“不是其所是”的否定则更加表现了主体对未来的肯定。

总之,“面向未来而在”的主体的肯定性与否定性是内在统一的。当我们在描述主体的否定性时,事实上我们就在肯定主体的肯定性;而当我们在描述主体的肯定性时,我们可以说既是一种否定又是一种新的肯定。因此,安德斯的缺陷就在于他只看到了主体的否定性的一面,而没有透过这种否定性看到其中所包含着的肯定性,从而将主体引向了虚无。

## 2. 作为实践性的主体与存在

主体作为理论性的存在没有错,但是,我们

首先应该认识到,主体实现由否定性向肯定性转化的根本途径是其实践性。作为一位睿智的德国哲学家,安德斯很好地运用了思辨的方法,从电视机到计算机再到原子弹,没有一项技术能逃过他的思辨方法,其批判理论展现了其深邃的智慧眼光和思想内涵。但是我们要说,安德斯的批判仅仅停留在静态的理论上,忽视了主体是现实变动着的存在。在安德斯的笔下,仿佛所有的存在者(物)都只是作为理论性存在物而存在着,仿佛今天的主体又重新变为黑格尔的“绝对的精神主体”。然而主体的最大特性正在于其实践性,人正是在生产劳动这种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中证明了自己的主体地位<sup>[12]</sup>。理论和实践虽然都是主体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但理论只是主体暂时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主体总会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修正旧有的理论并产生新的理论,从而不断生成自身。所以,实践性才是主体的最大特征。

静态的理论总会转化为主体的生动的实践。如前所述,主体的否定性总是肯定着主体的肯定性,而这种以理论形式表达出的肯定的发生正是通过主体的实践活动才得以完成的。首先,主体在实践活动中总会将客体固化为静态的理论成果,实践的成果也只有固化为理论才能够为其他主体所知悉,主体才会形成关于自己的理论。其次,主体总会从旧的理论走向新的实践。由于理论是静态化的前人的成果,而主体的生存环境又会不断地产生变化,所以主体又会重新走上实践的道路。最后,主体总是在实践中检验、修补、完善旧的理论,形成新的理论,并在新的实践中进行检验。这表明主体是作为实践性的主体而存在的。

在《过时的人》中,安德斯虽然深刻地揭示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主体的一系列“羞愧”,并宣称“过时的人”的客观情况。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安德斯的批判理论作为静态

的固化形式,很难完全与今天的主体生存境况相适应。实践着的主体作为“面向未来而在”的存在者,有希望也有能力解决由于自己一时的自傲而导致的“羞愧”,终将在实践中走向光明。

### 3. 作为社会性的主体与存在

作为个体性的人总会在面对技术困境时感到一股涌上心头的孤独与无助,在完美得不能再完美的机器面前,个人的地位总是显得那么低下,以至于个体已经忘记了自身的存在价值。在讨论人的主体性问题时,安德斯兼顾了主体的个体性与社会性,这有其合理性,因为现实的主体首先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而个体的存在又离不开社会。但是安德斯对主体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分析存在着不对等性。在分析“主体的过时”时,他把主体放在社会中进行阐述,描述了“大众的羞愧”,但是在分析“希望的主体”时,他又把主体放在个体性上进行强调,描述了“没有人的世界”。这一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主体的个体性与社会性是不可分离的,在面临技术危机时,主体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

主体的个体性总会寻求社会性。在上文中我们已指出,主体总是作为实践着的主体而存在的,“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sup>[13]</sup>。也就是说,主体在实践活动中总是将个体性的自我转化为社会性的类存在。安德斯忽略了主体的生命自觉一旦达到类存在,就会超越个体的狭隘立场而转身面向整个世界,去寻找主体自身的意义,去发现主体的尊严和价值,并自觉地把社会的任务当成个体的任务来完成。只有当主体达到这种社会性的类存在时,主体才会发现自己是自由的、幸福的存在者,才会觉得自己的自由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

保护,自己的未来是那么的清澈澄明;反过来,主体只有在社会性中体验到自己是如此的自由,自己的个体性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发展,才会不断地去追求自己的社会性。正是在这种无限的追求中,主体才不会成为“过时的人”。

所以,只有通过类存在,主体才能一起面临困境、一起承担责任、一起迎接希望。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的那样,“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sup>[14]</sup>。在这里我们看到,主体只有在社会性中才能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二重性意识,成为生成着的存在者。就此而言,安德斯对主体社会性的片面理解,可以说是一种伟大而又失真的描述。

## 四、结语

在科技发展如此迅猛的今天,世界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改变,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关于主体有如此杂多的知识,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对主体的存在问题讨论得如此激烈。在安德斯的眼中,今天的主体已经陷入“过时”这一无法挽回的忧伤之中。然而笔者认为,技术主体必须确定,在什么地方我们对科学技术的肯定化为怀疑,又在什么地方我们对科学技术的怀疑化为肯定,主体生活的时代要求主体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技术。只有这样,主体才不至于因过分悲伤而陷入“否定的人类学”,也不至于因过度喜悦而陷入“自傲的中心主义”。只有怀着这般心态,我们对技术主体的批判性追问才会在现实的希望召唤中走向主体的生成。

### 参考文献:

- [1] 京特·安德斯. 过时的人:第1卷[M]. 范捷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 [2] 黑格尔. 逻辑学:上卷[M]. 杨一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70.
- [3] 康德著. 实践理性批判[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19.
- [4]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下卷[C]. 孙周兴,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6:1146.
- [5] 孙周兴. 虚拟与虚无——技术时代的人类生活[J]. 探索与争鸣,2016(3):40.
- [6] 杨耕.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74-180.
- [7] 京特·安德斯. 过时的人:第2卷[M]. 范捷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45.
- [8]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6:368-377.
- [9] 段德智. 西方主体性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发展前景——兼评“主体死亡”观点[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5):650.
- [10] 段德智. 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之超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11.
- [11] 尼采. 苏鲁支语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5.
- [12] 王良铭. 马克思对近代西方哲学主体性思想的扬弃[J]. 江苏社会科学,2008(6):54.
- [13]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53.
- [14]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1.

## (上接第21页)

- [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4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11.
- [5]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7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6]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7]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8]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9]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 [11]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8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3.
- [12]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5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48.
- [1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C].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8.
- [14]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7.
- [15] 胡锦涛.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5.



引用格式:杨晓,王凌云.“极端选择”与“不稳定的平衡”——韦伯与伯林价值多元主义思想之异同[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6):38-45.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6.006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6-0038-08

# “极端选择”与“不稳定的平衡”

——韦伯与伯林价值多元主义思想之异同

## Radical choice and unstable balanc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value pluralism between Weber and Isaiah Berlin

杨晓, 王凌云

YANG Xiao, WANG Lingyun

郑州轻工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 关键词:

以赛亚·伯林;  
马克斯·韦伯;  
价值多元主义;  
共鸣能力;  
极端选择

**摘要:**马克斯·韦伯和以赛亚·伯林对于价值多元主义的理解多有相通之处,而对个人的选择和价值的不可通约性的理解却大相径庭。关于不同价值的折中,伯林比韦伯更乐观。因为伯林认为人们彼此之间通过“移情”能力是可以交流的,通过对基本道德范畴的理解交流可在这些不可通约的价值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由于韦伯的思想体系中缺少伯林这种不同立场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与共鸣,因此不同价值观念之间开展对话的可能性就被排除了。

收稿日期:2017-08-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4CZX060);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6BKS018)

作者简介:杨晓(1981—),男,河南省郑州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王凌云(1990—),女,河南省郑州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1997年马克斯·伯林去世后,对他进行褒奖和质疑的声音同时出现在全球学术界。备受关注的是1998年由德沃金发起的对伯林“遗产”的商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德沃金指出,伯林的思想正在以及会继续扩大他的影响”,“我最先察觉到的就是他的价值多元主义所造成的影响”<sup>[1]</sup>。伯林在其著作中对价值多元主义的论证是非常机敏的。几乎所有阐释伯林思想的著作都对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概念达成一致的认识:价值多元主义在伯林的思想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例如,约翰·格雷就指出,在伯林各种各样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其对价值多元主义的描绘;乔治·克劳德则利用著名的“狐狸和刺猬”的隐喻称伯林是“只知一件大事的刺猬,却讽刺地成为一个价值多元主义者,一个自认为是狐狸的刺猬”<sup>[2]</sup>。

那么,伯林本人是怎样理解价值多元主义的呢?伯林认为人类的价值是客观的并且经常是不可通约和冲突的。这种理念根植于没有一种最终的解决方法去处理个人、社会或人类的价值冲突。因为价值是不可通约的,所以选择一种价值就意味着可能会舍弃另外一种价值。例如,我舍弃一些财产上的自由去援助比较贫困的邻居是悲剧性的,因为这样做会限制我用这些钱满足其他方面的需求。然而,若不帮助我的邻居同样也是悲剧性的,因为这样会减少我同邻居平等相处的机会。

作为一位思想史家,伯林将马基雅维利、维柯和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等人视为价值多元主义的先驱。伯林指出,一些思想家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人类的目标是多元的,并且个体经常要在不可通约的(有时是冲突的)价值体系间做出抉择。然而我们惊异地发现,伯林并没有仔细地讨论过韦伯这位20世纪对于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和个体的选择研究取得卓越成果的思想家的著作。这样一来,一系列问题就

吸引人们去探索:伯林和韦伯是如何理解现代性和价值多元主义的?在现代世界中,他们如何理解个体的选择性?在协助个体的选择中,理性应占据什么地位?他们虽都探讨了价值之间的冲突,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他们所谈的是同一件事情呢?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学界。

## 一、重建韦伯与伯林之间桥梁的设想

伯林本人的确没有深入研究过韦伯的著作。伯林曾在与史蒂文·卢克斯的谈话中说:“我对韦伯没有太多的了解,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我原有机会去弥补这种缺憾,但却没有去做,这是我一直懊悔的。”<sup>[3]</sup><sup>96</sup>在回答卢克斯所提出的韦伯和他自身对价值冲突理解的区别这一问题时,伯林指出:“当我之前在阐述这个思想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接触过韦伯的著作,韦伯对价值的冲突所做的阐述我也不知情。人们经常这样问我,韦伯肯定是首先对价值冲突做出阐释的,但是我确实是没有接触过他的这方面的著作。”<sup>[3]</sup><sup>102</sup>

虽然伯林本人为没有研究过韦伯关于价值冲突的著作而懊恼,但正如一些研究伯林的思想家指出的那样,韦伯与伯林之间在思想上存在着重叠,特别是在多元主义观点上有颇多相似之处。如格雷就认为:“在伯林的著作中随处都可以见到他对价值多元主义的描述,而在韦伯的思想中,他支持一种竞争的价值的观点在很多方面是与伯林相同的。”<sup>[1]</sup><sup>50</sup>克劳德也宣称:“紧邻伯林的那些先驱之中,韦伯的多元价值观点是跟伯林最接近的。”<sup>[2]</sup><sup>190</sup>受这些观点启发,笔者认为,可以尝试重建一座连通韦伯与柏林二人思想的桥梁。

首先,必须在特定的文本中比较韦伯与柏林二人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界定,特别是要重点

探讨韦伯和伯林对现代世界的理解,因为他们都宣称现代世界与价值多元主义之间有着不同寻常的纠葛。伯林对这种关系的理解非常乐观,因为他认为共鸣能力可以使处于不同境遇中的人彼此理解对方的价值;而韦伯却没有提到这种能力。

其次,要进一步就韦伯和伯林对个人选择的理解进行比较。韦伯虽然认为道德责任允许个体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实际的反应,但最终还是相信个体会被迫做出极端的而非理性的选择。与韦伯不同,伯林则认为个体有一种共鸣的能力可以帮助自己理解其他人的选择。伯林划定了共享的道德范围,这可以帮助他远离韦伯所描述的主观主义的选择而倾向于在不同的价值之间找到折中之处。即使如此,伯林还是认为在一些特定的境况下,个体亦必须被迫做出极端的选择。

## 二、祛魅的世界与反启蒙主义

韦伯关于现代世界有一个著名的描述即“祛魅”。在他看来,生活在现代世界中的个体不再是共享一定价值观念的人,现代世界与旧世界是有区别的,旧世界是信奉“有机循环的生活”和在“具体的魔法”<sup>[4]140</sup>下万事万物都相互联结的,生活在“有机循环”下的个体有机会完全掌握关于“生活的条件”的知识,他们不但能理解为什么需要一些特定的工具,而且也熟悉这些工具的基本功能。<sup>[4]139</sup>相反,生活在现代世界中的个体则忽略了他们所依赖的工具:“除非他是一个物理学家,否则驾驶电车的人是不会了解这个车是如何移动的。他也不需要知道。他可能满足于驾驶电车的价值,并且他也使他的行为符合这种期望;至于这个车是如何工作的他一无所知。”<sup>[4]139</sup>对于无知的骑手来说,在物理学的维度上得知这个车如何工作,这种知识的摄取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愿的。如果他

求知的欲望非常强烈,那么他就可能从科学的方面来解释这个车的工作原理。在韦伯的“祛魅的世界”中,个体可以通过他们的生活境况去学习基本科学知识。在韦伯看来,通过这种方式所形成的对世界的观点,一方面割裂了理性认识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割裂了理性认识与感性经验的关系。在这些情形中,“这里不存在神秘的无法预知的力量……原则上,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所有的事情”<sup>[4]139</sup>。

在现代世界中,由于一切事情都可以通过计算和科学分析而掌握,韦伯由此认为“最终的和最崇高的价值已经退出了公共生活”。这样,公共体的价值(特别是形而上的或精神上的)、独特的价值范畴、先前的崇高价值,都形成一股极强的竞争力量。韦伯在《拒绝宗教》中描述了这一过程:不再高尚化的、独特的价值范畴蜕变成为按照自身的特殊法则和目的而运行的自制力量。与之相应,生活在一定体系之内的个体必须采取适当的行为去适应这个体系的要求。例如,在特定的现代经济领域内,人们的行为必须符合资本主义的计算,而在现代的政治领域内则必须遵循力量的积聚和使用。<sup>[4]139</sup>

因此,在一个“祛魅的世界”中,不但没有获得公众赞同的价值,而且每一个独特的价值领域都有其自身追求的最终目标,相应地也有达至这些目标的理性的方式。这也就意味着对一个人是合理的观点对另外一个人却是不合理的。在现代经济领域中,遵循一种审美观点的生活方式是与该领域中的资本积聚背道而驰的。“当他们的世界没有把上帝和魔鬼祛魅时,我们以古代人的生活方式一样生活,我们仅仅生活在不同的感觉……命运中,肯定不是科学中,支持这些神祇和他们之间的战争。”<sup>[5]148</sup>科学可以向我们解释,经济领域是以资本积聚的神圣性为主,而艺术领域则是以创造美的神圣性为主,但是科学不能控制这些神祇“之间



的永恒的争斗”<sup>[5]149</sup>。生活在现代世界的个体面对着如何做出有利于自己利益的选择的问题,这一选择又与他们自身不同的神圣性相关联。基于这种英雄主义的观点,韦伯在不同的视域中都暗示了个体的内在自治面临着威胁;他看起来害怕这些自治和个人英雄主义将逐渐地蜕变成“没有精神的专家,没有灵魂的感觉主义者”<sup>[5]123-124</sup>。

与韦伯把价值多元主义理解为现代性的产物不同,伯林认为其并不是形成于近代而是到了现代才被发现的。这两种看法差异虽小却至关重要。对韦伯而言,独特的价值领域的形成并非源自其崇高性,形成之后亦毋需合理化为其所是的方式。反之,对伯林而言,价值多元主义或多或少地内在于人的生存样态的本性。而对价值和目标多样性的发现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今天没有人会质疑如下的假定:多样性优于一致性,以至于单调和一致都被归入贬义的领域……不过,从时间轴上而言,这些假定并没有悠久的历史;而这些根植于柏拉图所开创的传统之中的概念却更为久远:“真理是唯一的,谬误却有很多,因此一是好的,多则为不好的……在古代世界里,有谁会谈论和在意生活或思想的多样化呢?”<sup>[6]210</sup>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挑战了“艾奥尼亚谬误”。这种理念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唯一的答案,并且这个答案是可以被人类所认知的;而正确的答案之间又都是和谐共存、彼此之间不会冲突的。这种被伯林称作“无限的智力拼图”的信念出现在很多场合,笃信这种信念的人无一例外地都确信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所有的价值冲突都能达成和谐一致。对他们而言,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才能确立一种人类所需的合适目标。因此,“唯一不能解决的问题或多或少都会跟技术有关:人们如何在社会层面或心理层面所提供的技术支持的基础之上选择最好的、最适

合人们所需的目标,并找到最合适的保护这些目标的方法”<sup>[7]69</sup>。对伯林而言,反启蒙运动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其以崇高的特殊性摒弃了普世的理性主义。这种对一元论的拒斥早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之中就初现端倪。“如果个体选择遵循基督徒的道德价值的话,那么就必须放弃一切希望罗马或希腊,或人类能茁壮成长的高尚的和光荣的社会体系。”<sup>[7]303</sup>

出于对一元论的拒斥,伯林接受了马基雅维利所秉持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在不同价值体系之间并没有一种清晰的和权威的衡量标准,并且人们所做出的任何选择都将会导致一定的牺牲。同样,这种观点也在维柯的著作中出现。维柯认为,人性在不同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中各有各的风格与判断标准。因此,他认为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必须采用一种异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维柯这种对人性的认知和对多元文化存在的判断被赫尔德继承并加以扩充。伯林指出,在德国、葡萄牙和中国等文明之间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它们之间仅仅是不同的;因为他们是不同的,所以他们就寻求不同的目标;因此就存在他们彼此之间独特的特征和价值”<sup>[6]42</sup>。伯林把价值多元主义的发现归功于赫尔德和维柯独特思想的持久影响力。二者认为:在不同文化体系中生活的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可能并不相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相互理解彼此的文化。这种不同文化之间彼此相互理解的桥梁就是伯林所谓的“移情”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促使人们相互理解、相互学习。虽然“移情”的能力可以成为沟通不同文明之间的桥梁,但是伯林依然强调不同价值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在他看来,价值会在不同的层面之上相互冲突,而“在个体面对正义、严格的公正等对一些人来说是绝对价值的个体身上价值很容易地就导致冲突,这与发生在具体的事例中的并非绝对价值的同情、怜悯等价值并不

和谐。”<sup>[7]10</sup>

由此可见,伯林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元论所倡导的存在一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或真理。对一元论者而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是确实存在的,如果人们找不到这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真理或答案,那是人们的能力受到了限制。伯林的观点恰恰与一元论者的观点相反。他认为,我们生活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根本就不可能获得一种明晰的、一致的答案。所有历史上对此类问题的答案永远不会一致,永远只能处于争论之中。伯林的理由是这些答案都不是对世界本质的认知,而仅是答案的提供者个人的价值或好恶的反映。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旨在提醒我们:在人类基本问题上,看法的争论与答案的莫衷一是并非一种暂时的状态,而是人类的基本存在状态,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充满了纷繁复杂的价值,这些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的价值并不是一致的,而是复杂多样、充斥着各种冲突。正如 A. 麦金泰尔所言:“人类的善的多样性和异质性,致使人们所追求的不可能与任何单一的道德秩序相吻合,因而,不论是有上述这种吻合企图的社会秩序,还是把某种利益强加于其他利益之上的社会秩序,都必定成为对人类现状的可怕约束,而且很可能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约束。”<sup>[8]42</sup> 不论是韦伯还是伯林,他们都坚信在我们的生活中各种不同价值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不可避免。伯林曾不止一次地警告世人:如果我们无法认清我们所处的境况,无法避免这种诸善不相兼容甚至相互冲突的状态,那么以往人类历史的惨剧将会重演。对伯林而言,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勇敢地去直面人类所面临的存在样态,这比漠视或选择性地遗忘更加明智。也唯有如此,人们才可能运用自身的智慧去面对复杂多样的难题,解决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因此,即使伯林认为一些价值是不可通约的,但是他仍然比

韦伯更乐观地看待这些多元的价值和现代性世界。伯林的这种乐观根植于他对于追求不同信仰的个体之间不同程度上的相互交流和理解的信念。综上所述,这些促进交流和相互理解的因素在韦伯的涉及独特的合理性的价值领域中是找不到的。

### 三、合理性决策与道德间不稳定的平衡

韦伯把现代世界理解为一种不但缺少价值本质而且缺乏一种公众接受的价值和一种形而上观点支持的“祛魅的世界”。在现代世界中,个体被迫在不同的价值领域之间做出选择,外在的指引如科学和信仰在帮助个体于不同的价值领域做选择时仅仅只能发挥最小限度的帮助。然而,尽管韦伯否认在不同价值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有一种统一的标准,而遍及其著作中的伦理感却表明韦伯并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

韦伯认为,生活在现代这个“祛魅的世界”中找寻一种难以琢磨的语言或“救世主”会导致焦虑的出现。然而这些个体又渴望迎接一个拒绝承认这个“祛魅的世界”新的先知。韦伯看起来似乎相信这些生活在现代世界的个体基于责任去把自己托付给这个有局限性的世界。“对一个不能反抗他们时代命运的个体来说,其正常的确定公开的背叛是不可取的,简单而明白的就是回归沉默。旧的基督教会广泛地和富有同情心地对待他的。毕竟他们不会使他太为难的。”<sup>[4]155</sup> 虽然韦伯宣称他不会责难这些遵循这条路径做出选择的个体,但他显然认为这些人并没有正确地面对这种现代性的生活。然而,韦伯也明显地指出这些回归基督教的个体避免了学院派先知所遇到的困难。“一些宗教的立场是远远高于这些在大学的教室没有其他的美德但拥有完整的智力的学院派的预言的。”<sup>[4]155-156</sup> 因此,当这些接受基督教信心疗法的信徒并不能

因他们的勇气而被人们钦佩的时候,至少他们并没有违反这些统治独特价值领域的法则;同样不能被钦佩的也有学院派的先知。这些错误的预言侵犯了知识价值领域的基本逻辑。

对于韦伯来说,知识和科学并不能决定个体应该如何选择。尽管所有的科学探究都深深地被科学家本人的负载价值所影响,但是没有一种科学分析能决定个体选择什么样的价值对他自身来说是合适的。虽然科学家可以证明存在着特定的选择,以这些行为的付出和收获来评价这些价值,但是并不能确定哪种价值是最好的或最正确的。韦伯指出:“把这种分析的结果应用在如何选择价值上是科学家并不能承担的任务;更不用说是自愿的行为者的任务:他在按照他自己的良心和他对世界的看法衡量和选择这些价值。”<sup>[4]53</sup>由此可见,在韦伯看来,并没有一种科学的方法可以赋予这个世界以特殊含义。面对他们的追随者,学院派先知对此予以否认。

此外,学院派先知侵犯了政治领域的自治。这种侵犯很明显地可以从韦伯对政治领域的合适性和演讲台的合适性之间的区分中显示出来:“采取一种实用的政治立场是一回事,而分析政党的结构和政党的立场是另外一回事。当在做一个关于民主的演讲时,人们并不隐藏自身的立场;甚至,达至明晰的结果和采取一种立场是他的义务。他所使用的话语并不是经过科学分析的,而是能尽力说服选举者和战胜对手的语言。它们并不是犁开现代性思想的犁头;它们是反对敌人的刀剑:言语就是武器。然而,在大学教室使用这些言辞则可能是一种暴力。”<sup>[4]145</sup>当个体使用政治术语的时候,他们试图说服他人,他们的要求并不是中立的和客观的。这种言辞在政治领域中是合适的,因为它的特质允许其对手也使用相同的言辞作为武器去捍卫他们自身的选择。然而,这种言辞用在

科学分析的场合却是不合适的,因为它的目标并不是说服和战胜对手。因此,一个利用言辞作为武器的演讲者在宣讲自己的价值选择而忽略其他具有代表性价值的时候,他是处在一个不平衡的立场上的。

这种对在不同领域中的特殊行为的讨论多见于韦伯的著作。综上所述,韦伯暗示生活在现代世界中的个体有责任去认识这个“祛魅的世界”的本质并由此做出自己的选择。依据这一论点,当个体在不同的领域中行动时,他有责任说服他人按照一种合适的方式去行动。无可否认的是,上面的讨论并没有过多涉及韦伯关于最小感觉上的伦理的观点,对此更清楚的阐释出现在他的《以政治为业》中。在这篇论文中,韦伯指出政治家必须在相互冲突的伦理价值的选择中保持平衡:确定伦理原则(关于什么是善——康德的术语)和伦理责任(关于如何产生善——马基雅维利的术语)。在最终选择之前的行为中,韦伯式的政治家必须决定何种伦理该被遵循。这也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同他自身协商的选择:“一个人是否应该在信念伦理或责任伦理的基础上去行动,当一个人应该遵循这个或另一个时,他就没有能力去给任何人做出指示。”<sup>[4]367</sup>韦伯所描述的政治家是一个“成熟的人……能感受他自己的灵魂的可以承担他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果的责任”<sup>[4]368</sup>的人。在这篇文章中,韦伯又指出,所有人在这两种伦理中都可以做出选择,只要“我们不是在思想上死亡的”<sup>[4]368</sup>。这是一种限制性的确定的标准,但也仍然是一种伦理学的标准。

可见,韦伯清晰地描述了关于合适的政治选择的伦理学维度。这一选择的结果可能会造成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来源于强制的政治工具。虽然韦伯鼓励政治家衡量使用强权的利弊,但内在于他的责任伦理的是一种对务实的反思的赞赏。确切地说,一个“内在思想没有

死亡”的个体需要去面对他所做出选择的那个境遇。这样所做出的强迫的决定将必须考虑究竟能否达到渴望得到的结果?同时还要考虑究竟能否避免消极的或致命的外部因素?

这种对务实的反思及其在政治领域中的扩展构成了韦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维度。在韦伯看来,人们可以在其所欲遵循的神圣性之间做出选择,个体可以在有限的程度内进行务实的反思并遵循这种规则产生出结果来。然而,这种延伸可能是公正的,因为从中可以得出合适的结论。最终,对韦伯来说,真正的决定是对内在的反思而不是对外在境遇的反思。对此,韦伯讲得非常深刻:“当你决定去拥护自身的立场的时候你信奉自己的神而别人信奉其他的神。如果你坚定自身的信仰,你将会达至一种确定的主观主义的有意义的最终的结论。”<sup>[41]152</sup>要突破潜在的对外在境遇的反思的限度,个体就必须做出极端的选择,即基于信仰之上的选择。

对于普世性的、试图按照抽象度量方法给价值判断制定标准的理性主义,伯林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对于伯林来说,选择是内在于人类社会的本质,任何试图约束或限制个体做出选择的行为都应该被怀疑。这种观点与之前韦伯所陈述的个体“不能承受作为人的时代命运”而回到教堂的观点相比,非常引人注目。尽管韦伯暗示躲藏在教堂里面所做出的决定忽略了现代世界的真正的内在职责,但他并不主张谴责这种行为,相反,伯林却谴责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否受到精神上独断主义或理性上独断主义的影响。

相对而言,认为在特定领域中做出极端选择的几率,伯林远小于韦伯。与韦伯认为个体要完全依赖信念所做出的选择是非理性的不同,伯林则认为人们有能力去构建一种针对具体情境下的所发生的具体事件的处理方式,基于这种处理方式所形成的理念可以帮助生活在

多样情境之中的人们务实地做出决定。作为一个理性的自由主义者,理性对伯林而言就是灵活性地和现实主义式地认知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理性具有选择能力这样的内在属性,如果理性观点需要一种正常的领会真实世界的的能力,周旋于较少摩擦力的中间,仅仅渴望什么是一个人该持有的,并没有被可供选择的的东西吸引,永远也不寻求不可通约的目的,那么人们就会生活在一种和谐的幻想之中。”这种理性观点表明,我们所拥有的选择的权利是人之为人的标识,能证明手段的合理性但不能证明目的的合理性,“一种理性的目的……对我而言是不能理解的”<sup>[9]47</sup>,不能决定我们所做出的选择:“机械的或演绎的方式不能达到正确的政策,不存在知道我们的固定不变的规则:条件常常不明显,原则无法被分析或表达。”<sup>[9]47</sup>启蒙主义深信社会发展的法则和秩序都必须通过理性得以建构。伯林在批评启蒙主义这种幼稚的观点的同时回应了韦伯所提出的对科学理性的限制。对韦伯而言,我们的日常生活知识必须依靠科学和理性的帮助来获得,但是选择的能力游离于科学和理性的范畴之外。与此相反,伯林认为,通过理性认知,人们可以发现不同价值之间可以共享一种“基本的道德范畴”。

相比之下,伯林的批判性参与的态度可以使他在多元的、不可通约的价值之间做出决定。他认为:“在相互冲突的价值和目标之间,即使他们不能避免,也是可以变得稳定的、平衡的,折中是可以达到的。在具体的情形中并不是每一种主张都有相同的力量……优先权,没有最终的和绝对性可以建立。”<sup>[41]14</sup>韦伯式的政治家在决定是否实施暴力的时候要对环境条件进行常规评价,而伯林式的政治家则需要理解“具体情形”的本质。然而,笃信伯林理念的行为者坚信自身具有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可以使他们在不可通约的价值之间游刃有余地达成一种

平衡和折中。基于一种共享的“道德范畴”,伯林认为,在每一个社会中“我们必须参与到所谓公平交易的原则中去,在价值多样化的范畴中价值原则必须彼此做出让步。功利主义者的解决方法有时是错误的,但在多数情况下是有益的。基于一种真正的规则,维持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可以防止发生不可收拾的局面——这是一个文明社会的第一要务;在我们有限的知识领域内,依据我们对于社会和个人不够完整的理解,这个基本要求值得我们始终努力。此时保持一点谦卑还是很重要的”<sup>[6]18</sup>。尽管伯林认为平常的境遇可以通过公平交易原则和折中的方式去处理,但他很清醒地认识到还存在一个“尖锐的道德两难困境”是不可能通过公平交易原则去解决的。<sup>[3]106</sup>因此,个体在所遭遇的缺乏公平交易和折中方案的极端情境中,不得不做出极端的选择。

#### 四、结论

不管是伯林还是韦伯,他们都认识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极其复杂,要在多样化的、不可通约的甚至彼此冲突的价值之间达成一致非常困难。由此,他们认为个体必须被迫做出选择。关于不同价值间的折中,伯林比韦伯更乐观。因为伯林认为人们彼此之间通过“移情”能力是可以交流的。与伯林相比,韦伯则认为现代世界中的个体都是原子主义式的,彼此之间的冲突和斗争耗费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没有时间去确立一种共享的道德感或道德范畴。没有这种共享的道德范畴,这些个体就会被迫以他们自身的主观因素为基础做出选择。在面对多元价值彼此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境时,伯林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观点。他认为,人类可以通过对基本道德范畴的理解和交流而在这些不可通约的价值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伯林这种乐观主义体现在乔纳森·莱利

把伯林称之为“真正的理性主义者”的评价之中:这种理性的本质是弱读式的,是直接指向伦理和政治生活的理性。尽管这种弱读式的理性可以帮助我们在处理具体的境遇中的价值冲突时达成一种折中的方案,但其并不能给我们提供一种普世主义的方法去协调或者压制这些冲突;这种弱读式的理性也不能帮助我们走出尖锐的道德两难困境。然而重要的是,与韦伯不同,伯林认为做出这些决定的时刻可以成为规则之外的特例,可以促使我们避免放弃启蒙时代的梦想,使一个理性的、文明的社会得以维持。<sup>[10]</sup>

#### 参考文献:

- [1] 约翰·格雷. 伯林[M]. 马俊峰,译. 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
- [2] CROWDER G. Isaiah Berlin: liberty and pluralism [M]. MA: Polity Press, 2004.
- [3] LUKES S. Isaiah Berlin in conversation with steven lukes [M]. Salmagundi: Saratoga Spring, 1998.
- [4] WEBER M.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 [5]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M]. 于晓,陈维纲,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7.
- [6] 以塞亚·伯林. 扭曲的人性之材[M]. 岳秀坤,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 [7] BERLIN I. 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an anthology of essays [M].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Inc, 1998.
- [8] 麦金泰尔 A. 德性之后[M]. 龚群,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42.
- [9] 以塞亚·伯林. 自由论[M]. 胡传胜,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 [10] 杨晓. 多元价值的不可通约与多价值之间的“不稳定平衡”[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14.



引用格式:任帅军. 人权价值:从抽象到具体[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6):46-51,62.

中图分类号: B018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6.007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7)06-0046-06

# 人权价值:从抽象到具体

## The value of human rights: from abstract to specific

任帅军

REN Shuaijun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人权是抽象人权和具体人权的统一体,其价值因此亦具二重性:作为抽象价值,是表达人权规定性的概念;作为具体价值,是体现人权内容的概念。人权价值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化,是双重人权价值相统一的根据。人权价值的实现就是人权价值的生成,而人权价值的生成就是人权价值的具体化、对象化。从具体的现实生活出发实现人权价值,从解决具体人权问题出发实现人权价值,从不断生成人权价值出发实现人权价值,是推进人权价值不断由抽象而具体化的重要进路。中国政府始终重视和保障人权,致力于实现人权价值不断由抽象走向具体,经济不断增长所带来的创新价值、政治不断进步所产生的开放价值、社会不断提升所营造的协调价值、文化不断发展所构建的共享价值、环境不断改善所实现的绿色价值,就是人权价值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等领域的对象化和具体化。

**关键词:**

人权价值;  
抽象价值;  
具体价值

收稿日期: 2017-02-26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2016EKS006);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系列项目(2017XAH001)

作者简介: 任帅军(1984—),男,山西省河津市人,复旦大学讲师,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人权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人权价值是关于主体的人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基本价值的理论抽象,所反映的是人权对人生存和发展的具体的价值需要和价值取向。在现实生活中,为了表达的方便,人们经常不加区分地混用人权价值概念,不禁使人产生疑问:人权价值表达的到底是人权的抽象价值还是具体价值?作为体现人之为人而享有其自身价值的概念,人权价值同任何价值概念一样,不是静止不变的范畴,而是一个具有二重内容并不断发展的范畴。作为抽象价值的人权价值揭示了人权的规定性,而作为具体价值的人权价值则体现着人权的内容。只有抓住人权价值概念的本质及其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化的意蕴,才能深刻理解人类为什么要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实现人权价值。因此,研究人权价值由抽象到具体的转化过程及其逻辑,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理论问题和现实课题。本文即尝试对此问题加以探讨。

## 一、作为双重价值的人权价值

人权价值是政治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人权正式被确认为整个人类的首要价值追求,是通过《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条约形式完成的,这些文件对人的自然权利作了正式肯定。人权作为实现人类自身价值的权利表达形式,虽然在启蒙思想家那里还只是作为抽象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平等权等权利口号形式出现的,它却冲破了西欧封建专制的特权统治,号召人们把一切人都作为权利的享有者一视同仁地平等对待,从而以实现人权价值的形式来实现人的解放,人类由此正式进入人权时代。人权价值概念的提出第一次明确宣称人类要通过人权形式来实现自身价值,从而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首次把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当作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来研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从资本主义新

兴文明中诞生的人权价值最初还是一种抽象的价值存在,因为资产阶级理论家在提出人权概念时只是把实现人权价值当作从封建统治者那里夺取政权的政治手段,并不是要真正实现所有人的人权价值。作为抽象价值的人权价值,把自身宣布为所有人都应实现的人之为人的价值。资本主义的这一人权价值观有其合理性,其局限性在于,资产阶级仅在本阶级利益范围内实现人权价值,从而使人权价值成为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的抽象符号。

作为抽象价值的人权价值虽被资产阶级拿来作为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但也是人类在近代认识自身价值的一种重要方式。人类一开始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必定会非常抽象。在最初阶段,人类就是从将自己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角度来认识自身价值的。人类虽根源于客观物质世界,但能通过有目的和有意识的实践使自已从客观物质世界中独立出来,这就赋予了自己的生命活动以独特的价值意蕴。所以,马克思说人类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sup>[1]</sup>。资产阶级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号召被封建制度奴役的人通过解放自己来实现自身的价值。然而,资产阶级仅仅把人权价值作为其夺取政权的政治口号,也就使得人权成了用来欺骗广大人民群众的抽象价值观念。马克思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权实质,认为资本主义的“人权本身就是特权,而私有制就是垄断”<sup>[2]</sup>。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人权价值只着眼并局限于本阶级的狭小范围,并没有深入到生活实践领域考察具体的人权价值。

事实上,作为抽象价值的人权价值并不能取代作为具体价值的人权价值。人权价值的实现总是要经历由抽象向具体的转化过程。例如,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思的基础上,1948年12月10日,国际社会以联合国大会这种最

庄严、最权威的形式,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了人权的基本表现形式:“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sup>[3]</sup>毫无疑问,这里是以抽象概括的形式表达人权价值的基本追求。而要想把宣言里的人权价值理念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就必须通过各国相应的具体法律法规,以及对人权保障的有效实施,才能使人权价值的抽象理念变成具体的现实。也就是说,即使作为抽象价值的人权价值确能展示人类为之奋斗的真理价值,也不能取代在现实生活中通过维护和保障人们的基本权利来实现具体的人权价值。因此,人权价值只有从抽象形式转化为具体形式,才能证明自己不是脱离社会实践的抽象价值存在。我们决不能将人权价值局限于抽象的认识形式,否则就无法跳出资本主义人权价值的范畴。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我们对人权价值的认识才能有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实践语境,才能将人权价值从抽象理念转化为具体实践。

人权价值从抽象价值到具体价值的转化,就是抽象的人权价值具体化的过程。从价值观念上来看,人权价值确实肯定和宣布了人之为人的权利和价值。然而必须看到,这种观念上的抽象表达并没有超越对人的抽象认识范畴。只有把人权价值的实现置于具体的现实生活世界,才能推动人权价值从抽象转变为具体。这一过程事实上也是具有抽象价值的人向具有具体价值的人的转化过程。仅仅把人当作具有抽象人权价值的存在物,对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人权问题毫无帮助。如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于1789年发表后,照样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酿成了践踏人权的

世界性大灾难。西方近代思想家虽通过人权宣言等形式确认了人权价值,使人类进入了全新的人权时代,但是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抽象人权价值不过是空洞的概念。阿伦特深刻揭示了这种抽象价值观念的局限性。她说:“人几乎不作为一种完全解放的、完全孤立的存在而出现,不依托某种更大的全面秩序而在自身得到尊严,他很可能再度消失在人群中。从一开始,在宣称不可分离的人权中就包含了一种吊诡,即它重视一种好像根本不存在的‘抽象’的人,事实上,即使连野蛮人也生活在某一种社会秩序里。”<sup>[4]</sup>

人权价值从抽象价值到具体价值的转化,就是人权价值的抽象形式与具体形式的统一。从纯粹概念的转化视角来看,作为抽象价值的人权价值还是人权价值比较初级的概念形式,而作为具体价值的人权价值则是人权价值更高形态的概念形式。人权价值从抽象价值到具体价值的转化,就是人权价值这个概念在经历“完成了的有内容的、有根据的认识”<sup>[5]334</sup>。这一过程反映到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描述具体人权价值的实现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人之为人的权利和价值是人权价值的本质要求。人权价值的概念转化就是要揭示它作为价值形态而存在的本性。正如列宁所言:“概念不是不动的,而就其本身、就其本性来讲 = 转化。”<sup>[6]</sup>因此,人权价值的转化过程并非随心所欲,而是作为基本的价值指引为人类实现自身价值提供明确的前进方向。人权价值的转化过程真实地反映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积极能动作用。这种转化深植于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并以价值的目的驱动的形式反过来给予实践以推动作用。由此可知,人权价值的实现必然伴随着由抽象到具体的转化过程,这是人权价值概念自身与生产生活实践内在关联的逻辑使然。



## 二、人权价值具体化的意蕴

人权价值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化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抽象人权价值概念本身就具有在客观世界实现自身的现实规定性。人们必须首先从观念上把握抽象人权价值的规定性,才能用它审视和把握具体的人权问题。在第二阶段,人们在具体的社会现实中把抽象人权价值放到具体的人权问题语境当中来考察它的实现。这一过程就是抽象人权价值在解决具体人权问题时转化为具体人权价值的过程。当人权价值在其具体化过程中得以实现时,人们就能将具体人权问题的解决上升到抽象人权价值的规定性,将抽象人权价值放到具体的人权问题解决中予以具体化,从而在把握人权价值的思维进程中不断实现人权价值。

人权价值的实现就是人权价值的生成。从实践角度来看,人权价值的实现就是人权价值在现实生活中从无到有的生成过程。人权价值从纯粹的抽象的概念形式转化为现实的具体价值实现,意味着人们已经把人权价值的理念追求转化成了具有客观形式的现实价值追求。人权价值的生成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在客观物质世界中,相对于动物的本能活动而言,人类的自我价值具有独一无二的创造性。人类并非天生就享有人权价值,而是懂得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并拥有人权价值,从而将自己从客观物质世界中独立出来,创造出独属于人类的价值形态世界。在这个价值形态世界中,作为主体的人必须在人类社会环境中习得人权价值的概念,并把这种抽象形式在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转化为具体的价值主张,使之符合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唯其如此,才能说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体的人诞生了。人权价值在个体层面上的生成,是它最主要的存在形式和展开方式。虽然人人都享有人权价值,但是人权价值在每

个人身上的实现程度有很大不同。既然人权价值是作为主体的个体在创造性实践活动中所享有的价值,这就决定了它在个体身上的实现与个体的创造性实践活动息息相关。个体的创造性实践活动越符合人类的本质追求,人权价值就越能在个体身上得以充分实现;反之亦然。

人权价值在个体层面的生成就是人权价值的具体化过程。在创造性实践活动中,作为个体的主体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人权价值虽以人人都享有的方式包容了这种差异性,但它在每个人身上的实现程度有很大的差异。抽象人权价值的规定性适用于所有人,因而对所有个体而言都具有同一的普遍适用性。但是,在抽象人权价值向具体人权价值的转化过程中,由于人权价值实现的具体条件不同、个体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不同,因而不同个体实际上在生成不同的人权价值,在享有不同的人权价值,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具体人权价值因而就有了千差万别的形态。这就告诉我们,人权价值的规定性要想转化为现实性,就必须深入到人类创造性实践活动当中。只有在人类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人权价值,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本质规定。

为了充分实现人权价值,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必须建立起基本的人权价值观念(具有规定性的人权价值概念)。因为个体只有在观念中把握住了人权价值,才有可能将其实现于日常生活实践当中。这种观念化的人权价值具有丰富的内容规定,这是因为“就概念作为绝对形式而言,它是一切规定性,但概念却是这些规定性的真理。因此,概念虽说是抽象的,但它却是具体的,甚至是完全具体的东西,是主体本身”<sup>[5]335</sup>。这里的“具体”是概念的规定性,作为包含抽象性和具体性于自身的表现,并不等于个体在创造性实践活动中所指向的“具体”概念。前者是后者的理论演绎,后者是前者的

实践展开。人权价值在概念阶段的具体表达恰恰是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规定。人权价值在实践中的具体实现恰恰是其概念阶段具体规定的现实展开。于是,作为规定人之为人而存在的价值概念本身,人权价值就在主体实现自身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中具体地生成了。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权价值的具体化就是人权价值的对象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抽象概念可以被看成具有抽象同一性的具体对象的规定。抽象概念是建立在对具体对象感性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反映具体对象的本质而形成的具有具体内容的整体性认识。按照这一理解,人权价值就是能反映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和价值诉求的概念。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具体人权价值概念,诸如人的生命价值、生存价值、自由价值、平等价值、安全价值、财产价值等,只要能满足人类对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价值需要<sup>[7]</sup>,就是人权价值概念在不同领域的具体表达。而人的生命、财产、自由、安全、公正等,都可以说是人权价值在其具体化过程中所指向的对象。实现这些对象的价值内涵是人权价值规定性的现实要求。在人权价值对象化的过程中,人权价值概念就由抽象的形式转化为具体的内容。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人权价值就实现了抽象形式与具体内容的统一、本质规定与现象展开的统一、客观存在与主体实践的统一。

同时还应看到,人权价值的对象化就是作为对象的某种价值的人权化。在人权价值的对象化过程中,具体人权价值总是以对象价值的形式呈现出来。此时,对象价值就是人权价值的具体价值表达。没有经过转化的对象价值与体现人权价值规定性的对象价值是不同的:前者是与抽象人权价值一样的具体规定,它是脱离了人的实践活动而独立存在的价值表达;后者是在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中实现的具体价值。因而体现人权价值规定性的对象价值就作

为双重价值而存在:一方面,它是体现其本身价值的独立价值形式,具有本身价值的独特规定性;另一方面,它是人权价值规定性在本身价值实现中的具体表达,体现着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在解决具体人权问题时产生的价值结果。人权价值就是以对象价值为内在展开环节、通过对象价值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表达。所以,没有经过转化的对象价值还不是人权价值,体现人权价值规定性的对象价值就是对象价值的人权化。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与我们的人权发展内在契合,就是因为人权价值能对象化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等领域。在这些具体领域,经济不断增长所带来的创新价值、政治不断进步所产生的开放价值、社会不断提升所营造的协调价值、文化不断发展所构建的共享价值、环境不断改善所实现的绿色价值,就是人权价值在五大发展理念所对应的对象化价值中的具体表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只有有效实现经济发展,不断完善政治发展,努力促进文化发展,全面提升社会发展,加快落实绿色发展,才能在促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推动实现共同发展。<sup>[8]</sup>

### 三、人权价值具体化的进路

人权价值的具体化是人权价值实现的重要方式。从具体的现实生活出发实现人权价值,从解决具体人权问题出发实现人权价值,从不断生成人权价值出发实现人权价值,是人权价值具体化的进程。

#### 1. 从具体的现实生活出发实现人权价值

生活世界是实现人权价值的基本条件,人们存在于其中的这个生活世界是实现人权价值的基本领域,它既是人们展开创造性实践活动的场所,又是所有人通过实现人权价值感受共同体意义的条件。每一个人都是构成这个生活世界的成员,只有把作为主体的个体看作建构

生活世界的成员,只有肯定每个人都享有人权价值的事实,才能确保每个人都有资格享有人权价值。这是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实现人权价值的首要前提。

从具体的现实生活出发,就不能仅从抽象人权价值概念出发,断章取义地理解和实现人权价值。不管是谁,要想实现人权价值都必须从具体的现实生活出发,在既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创造性实践活动来向世人展现自己作为人而享有的价值。那种只把对他人妄加评论的做法,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傲慢态度和粗暴行为。美国国务院每年所发布的《国别人权报告》,对世界各国实现人权价值的情况评头论足,尤其是针对中国人权状况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就属于典型的从自己认定的人权价值概念出发,而不是从中国具体的现实人权状况出发,看不到中国人权事业全面改善和不断进步的做法。

## 2. 从解决具体人权问题出发实现人权价值

实现人权价值不仅要靠理念的认同和宣传,还要深入具体的现实生活解决具体的人权问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就通过制定解决中国具体人权问题的行动纲领,对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确立了更高价值目标,主要包括:全面实现人民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领域的人权价值;增加全面脱贫和保护产权等价值追求;全面落实通过制度建设和法治措施保障人权价值;加大对特殊群体的人权价值保障力度;专门增加人权教育和宣传内容,以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权精神内涵,培育全社会尊重人权的文化”目标;第一次提出“搭建人权研究平台,为人权事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sup>[9]</sup>的安排,以及在配合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推进人权建设等内容。这些具体的制度、

政策和措施安排,就是专门针对中国正面临的具體人权问题而提出来的,必将对务实解决中国现实人权问题产生巨大的建设性作用。

解决人权问题,实现人权价值,不仅要靠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还要靠自下而上的人权问题解决。如何保障好的人权制度设计在解决具体人权问题时得以有序推进,是实现人权价值要考虑的重要内容。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规定,每项人权行动计划都要有相应部门负责实施。如何监督国家权力对他人权价值的保障和实现是解决具体人权问题的关键。在实现人权价值的过程中,只有形成国家力量、民间力量和国际力量之间的善意、有效和良性互动,才能使全体人民真正享有人权价值。

## 3. 从不断生成人权价值出发实现人权价值

鉴于人权价值的实现过程就是人权价值的生成过程,从作为发展权的人权来看,人权价值就是人在实现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价值表达。人权价值不会停留在人类发展的某一阶段,而是会随着人类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不断生成。<sup>[10]</sup>从作为环境权的人权来看,人权价值就是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时,实现绿色自然、和谐社会、美丽心灵和幸福生活的价值生成;从作为人权的文化权来看,人权价值就是表达人类自愿认同并生成某一价值文化下的生活方式;从作为人权的安全权来看,人权价值就是人类能过安全生活的价值诉求;从作为人权的公民权来看,发展权、环境权、文化权、安全权等都是公民权的基本内容。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人权价值的生成就是发展价值、环境价值、文化价值和安全感等的不断生成。这些价值都是人权价值具体化的价值支点,也是人权价值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展开形式。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人权价值的生成过程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他人权价值的保障

(下转第62页)



引用格式:曾耀农,张梦闪. 简析都市题材电视剧的叙事策略[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6):52-56.

中图分类号:J905;I207.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6.008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6-0052-05

# 简析都市题材电视剧的叙事策略

##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 urban TV series

曾耀农, 张梦闪

ZENG Yaonong, ZHANG Mengshan

湖南商学院 文新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05

### 关键词:

都市题材电视剧;  
叙事策略;  
都市人物;  
包装

**摘要:**都市题材电视叙剧一般以爱情、家庭、奋斗为主题,通过影像来满足受众心理的某种诉求。在叙事策略上,一方面通过设置跌宕起伏的情节,塑造典型的都市人物形象,编织复杂多变的人物关系网,设计具有时代特色的台词,实现时空的完美结合,以展现都市人的喜怒哀乐;另一方面通过对人物形象进行潮流包装,将音乐与影像恰当配合,以凸显其都市特征。“内容+包装”的叙事策略是当下都市题材电视剧火爆的一个重要原因。

收稿日期:2017-09-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CKS039);湖南省社科规划项目(15YBA243)

作者简介:曾耀农(1959—),男,湖南省长沙市人,湖南商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湖南省和平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影视美学与传播美学、文化产业。

电视剧是一种集文学、电影、戏剧于一体,以家庭为主要传播对象、叙事性较强的媒介作品,如今,它不仅仅是现代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休闲娱乐产品,还是满足人们精神、情感等内在生活需要的主要媒介。由于中国的电视观众大多具有喜欢听故事的文化传统,所以电视剧的叙事方式也就成了电视剧理论研究特别关注的课题。从1990年的《渴望》开始,中国的荧屏上陆续涌现了很多优秀的电视剧。近几年,都市题材电视剧开始占据荧屏的首位,如《离婚律师》《奋斗》《北京青年》《裸婚时代》《咱们结婚吧》《妯娌的三国时代》等。这些电视剧的高收视率不仅依赖于优秀的演员、精彩的布景、宏大的投资,更依赖于一个完整的、符合受众心理需求而又不落俗套的剧本,而电视剧文本创作最重要的便是叙事策略。本文拟在对国内外学者对电视剧叙事策略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着重从内容和包装两个方面来探讨都市电视剧的叙事策略。

## 一、国内外学者对电视剧叙事策略研究述评

对电视剧叙事策略的研究,国外学者大多认为其叙事体系应包括角色、事件和场景。萨拉·考兹洛夫<sup>[1]</sup>认为,与电影格外强调事件不同的是,电视叙事中的首要存在就是一般性的情节,其重视角色胜过重视场景,特别是在赢得观众兴趣方面。而克里斯汀·汤姆森<sup>[2]</sup>既强调电视叙事中情节的复杂性,也强调角色和场景的作用。罗伯特·麦基<sup>[3]</sup>在《故事》中指出,性格或行为中的矛盾会锁定观众的注意力。因此主人公必须是全剧人物中最多维的一个人物,以使观众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一明星角色上。很显然,他既肯定了戏剧中主人公的重要性,也强调必须通过叙事情节来突出主人公的个性。

国内对都市题材电视剧叙事策略的讨论成

果也很多。石长顺<sup>[4]</sup>认为,兴盛的电视叙事方式是当前叙事学研究的重要主题。部分学者还强调了要创作出符合受众口味的电视剧,就一定要紧跟时代潮流,了解受众所思所想,这样才能百战百胜。情节是电视剧叙事性的主要组成部分,童庆炳<sup>[5]</sup>认为,情节是按照因果逻辑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事件,而且要求在事件的发展中表现出人物行为的矛盾冲突,由此揭示人物命运的变化过程。电视剧叙事离不开人物形象的完美塑造。卢蓉<sup>[6]</sup>认为,电视剧人物形象的塑造离不开肖像的刻画、人物的境遇,以及人物性格的典型性、多重性与分裂性。曾清<sup>[7]</sup>认为,都市题材电视剧正是通过塑造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来获得观众青睐的。

可见,目前学术界对都市题材电视剧叙事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情节、人物等内容方面的探讨上。笔者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都市题材电视剧要获得观众认可与喜爱,除要讲究上述内容方面的叙事策略外,还应该对内容做进一步的包装。

## 二、都市题材电视剧叙事内容策略

都市题材电视剧的内容多表现都市人的喜怒哀乐,如《北京青年》叙述了北漂一族的生存困境与理想追求,《咱们结婚吧》描述了都市青年的婚恋状况,《离婚律师》写的是两个都市离婚律师由针锋相对打官司而产生的爱情故事。这些都市题材电视剧在内容展现方面,采取了以下叙事策略。

### 1. 设置跌宕起伏的情节

与乡村题材电视剧不同,都市题材电视剧的情节多半显得纷繁复杂,甚至有些突兀,表面上看不可思议,实则符合都市人的生活状态。《离婚律师》中到处可见夺人眼球的具有矛盾冲突的情节,如男女主角关系演变中的阴差阳错的安排,之后爱情又出乎意料地获得进展,作

为闺蜜、夫妻、对手、恋人四种不同关系的人进入同一离婚案件的矛盾起伏,还有家长逼婚使计的喜剧情节等。这些跌宕起伏又让人猜不透结局的情节,深深吸引着电视剧的观众,使观众还没有在前一个情节中回过神时又进入了一个新设置的情节,吊足了观众的胃口。阿伯拉姆在谈到情节时指出:“戏剧作品或叙事作品的情节是作品的事情发展变化的结构。对这些事情的安排或处理是为了获得某种特定的感情或艺术效果。”<sup>[8]</sup>大部分都市题材电视剧正是通过这样一系列男女交往关系的变化、跌宕起伏的奋斗过程,以及家庭伦理矛盾冲突等具体情节,令观众产生兴奋、感动、愤怒等心灵上的共鸣,从而让人们享受一次次的视听盛宴。

## 2. 塑造典型的都市人物形象

都市题材电视剧在反映都市社会热点话题时,往往是通过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来映射的,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使都市题材电视剧有血有肉。在近年热播的都市题材电视剧中,通过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来抓住观众心理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裸婚时代》中的刘易阳,浓郁、厚重的北京腔展示出其幽默大度的风格,其细心体贴的性格又包含着执着。该剧的热播,在当时的网络上甚至出现了“嫁人要嫁刘易阳”这样的热帖。《媳妇的美好时代》里余味这个负责任、迁就老婆、孝顺亲生父母也敬爱养父母的“小男人”形象,更是吸引了很多观众,女主角毛豆豆的善良果断同样也深入人心。正是由于该剧中两位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其演员也被观众分别称为“国民丈夫”和“国民媳妇”,成为当时乃至现在丈夫或媳妇的典范。这些典型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幽默且乐于自嘲,这种富有喜感的形象和语言会让观众融入轻松娱乐的氛围里,“所以,大众文化诚然离不开直接的娱乐性,但仅有娱乐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娱乐只有当其与文化中某种更根本而深

层的東西融合起来时,才富于价值”<sup>[9]</sup>。当下流行的都市题材电视剧中的典型人物大多具有娱乐精神,同时又不乏善良和正能量,使受众在观赏中轻松,在轻松中感动,这也是其吸引受众的最重要的原因。

## 3. 编织复杂多变的人物关系网

现代都市题材电视剧,已不只是陈述一两对主角的感情或者事业发展。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情感生活越来越多样与复杂,为了反映这些都市现实,都市剧只有不断地丰富剧本的人物与情节,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汇入时代的洪流。<sup>[10]</sup>在《离婚律师》中,男女主角各自的朋友圈组成了多种人物关系,通过各种各样的人物关系来辅助男女主角的感情主线索,既复杂又不失合理性。例如,剧中汤美玉是罗鹬的闺蜜,而池海东的前妻焦艳艳又是汤美玉的表妹,焦艳艳又时不时干扰池海东的感情生活,因为有汤美玉这一人物在三者之间的沟通,便经常会阴差阳错地让池海东与罗鹬之间的关系得到微妙的发展。现代都市剧中这样复杂多变的人物关系组合比比皆是,《老妈的三国时代》《妯娌的三国时代》《媳妇的美好时代》等更是有着多重的婆媳关系组合、妯娌关系组合、亲家关系组合等,这些都映射出我们现实生活密不可分的人物关系网。这既展现了都市青年生活的具体面貌,又反映了现代都市人的生活压力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圈。

## 4. 设计具有时代特色的台词

都市题材电视剧的台词喜欢借用网络流行词汇,体现了网络文化对都市人的深刻影响。在《离婚律师》中,两位金牌律师的台词就让观众耳目一新。比如,女主角罗鹬的经典台词:“男人要是敢有外遇,就算帅成周润发那样,也得死!”“离婚的时候,最大的问题不是感情破裂,是抢钱。”“单身的女人一定要买一张好床,两个人一起睡哪儿都行,床不要都行,一个人孤

单、寂寞、冷……不买张好床来抚慰自己,日子得过得多悲凉?”这些台词既富有幽默感,又指涉了我们现实生活中“小三”“剩女”、离婚率上升等热门话题。“我们还是中国好邻居。”“耶是这样的吗?太老土了,‘90后’的耶是这样的,呀比喵喵喵。”这两句台词不仅轻松搞笑,而且紧跟时代潮流,把“中国好……”句式和“90后”网络经典自拍表情融入其中。“法律只保护财产,不保护感情。”“女人经济越独立越不需要婚姻,投资男人不如投资自己。”“谈恋爱,是跟一个人的优点在谈恋爱;谈结婚,是跟一个人的缺点在过日子。”“爱情里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第三者,才是小三。”“嫁个有钱人,不如自己成为有钱人。”“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不够大,正派是因为受到的诱惑不够多。”这些台词除了幽默搞笑外,更多的是展现了现代人的婚姻观和事业观。可见,具有时代特色的电视剧台词,是都市题材电视剧被观众欣赏的不可或缺一个亮点。在网络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当人们通过各种媒体渠道重新品味这些语言时,除了能获得娱乐休闲的体验外,也可从深思中受益。<sup>[11]</sup>

### 5. 实现时空的完美组合

都市题材电视剧的叙事一般是以情感引导的交叉式时空结构来进行的,即采用时空网状的交错叙事方式。徐岱在《小说形态学》中指出:“空间解放带来了时间解放,时间解放带来了空间解放。”<sup>[12]</sup>宗家玲说:“故事最终要在时间与空间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其意义和价值。”<sup>[13]</sup>在《离婚律师》大结局中,池海东为了救受人挟持跳楼的前妻,在天台与匪徒交涉,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而在另一空间里,罗鹞听说后急忙赶往事发地。这两个空间场景设计让观众替男女主角捏一把汗。随之镜头戛然而止,由罗鹞的一段引人深思的旁白开始静止,衔接的下一镜头便是池海东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

罗鹞正在与他说话。然后通过罗鹞的画外音又回到当时事发的天台,展现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自然而然地通过空间与时间的交错呈现,既吊足了观众的胃口,又给予剧情一个跳动的节奏;既加深了观众的印象,同时又恰到好处地渲染了剧情。这样的拍摄和播放手法,在很多都市剧中都有体现。如《咱们结婚吧》中经常出现女主角杨桃回忆过去与男朋友所有的甜蜜,然后转回镜头突显现在的寂寞和孤独,这样的叙事方式能把观众的视角放大,同时也使剧情更煽情、人物形象刻画更深入。

## 三、都市题材电视剧叙事包装策略

相对于乡村题材电视剧,都市题材电视剧更讲究对叙事内容的包装,因为都市是时尚的代名词,也是现代包装艺术的诞生地。

### 1. 对人物形象进行潮流包装

都市剧作为“80后”“90后”的追捧对象,对人物形象进行包装,可使其走在时尚的前沿,引领时代潮流,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近几年的都市剧在包装造型的设计方面可谓充满时尚和都市气息,用潮流时尚、新奇古怪的造型更好地展现了当下年轻人敢想敢做的特点。在《离婚律师》中,罗鹞身着各类西装风衣,优雅摩登,魅力无穷;池海东独特的雅痞风造型,无论是西装革履、风衣大衣毛衣,还是潮范儿的多层次搭配,具有独特魅力的胡渣造型,都紧紧地吸引着观众的眼球。近些年同样热播的《奋斗》中所谓的“心碎乌托邦”(几个主人公为他们的阁楼所构想的名字),也是时下特别流行的元素,拍摄于北京的“798艺术中心”,符合电视剧美轮美奂的审美需要。都市剧中的服装配饰时尚、新颖、具有代表性的特质,符合当下大众的审美需求,深受大众的追捧。《离婚律师》热播后,演员姚晨在剧中的服装首饰就不断出现翻版,各种价位的仿品在购物网站上的销售业绩一直

领先。都市题材电视剧通过触摸时尚潮流,满足了都市发展中市民文化变迁的特殊需求,迎合了广大市民阶层的审美文化需要。

## 2. 将音乐和影像恰当配合

法国电影理论家靳蒨安·麦茨从物理学的意义上将电影的表现要素概括为影像、对白、杂音(音响)、音乐、书写材料<sup>[14]</sup>五部分,电视剧也是如此。技术人员针对不同场景制作出的音乐语言,以其特有的感染力在电视剧中表现出了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追求,为观众在荧幕上呈现出一场场视听盛宴。电视剧音乐与电视剧的主题、镜头、情节等相互配合,造就了现代版的“影视神话”。《离婚律师》主题曲《爱的勇气》是由流行音乐界“转音小天后”曲婉婷演唱的,该曲在QQ音乐刚发行一天点击率便突破100万,这与该电视剧的热播是分不开的。《爱的勇气》这首歌曲风婉转深情,每到主人公感情受到波折或者突破进展时,这首音乐便穿插于剧中,进入观众的耳中,使观众能视听结合,用心来感受剧情。这是电视剧音乐与影像配合的魔力。在都市剧《咱们结婚吧》中,女主角杨桃作为“剩女”的烦恼和期待被爱的心情,主题曲《终于等到你》与之相得益彰。同样的,都市剧中不乏一些喜剧的情节,《小爸爸》中于果与齐大圣兄弟情深,二人一嗨起来便会唱起《呼儿嘿哟》,欢快的节奏让观众不禁哈哈大笑。当然,除主题曲外,配合电视剧的音乐还有钢琴曲、二胡曲等,这些音乐随着电视剧播放的影像时而悠扬,时而悲伤,时而欢快,时而凝重。电视剧音乐,有的是因为音乐本身流行而造就了都市剧的流行,有的是因为都市剧的流行而使其变成当下流行音乐。总之,当下都市题材电视剧的热播与剧中音乐对剧情的渲染是分不开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以《离婚律师》为代表的都市题材电视剧确实有许多创新之处。随着都市的快速发展与观众审美观念的

嬗变,需要更多的都市题材电视剧来满足受众的精神需求。电视剧编导应紧跟时代步伐,研究都市生活,反映都市人的喜乐衰乐,唯有如此,才能拍摄出更优秀的反映都市生活题材的电视剧。

## 参考文献:

- [1] 萨拉·考兹洛夫. 叙事理论与电视[M]//罗伯特·艾伦. 重组话语权力:电视与当代理论批评. 牟岭,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2.
- [2] 王一川. 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J]. 艺术广角,2001(9):65.
- [3] 罗伯特·麦基. 故事[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445.
- [4] 石长顺. 电视话语的重构[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87-89.
- [5] 童庆炳. 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12-213.
- [6] 卢蓉. 电视剧叙事艺术[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 [7] 曾清. 热播都市题材电视剧的文化倾向[J]. 电视研究,2008(10):87.
- [8] 阿伯拉姆 M H. 简明外国文学词典[M]. 曾忠祿,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256.
- [9] 王一川. 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J]. 艺术广角,2001(9):65.
- [10] 马田田. 都市题材电视剧受众研究[D].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4.
- [11] 彭文祥. 都市想象与表意的焦虑[J]. 中国电视,2010(7):18.
- [12] 徐岱. 小说形态[M].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209.
- [13] 宋家玲. 影视叙事学[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158.
- [14] STAM R. 电影符号学的新语录[M]. 张黎美,译. 台湾:台湾远流出版社,1997:115.





引用格式: 中国政治宣传片的平民化取向探析[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6): 57-62.

中图分类号: G223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6.009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7)06-0057-06

# 中国政治宣传片的平民化取向探析

## On civilian orientation of political propaganda video in China

王春枝

WANG Chunzhi

中原工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7

**关键词:**  
政治宣传片;  
平民化;  
移动视频;  
多媒体;  
情感共鸣;  
代入感

**摘要:**科技的发展和媒介环境的改变,促使中国政治宣传片出现了许多新变化:综合运用多媒体形式,实现多渠道多角度传递;以平民视点切入,注重个性化叙事与情感诉求,以平等的姿态呈现出鲜明的平民化取向;以注重画面感染力的视觉元素和强调受众代入感的听觉元素从高大上的视觉风格中摆脱出来,以接地气的形式呈现、传递政治理念。高高在上的政治传播以贴近受众的有效媒介文本呈现,注重受众感受,力求以喜闻乐见、轻松活泼的形式诠释严肃宏大的政治话题,这表明中国政治宣传片日渐贴近平民大众。

收稿日期: 2017-10-08

基金项目: 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2017B363)

作者简介: 王春枝(1974—),女,河南省周口市人,中原工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艺术与传播。

宣传片起初是指直接服务于某种政治宣传任务的宣传画式的短片。随着时代的发展,宣传片逐渐分化为政治类和商业类两大类型,其中商业宣传片更是占据了主流,而之前宣传片的界定也因其浓重的时代痕迹不再适用。国玉霞等从广义的角度重新定义了宣传片:“传播者有目的地选取一定信息,通过现代媒介对受传者进行说服,从而使其产生影响的影(视)片类型。”<sup>[1]</sup>可见,如今的政治宣传片就是专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宣传片,它是政治和宣传片两个范畴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交集形成的宣传片类型。在新的民主政治与媒介形势下,中国政治宣传片逐渐摆脱了宣传画式短片的思维限制,新鲜的创意和新颖的形式随之涌现。

早在1930年代,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就曾指出:“我们正在进入世界图像时代。”<sup>[2]</sup>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环境迅速改变,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碎片化逐渐成为信息时代的显著特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5.6亿人,网络视频用户使用率为75.2%。其中,手机视频用户规模为5.25亿人,手机网络视频使用率为72.6%。手机屏成为个人网络视频服务中最重要的一屏。<sup>[3]</sup>移动视频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人们的个体意识和平等意识逐渐增强,媒介素养越来越高,对政治传播的接受和参与程度与日俱增。与媒介环境和人们的接受习惯相适应,中国政治宣传影视片呈现出明显的平民化取向。从2011年年初推出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到之后的“复兴路上工作室”系列作品、征兵宣传片《战斗宣言》、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宣传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宣传片……高高在上的政治传播以贴近受众的媒介呈现,以轻松活泼的形式诠释严肃宏大的话题,中

国政治宣传片日渐贴近平民大众。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政治宣传片的相关研究多从形象片的角度切入来进行国家形象设置的解读,其中,内隐化宣传、跨文化传播与外宣模式是研究比较集中的方面,论者往往从政治传播的宏观视角出发,以单个视频的微观分析为主,缺少对中国政治宣传片在当下媒体环境下的整体考察,其中虽涉及中国政治宣传片的转向与创新研究,但多为传播策略的相关分析,尚无对其平民化倾向的系统论述。鉴于此,本文拟从媒体转型和受众需求的角度切入,从媒体策略、内容建构、呈现形式三方面阐述当下中国政治宣传片的平民化取向,以更好地促进中国政治宣传片的进一步发展。

## 一、媒体策略:综合运用多媒体

麦克卢汉认为:“一切媒介都是人的延伸,它们对人及其环境都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这样的延伸是器官、感官或曰功能的强化和放大。”<sup>[4]</sup>这一真知灼见虽根植于普通的电子媒介,但对新媒体带来的诸多媒介变革仍然有普适意义。当下,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媒体因其鲜明的伴随性已最大限度地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信息超越时空无时无刻不在,这给政治宣传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新兴媒体拓展了普通民众的发声渠道,给政府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同时也为政治理念提供了多向传播的可能,为政治宣传片提供了贴近民众的机遇和平台。中国政治宣传片之前的传播渠道较为单一,缺少互动,换来的只是受众浅尝辄止的一瞥,或是对居高临下的强势宣传的逆反与吐槽。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政治传播理念的更新,中国政治宣传片得以综合运用多种媒体形式,实现多渠道多角度传播,在叙事上更贴近普通民众。

从2013年起,复兴路上工作室陆续推出一

批风格独特的政治宣传片,网友大多认为该视频生动有趣、不刻板,是跟得上时代的政治宣传片。<sup>[5]</sup>作品首先在优酷网播出,紧接着在微博、微信、豆瓣、知乎等知名社交媒体广为传播,同时上线 YouTube。2016年4月,征兵宣传片《战斗宣言》在中国军网首发后,引发了境内外媒体广泛关注和热评,成为媒体和公众普遍关注的舆论热点<sup>[6]</sup>。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宣传片《我是谁》刷爆朋友圈,共青团中央、人民日报、今日时评、传媒圈等微信公众号合力推送,大家纷纷转发并惊叹“我党居然第一次打广告了”<sup>[7]</sup>。这批政治宣传片切合当下视频化、社交化的媒体需求,适合人们在碎片时间观看、评论并通过便捷的一键按钮转发,受众参与度大大提升,作品的传播范围迅速扩大。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相关短视频多角度解读中共十九大,复兴路上工作室推出系列短片聚焦党代会,以简洁生动的动画形式,从党代表的选举、党代会报告的产生、党代会的召开三方面逐次揭开党代会的神秘面纱;央视网《十九大,我们在等你》则以多人采访的形式解读“十九大是什么”,表达广大民众对十九大召开的期待;《十九大时光》《青年师生说》《公仆之路》等系列短视频,从不同角度解读十九大精神,将对内宣传与对外传播有机结合、官方传播与民间传播相结合,在传播内容、传播基调、传播方式等方面综合不同媒体形式进行统筹,既有相关专家的权威解读和意见领袖的理性分析,又有草根百姓的盼望和期许。围绕中共十九大的召开,电视、网络、社交媒体等多平台一起发力,采用多元化媒体策略,以短视频的形式及时传播,共同打造十九大视听媒体环境,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形象宣传增添了新的媒体元素。

## 二、内容建构:采用平民视角

内容建构是影视作品从意念表达向内容构

成转换的具体方式,直接决定着作品本身的讲述特色与表现风格。政治宣传片以政治表达为主要目的,其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对内容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中国政治宣传片拘泥于精英化的内容建构思路,基本上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官方表达,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只能膜拜而没共鸣。近年来的政治宣传片则一改以往的精英路线,从平民视点切入、以平等的姿态呈现,表现出鲜明的平民化取向。

### 1. 直面现实问题:百姓视角的直接表达

以往的政治宣传片聚焦于政治表达,擅长从正面诠释政治理念,强化意识形态,对相关负面因素往往采取迂回态度,因而给受众留下躲闪逃避的印象。近年来的中国政治宣传片虽仍然是从正面诠释政治理念,但一改自上而下高大全式的宣传模式,分享机遇,共迎挑战,展现出积极的正面因素,也不回避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交通拥堵、人口稠密、工业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这种直面现实、正视困难和问题的内容建构态度,显示出敢于正视发展进程的复杂性、富有责任意识勇气和担当。

从受众的角度考量,信息的接近性尤为重要,与受众相关的信息往往会得到更多的关注,也易于调动受众的参与积极性,从而使之主动完成二次传播和互动传播,形成信息传播的倍增效果和叠加效应。直面现实是政治宣传片对当下时政热点的及时回应,在受众心存困惑之时给予及时的解读与诠释。之前的政治宣传片虽然力图使宣传片和国家领导人的外事活动相结合,但整体上这种结合仍旧显得单调乏味。近年来政治宣传片则有了较为具体的指向,与时政热点的结合甚为紧密,甚至一一对应。“十三五”规范出台、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后的宣传片有预热有跟进,各司其职,功能分明。这是对受众需求的体察与呼应,也是中国政治宣传片平民化取向的展现。

同时,这种直面现实的问题意识也是百姓视角的直接表达,是对百姓切身利益的真正关切。不排斥负面信息并认真对其进行反思的诚恳态度,表达了对现实问题的真实认知,彰显了对问题解决的决心与自信,易于引起受众的广泛共鸣,也使得政治宣传片更有说服力和传播力。

## 2. 个性化叙事:个人角度的微观切入

政治宣传片代表的是国家理念和政府意图,无论是对政治理念还是对政治形势的阐述,都因其主题宏大而易流于宏观叙事。近年的中国政治宣传片适应社会的多元化需求,呼应社交媒介的草根特质,多从个人角度切入进行叙事。继2011年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篇》之后,中国政治宣传片多从个人角度切入进行叙事。《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从儿时的梦想“长大了我想当总统”开始讲述各国领导人的炼成之路,自然亲切。《跟着习主席走》系列片则多用记录的手法,让人们现身说法,更易于使受众接受和信服,增强传播效果:来自巴基斯坦的北京语言大学留学生阿姆扎德,用策划广场舞的特别方式歌唱中巴友谊。在《美国篇》中,以中国在美企业中的美籍员工为切入点,借个人之口表达中美友谊,从民众利益的角度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在《俄罗斯篇》中,则通过随机采访的形式表现中国百姓对俄罗斯的印象,表达对中俄合作的积极态度,让平民百姓自然表述“普京和习大大一样帅”,“想请普京到幼儿园吃包子”等真实朴素的友爱之情。

中国政治宣传片《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关注普通人的真实生活,随着他们一一道出自己的梦想,自然展现中国共产党人追求人类共同梦想、始终和人民一起奋斗的积极形象。该宣传片从草根视角出发,力求还原普通中国人的真实生活片段,这使该片更容易引起受众的共鸣与认同,成功实现了将政治话语资源向有效媒介文本的顺利转化<sup>[8]</sup>。中国共产党

成立95周年宣传片《我是谁》,直接以第一人称叙事,“我是走得最晚的那一个……”,以6位普通共产党员为样本来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最后在他们真诚的笑脸中推出“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的宣传主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宣传片《金色的鱼钩》,则以大家耳熟能详的老班长的故事唤起人们的怀念情结,将讲述者置换为“鱼钩”,以置换之后的全新视角更加从容地深情揭示“历史不仅只被陈列,精神应当世代传承”的宣传主题。

政治宣传片个性化叙事的加入,使其自然放低了姿态、放平了视角,以普通百姓的视角展开讲述,同时,也从宏大走向微观,于细微处展开叙事、体现情怀、升华精神。这种个人角度的微观切入也体现在对细节的重视与强调上。在《战斗宣言》宣传片开头,一束暖光下一位年轻的士兵整理行装,特写镜头使场景平静温暖,深入人心,在给受众带来极强代入感的同时,也跟后面呈现的紧张的训练场景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注重细节的个性化叙事,与当下的媒体环境极为贴近,符合受众个性化的接受习惯。

## 3. 情感诉求:激起大众的情感共鸣

情感诉求是从受众心理出发,抓住其情感需求,以充满情感的语言、形象、背景气氛作用于受众需求的兴奋点。以往的中国政治宣传片存在明显的概念先行之弊病,虽然有优雅从容的大国风范,但缺少必要的情感表达,其感染力和影响力因此而大打折扣。近年来的政治宣传片对情感渲染较为重视,侧重情感诉求而感性传达,充满了人情味和趣味性;它不再以生硬的形象进行直接宣传,梦想、家庭、友谊等接地气的关键词成为其表达的主题。在《跟着习主席走》系列片中,无论是从中国百姓对俄罗斯的印象角度表达对中俄合作的积极态度,还是以美国民众之口道出中美共建家园的深厚情谊,都将访谈场景与实景画面交叉剪辑,现身说法,

讲述大众自己的故事,富有亲切感和说服力。另外,还通过个性化叙事的生动故事讲述,呈现日常生活背后的共同梦想和追求:我们是伙伴、兄弟,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重视亲情友情,我们有着共同的追求。因此,在各种画面中,出现频次最高的是无情感边界、无理解障碍的笑脸。在众人的笑脸中,在共同梦想的讲述中,激起大众情感共鸣,从而产生巨大的感染力与影响力。

### 三、呈现形式:接地气

内容建构的方式确定之后,影视作品的呈现形式决定最终成品的传播效果。形式即内容,注重受众感受的形式能够带动内容的有效传播,形成长尾效应。之前的中国政治宣传片整体上是一种单向的展示与传达,缺少与受众的互动。近年来的政治宣传片则从高大上的视觉风格中摆脱出来,以接地气的方式呈现、传递政治理念。

#### 1. 视觉元素:注重画面感染力

与之前的政治宣传片强调中国高大上形象的视觉呈现不同,近年来的政治宣传片强调受众的接受度,以受众关注的视觉形象诠释政治主题,营造视觉感染力。

从创作主题来说,征兵宣传片无疑要传达的是保家卫国的主流价值观,《战斗宣言》不囿于常规的主题设置,舍弃传统的“参军光荣”的道德感召,选择我军现代化武器装备和实战化训练的震撼场面,以树立有血性的军人形象,在满足用户视觉体验的同时呈现主流价值,用力量和激情唤起适龄青年的参军意愿。

近年来的政治宣传片还以轻松活泼的卡通形象诠释严肃宏大的主题。《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是中国领导人卡通形象在视频中的第一次呈现,这一“萌版领导人”的形象与轻松、诙谐的视频格调完美匹配。领导逐级晋升,“跳房子”(游戏)式的视觉呈现设计,能唤起大众

的童年记忆,拉近与大众的距离。《中国经济真功夫》打造少林武僧卡通形象,借中国功夫的高认知度传达中国经济新常态。《十三五之歌》除使用民谣歌手的卡通人物形象之外,还运用大众巴士、黑白电视等串联信息的卡通形象,与真人图片等综合使用,形成拼贴艺术动画,将十三五规划演绎得生动活泼。

#### 2. 听觉元素:强调受众代入感

从听觉元素的运用来看,近年来的政治宣传片强调受众的代入感,以受众喜闻乐见的旋律和口语化的解说营造轻松愉悦的接受氛围。

《跟着习主席走》系列宣传片选用各国有代表性的音乐,如俄罗斯的《喀秋莎》、巴基斯坦的《友谊之歌》、美国的乡村音乐、非洲的鼓点乐曲……使受众在熟悉的音乐旋律中自然而然地沉浸其中,毫无违和感。《十三五之歌》则创造性地使用了说唱形式,以民谣穿插幽默对话,轻快的旋律节奏分明,令人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和摇摆,迅速成为广为传唱的网络神曲。《战斗宣言》以“90后”的适龄年轻人为受众,音乐舍弃了经典的军旅歌曲而选择RAP说唱,辅之以快节奏镜头剪辑,营造热血沸腾的时尚风潮。《跟着习主席走》的解说则充分口语化:《博鳌篇》采用对话式解说;《万隆篇》则截取习近平主席讲话中所引民谚,以普遍的人生经验道出语重心长的嘱托。《十三五之歌》以“十三舞是什么舞”的问话开头,用幽默轻松演绎严肃话题,全片“十三五”重复了28次之多,通俗直白易懂易记。同时,解说词注重话语与百姓语言的贴近性,大量运用网络语言,符合平民大众的用语习惯。

与单向的宣传相比,即时、互动的传播理念更适合当下的媒介环境,从官方到民间、从精英到平民、从宣传到传播,近年来的政治宣传片在平民化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随着社会媒体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宣传片必将以更加多样的形式传递贴近普通民众的政治内容,以

细分受众为指向,以互动传播为旨归,强化内容、形式与受众的贴近性,从而促进民众的广泛了解与深入参与,在平民化的道路上展现更为开放的姿态。

### 参考文献:

- [1] 国玉霞,吴祥恩.宣传片的历史探源[J].新闻爱好者,2011(4):101.
- [2] 孙周兴.海德格尔选:下卷[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899.
- [3] 人民网.CNNIC发布最新报告 中国网民7.51亿占全球网民五分之一[EB/OL].(2017-08-07)[2017-10-11].<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7/0807/c14677-29454705.html>.
- [4] 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麦克卢

汉精粹[C].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360.

- [5] 光明网.中国领导人卡通形象走红[EB/OL].(2013-10-18)[2017-10-11].[http://news.gmw.cn/newspaper/2013-10/18/content\\_2256410.html](http://news.gmw.cn/newspaper/2013-10/18/content_2256410.html).
- [6] 李鹏,钱宗阳,王玉.一条视频何以震撼世界——中国军网2016年征兵宣传片《战斗宣言》的创作思考[J].军事记者,2016(8):38.
- [7] 中国青年网.快看!我党居然第一次打广告了[EB/OL].(2016-07-27)[2017-10-11].[http://news.youth.cn/gn/201607/t20160727\\_8354578\\_2.html](http://news.youth.cn/gn/201607/t20160727_8354578_2.html).
- [8] 常江,王晓培.正视差异、尊重规则:中国共产党国际宣传片传播策略分析[J].对外传播,2015(3):36.

(上接第51页)

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因为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历史上的侵略行为,完成了国家发展的原始资本积累,没有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沉重包袱,所以它们才非常强调人权价值中个人层面的价值,如自由价值和财产价值等。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由于长期受西方国家的殖民和奴役,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民的挨打问题和挨饿问题。前者是安全和生存价值等诉求,后者是幸福和发展价值等诉求。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通过消除实现人权价值的最大拦路虎——贫穷,让人民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又通过不断落实和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把人权价值实现于人民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获得之中。人权价值在人民对具体人权的享有和实现中不断生成,这是中国人权事业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重大贡献。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53.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29.

- [3] 世界人权宣言[EB/OL].(2014-3-13)[2017-1-20].[www.baike.com/wiki/民办人权宣言](http://www.baike.com/wiki/民办人权宣言).
- [4] 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M].林骧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383.
- [5] 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6] 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243.
- [7] 任帅军.“普世价值”还是共同价值——关于人权价值的辨析[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1.
- [8] 《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EB/OL].(2016-12-01)[2017-1-20].[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5323-15/1532315.html](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5323-15/1532315.html).
-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EB/OL].(2016-09-29)[2017-01-20].[www.scio.gov.cn/zxbd/wz/Document/1492804/1492804-1.html](http://www.scio.gov.cn/zxbd/wz/Document/1492804/1492804-1.html).
- [10] 任帅军.人权价值的五对思维范畴[J].学习论坛,2017(6):76.



引用格式:崔会敏. 高压反腐态势下官员自杀的内因分析与措施建设[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6): 63-71.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6.010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7)06-0063-09

# 高压反腐态势下官员自杀的内因分析与措施建设

Internal cause analysis and construction of measures of suicides of officials under the situation of high-pressure anti-corruption

崔会敏

CUI Huimin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近年来,高压反腐态势下自杀官员比以往年份明显增多,其中男性远远多于女性,且以中年为主;行政机关中县处级及以下官员是自杀高发群体,厅局级自杀官员人数比往年有所上升;官员自杀意图坚决,自杀地点以办公场所和住宅最多,多数人无言而终;官员自杀原因近一半在媒体报道中未提及。根据自杀的“扭力理论”,官员与公民的角色冲突、公共利益与特定组织利益的效忠冲突、公共权力的强大与官员个人相对剥夺感的弱势心理冲突,是官员自杀的三个主要扭力情景。解决官员自杀问题的关键,是确立官员伦理自主性。为此,应培养官员的行政人格,加强行政制度伦理建设,优化政治生态,为官员伦理自主性的确立提供精神主导、制度保障和环境支撑。

**关键词:**

高压反腐;  
官员自杀;  
伦理冲突;  
伦理自主性

收稿日期: 2017-09-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14BZZ036); 河南大学基本科研“优青培育”项目(CX0000A40705)

作者简介: 崔会敏(1974—),女,河南省郾城县人,河南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政府与政治、廉政建设。

自杀是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文化人类学家兼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曾将自杀定义为“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sup>[1]8</sup>。自杀既是个人行为,也是一种负面的社会现象,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受到人们的关注。由于身份的敏感性及其所掌握权力的公共性,官员自杀更加引人注目。官员自杀不但会影响其自身的事业和家庭,还会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弱化党的执政能力。近年来,中国学界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角度对官员自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例如,钱周伟<sup>[2]</sup>从社会学角度通过对109个自杀官员样本进行分析,对官员自杀产生的社会根源、化解对策进行了研究;齐杏发<sup>[3]</sup>从政治学角度探讨了官员自杀原因;李志芳等<sup>[4]</sup>从心理学角度对官员自杀及预防与干预进行了探析。另外还有很多文章对官员自杀现象进行了形式多样的解读,但大多局限于事件本身。从官员本身伦理冲突的角度对官员自杀进行深度分析的文章还较少。实际上,官员自杀虽是其个人选择,但对公共利益和官员形象会造成不良影响。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之下,不管官方公布的官员自杀原因是什么,公众多将其与腐败联系起来。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2013—2015年81个自杀官员样本进行分析,总结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下官员自杀的特点,探寻自杀官员的内在角色伦理冲突,并从培养官员伦理自主性方面给出相应的对策。

## 一、高压反腐态势下自杀官员的特点

2013—2015年是中共十八大后反腐处于高压态势下的3年,分析这3年的官员自杀数据及其特点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以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中国大陆境内(不含香港、澳门)媒体公开报道的官员自杀事件

为样本,将“官员”定义为国家各级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中的副科级(含)以上的行政干部。选取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对官员自杀关键词,如“官员+自杀”“干部+自杀”“处长+自杀”“科长+自杀”等进行搜索,对自杀事件的报道按照时间顺序整理,用SPSS软件建立数据库,录入自杀官员的信息,包括姓名、性别、自杀年龄、行政级别、单位性质、自杀时间、自杀方式、自杀原因、自杀地点、是否留有遗书等,对这些信息进行系统分析,发现这一时期官员自杀呈现以下特点。

### 1. 自杀官员比以往年份增多,男性远远多于女性,以中年为主

对所得到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可知,2013年媒体报道自杀官员为11人,2014年为40人,2015年为30人。在高压反腐态势下,官员自杀人数在2014年达到一个高峰,这3年官员自杀人数是2010—2012年的1.4倍,相当于过去5年官员自杀人数的总和。(1)从性别上看,男性自杀官员有77人,占95.1%;女性自杀官员有4人,占4.9%。这与世界卫生组织数据统计结果——中国女性自杀率明显高于男性的特点有极大反差。<sup>[5]</sup>(2)从自杀年龄上看,49~60岁是自杀高发年龄,也就是说以中年居多。这也与医学界的统计结果——中国自杀者中农村老年人和青少年较多,城市男性较少——不相符。<sup>[6]</sup>根据这些特征可以推测,在政治体制内部可能有某种内在冲突和压力,导致了官员群体自杀与普通人群自杀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sup>[3]</sup>

### 2. 行政机关中县处级及以下官员是自杀高发群体,厅局级自杀官员人数比往年有所上升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自杀官员的职务级别分为乡镇科级、县处级、厅局级、省部级,单位性质分为行政机关干部、事业单位干部或其他。从资料统计中可以看出,2013—2015年自杀官员共有81人,其中省部级官员为3人,占



3.8%；乡镇科级官员为22人，占28.2%；县处级官员为27人，占34.6%；厅局级官员为26人，占33.4%（见表1）。与以往研究资料相比，厅局级自杀官员人数比重有所上升。在单位性质上，除了有4例没有明确报道外，有68人属于行政机关，占84%；有11人属于事业单位，占11%。

表1 自杀官员的职级分布

职务级别	数量/人	占比/%
乡镇科级	22	28.2
县处级	27	34.6
厅局级	26	33.4
省部级	3	3.8
合计	81	100

### 3. 官员自杀意图坚决，自杀地点以办公场所和住宅最多，大多数人无言而终

从资料可看出，有9人未提及自杀方式，占11.1%；有41人采取跳楼、跳桥的高坠方式，占50.6%；有19人自缢，占23.5%；有2人刀戕，占2.5%；有6人投水，占7.4%；有1人枪杀，占1.2%；有1人卧轨，占1.2%；有1人服毒，占1.2%；有1人烧炭，占1.2%。其中采取暴力性自杀方式的有70人，占86.4%；采取服毒或烧炭两种非暴力性自杀方式的有2人，占2.4%（见表2）。由此可见，官员自杀的意图非常坚决。媒体报道中提及的自杀地点，以住宅、宿舍等为最多，有27人，占33.3%；其次是办公场所，有25人，占30.9%；户外野外有18人，占22.2%；旅馆酒店有6人，占7.4%；行动限制地点有2人，占2.5%；医院有2人，占2.5%（见表3）。自杀官员中仅有14人留有遗书，占17.3%；67人无言而终，占82.7%。

### 4. 官员自杀原因近一半在媒体报道中未提及

根据资料统计，有55.6%的媒体报道提及官员自杀原因，其中有27人因抑郁自杀，占33.3%；有7人因接受组织调查自杀，占8.6%；有7人因身体健康原因自杀，占8.6%；有1人因工作生活压力自杀，有1人因情感家庭问题自

杀，有1人因债务经济原因自杀，有1人因焦虑神经衰弱自杀，均占1.2%。报道中还有36人未被提及自杀原因，占44.4%（见表4）。

表2 2013—2015年官员自杀方式统计表

	自杀方式	数量/人	占比/%
暴力方式	跳楼、跳桥、跳塔等高坠方式	41	50.6
	自缢	19	23.5
	刀戕	2	2.5
	投水	6	7.4
	枪杀	1	1.2
	卧轨、撞车	2	1.2
非暴力方式	服毒	1	1.2
	气体窒息或中毒	1	1.2
	其他	8	11.1
合计		81	100

表3 2013—2015年官员自杀地点统计表

	自杀地点	数量/人	占比/%
	办公场所	25	30.9
	住宅	27	33.3
	旅馆酒店	6	7.4
	行动限制地点	2	2.5
	医院	2	2.5
	户野外	18	22.2
	其他	1	1.2
	合计	81	100

表4 2013—2015年媒体报道的官员自杀原因

	自杀原因	数量/人	占比/%
	抑郁	27	33.3
	工作、生活压力	1	1.2
	接受调查	7	8.6
	身体健康原因	7	8.6
	情感、家庭问题	1	1.2
	债务经济原因	1	1.2
	焦虑、神经衰弱	1	1.2
	未提及	36	44.4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媒体在报道官员自杀事件的过程中还存在公众知情权与死者隐私权、媒体满足公众知情权与承担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比如，2014年7月26日，湖北省国资委省国有企业第三监事会主席王运清跳楼自

杀,各大媒体都只转载报道这样一句话,不能满足社会公众更多的知情权。但如果报道描述细节,则有可能侵犯死者的隐私权,对家属造成“二次伤害”。<sup>[7]</sup>然而,很多民众对自杀官员的“抑郁”归因产生强烈的质疑,不管官方结论如何,人们总是难免把官员自杀与腐败相联系。<sup>[8]</sup>

2014年1月中铁公司总裁白中仁在家中跳楼自杀,多位铁路系统受访人士认为他的自杀原因与铁路反腐和公司巨额债务有关。<sup>[9]</sup>在笔者随机访谈中,被访人员对官员自杀的第一反应,通常是认为与腐败有关。官员在公共资源管理和分配中占据主导优势,在社会发展中背负着特殊角色和责任。<sup>[10]</sup>因此,官员自杀不能混同于一般人自杀,我们应该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冲突的伦理视角,深度分析具有官员和公民双重身份、最有机会公权私用的官员其自杀的内在原因,从而找出阻止官员自杀的关键因素,以提高反腐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 二、官员自杀的内在原因

由社会学中自杀“扭力理论”可知,当个体面对冲突而又无法放弃冲突中的任何一个因素时,其心理就会感到痛苦,即感到“扭力”或“不协调的压力”,这些心理痛苦会迫使个体做出判断和选择,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通过自杀缓解痛苦。不协调的压力不同于单一压力和多个压力,而是至少包含两个冲突的压力或者两个变量,其主要来源有:价值观之间不同或相悖、理想与现实之间差异、相对剥夺感或相对贫困感、处理危机能力与技术的缺乏。<sup>[11]</sup>也就是说,自杀行为可能由某一类不协调的压力促成,每个压力源包含至少两个相互冲突并且被个体感知到的社会现实因素。但不是所有感知到扭力的个体都会选择自杀这一极端行为,因为不协调扭力与个体自杀之间的关系可能被其他很多因素缓解,如人际关系、社会整合与性格特征

等。这个分析框架对高压反腐态势下官员自杀事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下面笔者将从角色冲突、效忠冲突和心理冲突三个方面对官员自杀的扭力情景进行分析。

### 1. 官员自杀扭力情境之一:官员与公民的角色冲突

在公共行政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公共行政人员角色逐渐从公民角色中分化出来,即公共行政人员既是公民的雇员又是公民中的一员”<sup>[12]45</sup>。官员作为公共行政人员,首先是公民的雇员,处于政治和行政体系当中,扮演着“公共人”的角色,这是官员的职业身份,要求官员行为符合公共行政伦理规范;同时,在私人领域,官员又是扮演着各种社会角色的公民,属于“经济人”,以自己利益最大化作为行为准则。这两种角色都有各自的义务与责任。因此,官员是具有双重角色的特殊群体,是“负有特殊责任的公民”<sup>[12]47</sup>。

如果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界清晰,这两种角色并不必然产生冲突;如果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比较模糊,“公民的雇员”与“公民中的一员”两种角色就会出现明显冲突。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官员”这一群体有着优越的社会地位和道德声望。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对官员的道德要求更加规范、具体,普通公民则不需要背负这种道德枷锁,而作为普通公民的官员也有普通人的各种需要。这两种角色期待的差异与冲突使官员变成“两面人”,在公众面前塑造“清官”形象,努力靠向“公共人”的道德规范,而私下里却极力追求自己的利益,变成赤裸裸的“经济人”,甚至变成道德败坏的贪官!

应该指出的是,当官员和公民两种角色不同的价值观没有在个体身上发生冲突时,不协调的压力并不会产生。而“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可能在个体身上造成更

大的压力,并与自杀意向呈显著相关。也就是说,如果长期处于‘公共人’和‘经济人’两种价值取向的冲突中,且被内化后,就会产生不协调的压力”<sup>[12]36</sup>。这或许是官员自杀年龄以49~60岁居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据媒体报道官员自杀原因的资料统计,因抑郁自杀的占33.3%。虽然普通民众对官员因抑郁自杀抱有质疑态度,多将其跟腐败联系起来,但其背后隐含的是官员和公民双重身份的角色冲突压力。

## 2. 官员自杀的扭力情境之二:公共利益与特定组织利益的效忠冲突

官员与公民角色的二重性会产生冲突性义务,官员不仅是人民公仆还是某一特定组织的公务员。公务员角色十分容易受制于特定组织,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效忠组织的义务和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之间的关系会被混淆。<sup>[12]45</sup>这种特定组织可以是正式的行政部门,也可能是非正式组织,官员只要身处其中,就会被限定,尤其是当特定组织的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官员面对这种效忠冲突,就会产生不协调的压力。比如,政府部门利益化问题和公务员集体腐败问题中出现的冲突,就属于公共利益与特定组织利益的效忠冲突。

政府部门利益化问题是指政府部门在公共行政过程中偏离公共利益导向而以公谋私的倾向。政府部门利益化降低了行政效率,扭曲了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已经成了政府行政发展的障碍。如果官员在这些部门任职,在进行行政决策或决策执行过程中就会面临效忠“公共利益”亦或是部门利益的冲突。集体腐败是指政府某个行政机构的全部或者部分成员,形成分利同盟,利用所掌握的政治权力,实现权力互补,从而中饱私囊,违法乱纪的腐败行为。<sup>[13]</sup>集体腐败是恶化的官场生态,在这些机构中,身居要职的官员集体结成关系亲密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一个个小圈子,外人很难渗透进去。而这

些圈子就是逆淘汰的生态,清廉的官员会被排挤出局,留下的官员会选择为特定的组织利益服务。这些集体腐败中的官员就是在面临公共利益与特定组织利益的冲突时选择了后者。如果面临极端情况需要抉择,这些官员就会处于效忠冲突之中,这是两难选择,很可能会产生不协调的压力,进而导致官员自杀。这种效忠冲突或许是使多达86.4%的自杀官员采取跳楼、跳桥、自缢、刀戕或卧轨、撞车等惨烈方式决意自杀的原因,这显示出效忠冲突对官员心理产生的扭力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

## 3. 官员自杀扭力情景之三:公共权力的强大与官员个人相对剥夺感的弱势心理冲突

“相对剥夺”概念由美国学者斯托弗提出,经默顿发展成为一种关于群体行为的理论。默顿认为,“当个人将自己的处境与其参照群体中的人相比较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剥夺”<sup>[14]</sup>。相对剥夺感是个人的内心感受,是与参照群体相对而言,与自身实际利益增减并无直接联系,主要是人的一种不平衡心理,并不是真的受到了参照群体的剥夺。比如说中国的官员在普通老百姓眼中都是手握重权的强势群体,但《人民论坛》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45.1%的党政干部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sup>[15]</sup>这种强烈的感觉差异其实就是官员相对于参照群体产生的相对剥夺感,所谓的弱势是相对于那些职级更高,或比官员更强势的成功商人和体制外精英而言的。产生这些弱势感的官员大多是厅局级、县处级和乡镇科级干部。这些处于金字塔阶梯中层和低端的干部会更多体验到弱势感和相对剥夺感。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结构性变动,使一部分官员产生这种相对剥夺感,由此而引发了寻求补偿、滥用特权的腐败行为。<sup>[16]</sup>有研究表明,相对剥夺感强的个体比相对满意的个体更有可能参与群体性行为<sup>[17]</sup>,严重的会导致愤怒

情绪和犯罪行为。<sup>[18]</sup>因此,公共权力的强大和相对剥夺感的弱势心理冲突会使官员产生不协调的压力。

官员在面临角色冲突、效忠冲突与心理冲突时会体会到强烈的不协调压力,但这只是对官员心理素质的考验,大部分官员都能凭借自身应对危机的能力顺利度过心理压力危机。如果官员同时面临几种冲突和心理压力,加上网络监督兴起后社会公众舆论的审视和质疑,就会产生难以克服的不协调压力,进而变成自杀诱因。有学者研究认为,很多情况下,官员一言不慎,就可能丢掉“乌纱帽”。有些官员从事本职工作擅长,但面对公众则显得能力相对薄弱,感觉到力不从心,增添压力<sup>[19]</sup>。另外,在高压反腐的态势下,由于我国缺乏完善和健全的公务员道德法,以及防止利益冲突、责任冲突的机制,官员在众多诱惑与高压反腐的态势之间,常常处于心理矛盾和失衡之中,容易产生严重的心理危机。<sup>[20]</sup>如果没有及时疏导和足够的应对能力,自杀就成了其自我解脱的选择。也就是说,高压反腐只是官员自杀的诱因,官员自杀的真正原因是伦理冲突造成的不协调压力。

### 三、针对官员自杀内因分析的措施建议

确立官员的伦理自主性可以使行政伦理内化为官员的道德品质,使公共利益至上取向成为官员的自主追求,形成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的职业角色自觉<sup>[21]</sup>,以减少官员自杀事件的产生。所谓“伦理自主性”,是指当组织的目标与公共利益发生矛盾时,行政人员作为公共行政的主体有责任和义务在行政行为中引入价值因素,对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伦理思考和道德选择,从而保证对公民的终极性责任。<sup>[22]</sup>伦理自主性是官员面对激烈的伦理冲突时发挥主体能动性的一种自主的行为选择,是应对不道德的上级

和不道德组织的主动选择,是负责任的一种行为。官员自杀也是一种行为选择的结果,只不过这种选择是通过放弃生命来解决伦理冲突问题的。确立官员的伦理自主性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 1. 培养官员的行政人格

伦理自主性是行政人员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行为的结合体,其最高境界是行政人格的生成。行政人格是行政人员道德意识的升华,是他律的自律化,是行政人员把法律、行政道德规范和监督机制内在化而生成的一种优良素质,表现为行政人员的道德尊严和道德品质。<sup>[23]</sup><sup>320</sup>官僚层级制是一个纵横交错的复杂结构,其行动效能取决于不同部门与岗位之间的联系和协作水平。但实践中不同部门和岗位之间总有职能交叉重叠的地方,时常会出现相互掣肘和扯皮问题。如何才能在不同的部门和岗位间划出明确的边界,保证行政人员各负其责、相互协作?这是基于科学主义的任何设计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只有通过行政人员的角色自觉,才能出现各尽其责、互相协作的和谐局面。<sup>[23]</sup><sup>295</sup>那么如何培养官员的行政人格呢?

首先,应要求官员进行伦理角色定位,超越小组织的身份认同,形成具有公民精神的行政人格。美国行政学家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将公共管理者的角色定位于“代表性公民”,强调公共管理者对社会公正的责任。<sup>[24]</sup>这就要求官员突破所在组织的局限,认同官员和公民的双重身份,从而在行政实践中自觉忠于职守,遵纪守法,抵制私欲,公正合理地用权,把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与职业责任联系在一起,站在职业和社会的角度维护公共利益。只有建立起具有公民精神的行政人格,也只有具有公民精神的行政人格支持下,官员才能在面临官员与公民角色冲突时选择官员身份,才能在集体腐败和政府部门利益化面前选择效忠“公共利益”而

非“特定组织利益”,才能避免做出损公肥私的行为,才能在信念的支撑下做出负责任的行为而不是选择自杀去逃避责任。

其次,应加强官员的行政道德修养。行政道德修养是行政人格的精神支撑,慎独、内省、积善是提高道德修养的重要方式。所谓“慎独”,就是在无人监督之时其言行仍然和受到监督时一样,是自我节制的最高境界,是对自我意志的磨练。所谓“内省”,就是主动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思。儒家对自我修养的一个设定就是“吾日三省吾身”。官员应主动用行政道德规范对自己的言行进行检查反思,有过即改。所谓“积善”,就是善行好事,积小善成大德。《荀子·劝学》认为,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官员如果长期勤政为民,诚实守信,不断积累善行,就能慢慢形成高尚的品德。

最后,应加强对官员的行政伦理教育。如果说加强官员的行政道德修养是塑造其行政人格的主观途径,那么行政伦理教育就是培养其行政人格的客观路径。行政伦理教育是根据行政道德规范对行政人员进行系统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是旨在让行政人员将行政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信念的教育活动。加强对官员的行政伦理教育,不但要注意教育内容的系统性、教育方式的多样化和创新性,还要注意吸收传统文化中官德的精华,发挥道德楷模的榜样力量。通过伦理道德教育,最终让官员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完善其行政道德修养,有助于官员形成具有公民精神的行政人格。

## 2. 加强行政制度伦理建设

邓小平曾强调,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道德教育只有在制度认同中才会获得真正的教育效果。<sup>[25]</sup>因此,培养官员的伦理自主性需要加强行政制度伦理建设。行政制度伦理是指行政制度建立的伦理依据和制度本身所蕴涵的价值取向,以及人们对制度进行的

道德评价。行政制度伦理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政制度伦理化,二是行政伦理制度化。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互相影响。

行政制度伦理化一是指行政制度安排一定要符合伦理道德规范。一个社会道德水平普遍提升的主要途径是把社会治理结构建立在真实的伦理关系基础上,根据现实的伦理精神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sup>[26]</sup>要形成制度伦理对官员道德修养的支持,关键在于行政制度伦理化建设。《防止利益冲突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就是保护官员远离腐败和伦理冲突的制度设计。为了解决公共行政人员伦理冲突和伦理困境问题,美国早在1980年代就制定了《基本利益冲突法》。这些法律有助于把官员从官员与公民角色冲突中、从公共利益与特定组织利益的效忠冲突中解救出来,使官员根据这些规则提前进行行为选择,不至于陷入伦理困境。

行政伦理制度化二是指行政伦理建设要制度化,要将相对抽象的对行政人员的伦理要求和道德价值目标具体化为行政人员必须遵守的一系列可操作的道德规范。只有将行政伦理制度化,才能建立完善的行政道德体系,才能使行政人员遏制私欲,公正行使公共权力,坚守行政伦理自主性。由于行政人员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权源于法律,因此行政伦理制度化的主要途径就是行政伦理法律化,即行政伦理立法。行政伦理立法的最重要的作用是它能为公共行政人员提供行政道德最低标准的规范性指导,也可为惩罚那些违反公共利益取向的行政人员提供依据。当前,很多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伦理立法,如加拿大1990年代就制定了《公务员利益冲突与离职后行为准则》,美国则出台了《美国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等等。这些法规都较全面地规定了公务员廉洁从政的措施和办法。

我国虽然在1995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党政

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中就开始了对公私利益冲突的管理实践,但对党员干部的伦理冲突和困境并没有明确的具体可操作的法律规定。当官员处于激烈的伦理冲突之中时,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指导,就可能陷入绝望。<sup>[27]</sup>因此,建议围绕利益冲突这个核心概念,建立《防止利益冲突法》,用国家立法形式对公私交界处的利益冲突和责任冲突加以科学合理规定,以明确指导官员面临的伦理冲突情景。

### 3. 优化政治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解决党内存在的种种难题,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sup>[28]</sup>所谓政治生态,指一个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政党制度、政治民主、政治决策等政治环境的综合要素的总和,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现状、政治发展环境、政治进步水平的集中反映<sup>[29]</sup>。政治生态是官员的职业环境,其整体氛围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官员的角色意识、行政信念、情感态度、行为方式,影响着官员的职业道德感。良好的政治生态对于官员的伦理自主性培养起着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首先,优化政治生态应建设公私分明的廉政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它对人的心理、思想、情感的形成都起着重要导向和整合作用。廉政文化是廉政与文化的结合体,是以廉政为思想内涵、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一种文化,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sup>[30]</sup>。官员有着双重身份角色,既是公共领域的管理者,又是私人领域的公民,处在最有条件将公权私用的位置。健康的政治生态是公私分明的,公私分明是政治生态系统修复和重建的关键。<sup>[31]</sup>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使权力成为公共权力;公共利益的出现,使公共权力将服务于公共利益作为唯一的使命。<sup>[23]297</sup>因此,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应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在公共领域

应当树立公共利益至上、为公民服务的价值观。官员作为掌权人能否积极主动地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为公众谋取公共利益,在防止利益冲突法律尚未出台的情况下,主要取决于他是否具有行政道德意识和伦理自主性,这就要求公共行政组织通过积极建设廉政文化去培养官员的行政道德意识和行政人格。

其次,优化政治生态应建设责任型政府。责任型政府是行政道德理想的实践形式,它既承认官员对组织的义务,也承认官员对公民的义务,并且当这两种义务发生冲突时,更为根本的义务是对公民的义务<sup>[32]227</sup>。责任型政府不仅应在制度安排、组织设置与行为方式上都要体现公共利益至上的价值目标和行政理念,还应有职责明确的责任机制、赏罚严明的激励机制和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在此基础上,还应在选拔干部时增加心理素质测试环节,将有心理问题或比较脆弱敏感、不适宜公共管理工作的人员通过筛查加以排除。同时,还应在日常工作中进行必要的心理减压辅导培训,增强行政人员应对舆论监督和公共危机能力,将其不协调压力尽早释放出来,以免造成严重后果。

### 参考文献:

- [1] 埃米尔·迪尔凯姆. 自杀论——社会学研究[M]. 冯韵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8.
- [2] 钱周伟. 官员自杀的类型、成因及化解——基于109个样本的社会学分析[J].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4(11):11.
- [3] 齐杏发. 集体腐败、外部挤压与生态恶化——转型期官员自杀现象的政治学分析[M]. 理论探讨,2013(5):52.
- [4] 李志芳,张小浩. 官员自杀及预防与干预探析[J]. 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12(4):37.
- [5] 何兆雄,David Lester. 中国自杀率的性别差异[J]. 医学与社会,1997(10):33.
- [6] 张杰,景军,吴学雄,等. 中国自杀率下降趋势

- 的社会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11(5): 97.
- [7] 孟庆国,邓喆. 网络媒体有关官员自杀事件报道的失范、影响及反思[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5):162.
- [8] 朱国栋,黄泓. 官员自杀传言的社会背景[J]. 领导文萃,2005(5):45.
- [9] 孙春芳,高江虹. 中铁总裁白中仁自杀谜团[N]. 21世纪经济报道,2014-01-07(05).
- [10] 安慧林. 关注官员自杀不能止于心理危机干预[J]. 理论与当代,2010(5):54.
- [11] 张杰. 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初探(综述)[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5(11):5.
- [12] 特里·L. 库柏. 行政伦理学:实行行政责任的途径[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 [13] 褚朝新. 官员自杀之惑[J]. 领导文萃,2014(8):108.
- [14] 刘亮. 相对剥夺感与“精英犯罪”[J]. 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0(5):111.
- [15] 李桂珍. 浅析官员弱势心理产生的主客观因素及有效疏导[J]. 理论与探讨,2013(8):116.
- [16] 罗桂芬. 腐败行为与“相对剥夺感”——官员腐败的社会心理机制透视[J]. 中国行政管理,1997(5):2.
- [17] 张书维,王二平,周洁. 相对剥夺与相对满意:群体性事件的动因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2010(3):95.
- [18] 吴宗宪. 西方犯罪学[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50.
- [19] 谷立辉. 官员自杀频发:网络监督等4座大山重压官员神经[J]. 决策探索,2010(12):26.
- [20] 李松. 官员轻生的心理考验[J]. 望新闻周刊,2010(2):22.
- [21] 杨淑萍. 论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建构[J]. 哲学动态,2008(7):63.
- [22] 徐祖迎. 行政伦理自主性及其建构[J]. 党政干部学刊,2008(12):30.
- [23] 张康之. 公共行政中的哲学与伦理[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24] 乔治·弗里德里克森. 公共行政的精神[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83.
- [25] 张康之. 公共管理伦理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43.
- [26] 俞树彪. 论道德建设的制度安排[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4):90.
- [27] 张胜利,刘建秀. 发达国家和地区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行政伦理核心价值体系探析[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8):21.
- [28] 习近平. 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07-01(01).
- [29] 胡鞍钢,杨竺松. 中国政治生态的独特性及四大制度要素[J]. 学术前沿,2013(2):54.
- [30] 陈平. 论廉政文化建设与《廉政准则》实施的相结合[J]. 社会主义研究,2011(8):10.
- [31] 毛寿龙. 政治生态修复方略[J]. 人民论坛,2014(9):60.
- [32] 崔会敏. 官员自杀背后的心理冲突[J]. 廉政瞭望(上半月),2016(5):50.



引用格式:雷惠.我国国有企业信访工作的困境与出路[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6):72-77.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6.011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6-0072-06

# 我国国有企业信访工作的困境与出路

## Dilemma and outlet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omplaint reporting work in China

雷惠

LEI Hui

中铁二十局集团 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 苏州 215151

**摘要:**我国国有企业信访工作是法律框架之外的一种柔性的争端解决方式,具有消弥职工内部矛盾、修复受损社会关系、营造和谐生产环境的积极作用。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信访工作呈现信访主体多元化、信访途径多样化、信访性质差异化的严峻现状,面临信访伸张与诉讼救济的区分难题、传统信访与网络信访的合法性质疑、合规上访与违规闹访的辨别等困境。基于信访工作肩负的功能与责任,国有企业信访工作应当从信访伸张与诉讼救济的合理分流、传统信访与网络信访的有效整合、由违规闹访到合规上访的良性转化等方面着力,使信访者走上既反映诉求又合规合法的健康信访之路。

### 关键词:

国有企业;  
信访;  
诉讼;  
法律

收稿日期:2017-09-12

作者简介:雷惠(1982—),女,四川省南充市人,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助理政工师,主要研究方向:信访与法制。



信访工作是连接基层民众与党政领导的桥梁。基层民众通过信访途径可表达自身诉求、社会意愿,党政领导借助信访工作可了解民众思想动态、物质需求。信访是法律框架之外的一种柔性的争端解决方式<sup>[1]</sup>,具有缓冲社会矛盾、修复社会关系的积极作用,有助于及时消弥纷争、化解冲突,对于聚合群众力量、维护社会稳定、听取公众意愿、促进经济发展大有裨益。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改革创新、经济发展的重任,是支撑国民经济从而保障国家安全稳定、繁荣富强的中坚力量。如何有效化解国有企业内部矛盾、妥善解决国有企业信访频发问题,稳步推进国有企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我们不得不直面的一个重要问题。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国有企业信访工作严峻现状的分析,探究国有企业信访工作的现实困境,并寻求解决之道,以期充分发挥信访工作在国有企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 一、我国国有企业信访工作现状

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信访事件呈多发态势,职工信访与非职工信访交替,传统信访与网络信访交织,合规信访与违规闹访交叉,给国有企业和谐发展造成较大困难。

### 1. 信访主体多元化

国有企业内部通常自成体系,医院、学校、安保等一应俱全,是一个相对健全的小社会,涉及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时有发生。例如医院职工与一线工人之间在工资、福利计算标准上会有差异,这会导致部门隔阂,并加剧国有企业职工对差别待遇的不公平感。同时,国有企业一般成立时间较长,既有革命前辈,亦有新生代力量,存在代沟冲突。革命前辈崇尚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强调稳扎稳打;新生代力量,力推技术革新,倡导奇袭制胜。在革命前辈与新生代力量出现分歧时,容易发生信访事件。此外,国

有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矛盾多发,诉求多样。国有企业在脱离国家扶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过程中,逐渐转变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并从提高经济效益入手,采取减员增效、主辅分流的经营管理举措。裁员在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也使部分职工陷入下岗的困境。下岗后无法找到合适工作,且在激烈的市场角逐中四处碰壁的职工极易产生不公平感,并萌生通过上访回归企业的诉求。主辅分流的职工虽然未面临失业的困境,信访的诉求相对较低,但是大型国有企业主辅分流的职位通常会因为地域、行业的不同而出现待遇差别。例如,位于西北边陲的分流和位居东南沿海的安置就会存在较大差别,这些境遇不同的主辅分流人员极有可能要求享受公司统一的分流政策,且在无法达到要求时,会持续上访。此外,工残人员的工伤赔偿、离退休职工的工资待遇、工病亡人员的遗属安置、待业子女的就业安排等,亦是导致国有企业信访量增加的重要原因。

### 2. 信访途径多样化

目前,国有企业信访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信件或口头陈述的方式反映;另一种是通过网络伸张。这两种途径既有单一使用的,亦有交替使用的,呈现纷繁复杂的信访乱象,给国有企业信访工作带来诸多挑战。信件上访和口头上访是传统的信访方式,主要通过事实描述,直接呈现信访人的上访意愿,是一种较为温和的上访方式,其旨在通过正当程序使国有企业的信访部门获知当事人的信访诉求,并希冀公正对待,妥善解决。从这个层面上说,传统信访并不会给企业稳定发展造成困境,还给国有企业审视自身弊病、及时解决所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契机。与传统信访途径相对的是网络信访模式,即通过网络平台表达信访要求,以期使问题获得及时、公正解决,具有高效率、低成本的优势,因而日渐在国有企业信访中兴起。网络

信访在实践中又可细分为依循国有企业既定网络平台上访的模式和借助自媒体表达的模式。前者与传统上访模式并无实质差别,其区别仅是使用工具的不同。它是通过国有企业既定网络上访平台,传递信访人的上访诉求,与传统信访模式采用信件传递、真人陈述的效果殊途同归。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格局、社会舆论生态和公众参与方式,网上信访正逐步成为群众信访的“直通车”、主渠道。<sup>[2]</sup>但是,传统信访模式和网络平台上访模式均存在信访部门置之不理的可能。故为寻求扩大影响,吸引眼球,信访人可能在信访部门久拖未决后予以网络曝光,或者出于追求实效的考虑予以网络举报。这种自媒体网络信访是一种激进型的信访模式,对国有企业的内部稳定、经济发展影响较大。此种情况下,国有企业信访部门无法通过既定的途径及时获知信访诉求,只能通过网络舆情扩散而获得,处于被动局面。同时,自媒体网络信访诉求的不当传播会引发社会不公平感,从而诱导并集结相同境遇的职工共同抗议国有企业,继而在媒体高度关注、民众极大愤慨之下引发群体性事件。

### 3. 信访性质差异化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信访纠纷性质呈现差异化的特质,信访和诉讼掺杂,合规信访和违规闹访并存,表现出高度复杂化的信访现状。信访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辅助手段而非主要方式,在信访之外,法律应当承担纠纷化解的重任。然而,当前信访的作用被过分扩大,法律的空间被信访挤占,信访这一非常规适用的辅助手段日渐升级为常规的纠纷解决方式。究其原因,主要是国有企业积习已久的上下级管控机制,使职工想当然地认为,一切纠纷均可通过企业解决,而无需诉诸法律<sup>[3]</sup>,致使本属法律调整的事项,也进入国有企业的信访工作范围。同

时,上访较诉讼而言成本更低,且不用顾忌败诉的不利后果,因此寻求信访方式获取纠纷解决是一种较为经济的选择。实践中,部分信访人出于对诉讼后果的考虑,优先采取信访策略,也有部分国有企业职工在败诉后,通过信访继续反映诉求。此外,闹访事件层出不穷,与合规上访呈现并合之势。不少上访者对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不甚了解,思想观念上存在重大误区,认为上访闹得越凶,问题越容易解决,导致合规上访转向违规闹访,并衍生群体性事件。为了汇聚群众力量,吸引公众眼球,引发共鸣情绪,上访事件通常被夸大,并形成为数众多的上访群体,他们采取静坐、拉条幅、游行等方式宣示自身权利。这些上访群体诉求集中、愿望强烈,倘若不能得偿所愿极易引发冲突,对企业发展、社会稳定会造成严重威胁。

## 二、我国国有企业信访工作的困境

我国国有企业信访工作量的激增,信访内容的复杂化,信访形势的严峻化,使信访工作面临多重困境,需要在深入剖析的基础上予以有效化解。

### 1. 信访伸张与诉讼救济的区分困境

国有企业信访工作量的激增,既与网络信访的日趋便捷、职工维权意识的逐渐提高有关,亦与诉讼转化信访密切关联。审视当前国有企业的信访工作,很多与诉讼有关,是职工借助信访平台进行的个人维权,较少涉及集体利益的范畴,如工伤赔偿、劳动纠纷、竞职提薪等,面临信访工作能否介入诉讼的困惑。深入探究,信访能否介入诉讼,取决于信访与诉讼的关系,倘若信访与诉讼是并列关系,则信访不能介入诉讼范围。根据信访与诉讼截然不同的观点,从二者的救济功能区分其管控视域,对于减少信访数量、缓解信访压力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要想清晰界分信访与诉讼是较为困难的,

且不同的分辨标准会呈现迥异的后果。因此仅强调信访与诉讼的形式区分,而不深入探究信访与诉讼的实质区别,仍然无助于国有企业信访工作的减压,且会因为相似行为的不同对待诱发新的矛盾。强调信访与诉讼是包容关系的观点认为,信访是诉讼的前奏或诉后补充,可以对诉讼问题进行积极干预,充分发挥信访在纠纷化解、关系修复上的积极作用。但是,对于性质不清、难以分辨的问题,不加甄别地一律予以信访处理,其弊端是明显的,因为信访部门的不堪重负、信访决议的无力执行等,将无形中消解国有企业信访工作的效果。

## 2. 传统信访与网络信访的合法困境

传统信访与网络信访通过信件、走访、网络等途径传递职工建议、意见和投诉,面临传递途径的合法性和传递内容真实性的质疑。对于传统信访模式,职工通过既定的信访渠道向企业专门信访机关投递诉求,传递途径的合法性并无疑义。但是,在诉求表达上,则会存在传递内容失真的问题,对于此类问题是否合法,学界与业界并无定论。坚持信访内容失真不应惩罚的观点认为,信访是职工向企业职能部门表达意见、建议和投诉的合法途径,旨在使企业改进现有经营机制,纠正错误做法,是基于希望企业健康发展的好意,即便偏离事实也不应追究责任,否则必然会切断职工诉求反映的渠道,并使职工三缄其口。反对的观点则认为,信访是职工正当意愿的表达而非曲解事实后的混淆视听,需要积极对待合法信访,打击偏离事实的违规信访,因此,对于传递虚假信访内容的行为人应当依据法律处理。对于网络信访,如在国有企业网络信访平台传递信访内容的,与传统信访无异,争议焦点仍然是传递内容的真实性问题。对于依据自媒体信访的合法性问题,实践中争议最大,认为非法或认为合法的观点均有之,呈现纷繁复杂的乱象。坚持自媒体信访非法的观

点认为,自媒体传递信访信息偏离企业特定信访传递渠道,其意在通过向不特定公众曝光企业的错误做法,引发共鸣,以求问题的解决,其性质是对企业的威胁,极易煽动群体性事件,破坏社会稳定,因此无论其信访内容是否真实,都不是一种合法途径,属于非法的范畴。但是,此种观点未免有失偏颇,故有人主张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对于信访内容真实的自媒体信访应当纳入合法范畴,并通过严格查处,警醒企业予以有效解决。但是,自媒体信访无论传递内容是否真实都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并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故单纯以非法和合法予以区分未免过于草率,需要进一步地深入探究。对于自媒体信访传递错误信息或夸大信息的做法,虽然其传递途径非法、传递内容亦不真实,应当纳入非法范畴,但是其究竟属于刑法规制还是行政法管控,仍然存在争议。

## 3. 合规上访与违规闹访的处理困境

对于合规上访和违规闹访的相应处理结果将直接影响国有企业信访工作的推进,并左右两者的相互转化,面临处理上的困境。合规上访是按照企业的信访渠道和信访要求传递信访意见,是一种内部纠纷化解机制。这种信访并不会造成扩散性的负面影响,而是国有企业党组织联系群众、倾听建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渠道<sup>[4]</sup>。一般而言,对于合规上访,国有企业通常会按照信访程序予以处理,且由于无涉负面影响,信访处理的速度可能会拖沓,导致合规信访难以在较短时间内结束,于信访人而言,成本较高,效果较差。对于违规闹访,信访人一般会采用过激行为,或发表网络言论,或拦截党政领导,或围堵办公大门,使信访诉求在职工之间快速传播、发酵,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威胁国有企业经济发展、内部稳定。此种情况下,为了快速化解纠纷,消弥矛盾,避免信访事件的群发效应,信访部门通常会以尽快平息纠纷的心

态抓紧处理,使得违规闹访者的诉求可以在闹访中得到解决,较合规上访会更快见到成效。此种做法对于快速平抑纠纷、防止负面影响扩散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亦会助长违规闹访者的气焰,导致信访诉求层层加码,信访工作不堪重负,同时,也会导致合规上访者产生不公平感,使违规闹访愈演愈烈,并促使合规上访转向违规闹访。近年来,国有企业违规闹访急剧上升,并频现报端,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违规闹访者的“成功”例证。此外,合规上访涉及行为结点的追溯,存在合规上访的管控范围争议,即对于分流职工、解聘职工,以及因历史遗留问题而被剥离国有企业的职工能否进行合规上访的权利问题。持国有企业信访限于内部职工观点的学者认为,国有企业信访工作限于职工内部,而不能扩及非职工范围,对于丧失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的人员,不能通过国有企业信访工作再行传递诉求,避免纠纷的无期限解决。强调国有企业信访延及与职工有关人员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国有企业信访工作的核心是解决民众诉求,维护企业稳定,应当凸显企业内部化解矛盾的重要性,因此不应局限国有企业职工的当前身份,而应扩及一切与国有企业职工身份有关的人员,分流职工、解聘职工均曾经是国有企业的职工,对他们信访诉求的解决可以起到化解矛盾、安抚职工的作用。但其问题是,将国有企业信访工作对象扩及一切与职工有关的人员,必然会使信访工作面临信访工作激增、人少事多的困境。

### 三、我国国有企业信访工作走出困境的对策建议

国有企业信访工作关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稳定,需要在厘清信访与诉讼关系、有效整合传统信访模式与网络信访模式、引导违规闹访转为合规上访的基础上予以解决。

#### 1. 实现信访伸张与诉讼救济的合理分流

国有企业信访工作的首要难题是厘清信访与诉讼的关系,明确信访与诉讼的管控范围,区分信访与诉讼的不同对策。应依据国有企业信访工作的实质内涵将信访与诉讼合理分流。国有企业信访工作旨在通过对职工反映的情况、建议、意见或者投诉的适当处理,实现党组织联系群众、发现体制弊病、纠正企业决策错误,职工监督国有企业的目的。但是在工作中,只能就国有企业行为对职工造成的损害提供赔偿和修复,而不能对他人发号施令;像克减职工基本权利类的涉及刑法和行政法管控的纠纷,无法通过信访予以解决,故不应纳入国有企业信访工作范畴。值得注意的是,国有企业信访机构不应处理刑事案件并非意味着不受理刑事案件的上访,对于职工反映的腐败以及其他有碍企业和职工利益的刑事案件,信访部门仍然需要受理,并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转递给司法部门或行政机关处理。对于民法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信访工作虽然难以达到民法调整的效果,但是此类纠纷倾向于关系修复,可以由信访工作先行介入,在双方合意的基础上进行居间调解,以便国有企业内部受损社会关系的修复,并营造和谐稳定的生产环境。<sup>[5]</sup>因此,在信访与民事诉讼问题上,无需严格区分,而应优先畅通信访渠道,为职工及时解决纷争、消弥矛盾提供便利条件。在信访过程中,对于无法达成和解的职工纠纷,应向双方清楚阐释国有企业的职责权限,并明示其可依法提出诉讼或者仲裁。对于职工先行选择民事诉讼并在败诉后信访的行为,信访工作部门应以维护法律生效判决为基础,做好解释工作,并指引其通过上诉、申诉等法律救济程序来表达自己的主张。积极、主动的信访态度有助于职工内部矛盾的化解,在合理分流信访和诉讼的基础上,应加强对信访及时受理率、按

期办理率、群众满意率等指标的考核,使国有企业职工在每一件信访工作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sup>[6]</sup>

## 2. 注重传统信访与网络信访的有效整合

传统信访与网络信访都是职工向国有企业信访部门传递建议、意见、投诉的途径,应将其有机整合,并将其合法化。建立传统信访与网络信访相结合的双向信访模式,畅通信访渠道,创新信访机制,是较为可行的办法。国有企业应加速网络上访平台的建设,使国有企业职工上访途径更加通畅,成本更加低廉,诉求表达更加及时。国有企业在完善网络信访平台的同时,应加强传统信访工作,对于走访人员要热情接待,对于邮件信访要主动调查事实和回馈信息。在信访工作中,依信访职权能够办理的应及时办结,对于无法办理或调整不成的应耐心解释、晓之以理,做到无情绪化分流。对于传统信访和网络信访中传递非真实信息的行为,笔者认为,应当依据行为人的主观认知予以判断。倘若行为人在行为时明确知晓自己的上访内容是杜撰的,并故意上访,以期实现其诬告陷害、谋取私利的目的,则显属违规上访,应当以刑法和行政法予以规制。反之,倘若按照一般人的认知,行为人无从知晓自己上访的内容是虚假的,则不应予以刑法和行政法惩罚,而应当澄清事实,以理阐释。对于自媒体上访,由于上访的途径是非法的,上访人在散播上访信息时知道自己的上访信息可能存在虚假描述,亦明知自己的上访信息可能被他人利用而故意实施,因此无论上访的内容是否真实,都属违规上访,应视情节轻重以刑法和行政法予以处罚。通过惩罚自媒体违规上访的错误,可防止合法上访向非法上访的转向。有机整合后的网络信访是传统信访的网络呈现,传统信访是网络信访的现实载体,两者通力合作将有助于国有企业信访工作走出困境。

## 3. 推动违规闹访到合规上访的良性转化

国有企业信访工作需要合法范围内开展,企业职工应借助合法上访途径传递真实的上访诉求,国有企业信访部门应依职权进行信访处理。在信访工作中应鼓励合规上访,贬抑违规闹访,充分发挥信访在改进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化解内部矛盾上的积极作用。对于当前违规闹访频发的现象,一方面,应坚守底线,不搞特殊化,不予妥协,使违规闹访者得不到预期收益;另一方面,应对触犯行政法和刑法规定的违规闹访予以严厉惩处。严厉惩处可以例示闹访的违规错误,使违规闹访转向合规上访。此外,考虑到国有企业信访工作是维护国有企业内部稳定的“安全阀”,是国有企业领导方联系职工群众的“桥头堡”,是了解职情民意的“晴雨表”,应紧紧围绕职工的合法诉求有序展开。因历史遗留问题而被剥离国有企业的职工、解聘职工,以及拟解决就业问题的职工子女等,均可通过信访途径表达自身诉求。通过信访工作的热情接待、积极处理可以收到温暖人心、浸润心田之效,充分发挥信访工作在柔性化解企业内部矛盾、营造和谐生产环境中的积极作用。

### 参考文献:

- [1] 李玉文. 国有企业信访工作研究[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3(1): 180.
- [2] 龚维斌, 赵秋雁. 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31.
- [3] 彭鸿. 国有企业信访工作完善措施分析[J].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6): 91.
- [4] 张哲. 利益多元化格局中的党群关系问题研究[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5: 266.
- [5] 孙小强, 朱忠孝. 纪检监察信访举报科学化研究[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39.
- [6] 金国华, 连淑芳. 信访心理学[M].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4: 31.



引用格式:梁丹.我国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型问题研究[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6):78-86.

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6.01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6-0078-09

# 我国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型问题研究

##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imitation innovation to self innovation in China

梁丹

LIANG Dan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经济管理教研部,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实现科技创新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型,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科技强国和制造强国的关键。我国长期技术引进存在的局限性,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确立、要素禀赋的变化、对外贸易战略调整和前期科技自主创新的成功实践等,共同构成了我国科技创新模式转型的多要素环境。消除各类创新主体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大政府部门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以科技开放创新促进科技自主创新等,是实现我国科技创新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型的策略选择。

**关键词:**

科技创新;  
模仿创新;  
自主创新;  
开放创新

收稿日期:2017-09-04

作者简介:梁丹(1963—),女,河南省南阳市人,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开放型经济。

继中共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之后,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国家力量的核心支撑是科技创新能力,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推动创新发展的支点。科技创新的内涵极为丰富,涉及方方面面的关系,依据当前的科技创新环境,顺应科技创新模式转型升级的客观要求,明确自主创新的重点领域,对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至关重要。从世界工业化历史和各国的创新历程看,模仿创新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普遍采取的科技创新模式,而由以模仿创新为主向以自主创新为主转型则是一个国家向科技强国、经济强国迈进的必由之路。德国、法国、美国等工业化国家也都是在经历早期的模仿创新模式后坚定地转向自主创新模式,才发展为现代工业强国的。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前期的模仿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模仿创新过程中存在难以引进核心技术、大量低水平重复引进、对技术引进的依赖抑制国内自主创新等诸多问题。近年来我国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并提出要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正是基于我国工业发展整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与前期技术引进存在的各种问题而采取的战略举措。

国内现有文献对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这两种创新模式的内涵与作用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彭纪生等<sup>[1]</sup>认为,自主创新主要是指由创新主体依靠自身力量自主进行创新活动并实现知识、技术或制度等方面的关键性突破,从而获得独占、领先的竞争优势的主动性、率先性的创新活动;模仿创新则是指创新主体以合法方式引进创新成果并进行改进、发展、完善,从而有

利于降低创新风险、节约时间和资源成本的一种跟随性创新活动。卫平等<sup>[2]</sup>运用广义距估计法对区域面板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自主创新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而技术引进虽然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为负值。胡小娟等<sup>[3]</sup>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对我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发现,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对我国制造业出口都有显著正向作用,但随着技术复杂性与模仿成本的提高,自主创新对制造业出口的正向作用要大于模仿创新。陈虎等<sup>[4]</sup>通过对美国、日本、韩国和巴西等不同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企业创新主体建设状况的分析发现,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美国、日本、韩国在中等收入阶段都已确立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等国家,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建设普遍都比较薄弱。现有研究成果对创新模式转型问题的研究都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拟通过对我国由以模仿创新为主向以自主创新为主转型的多要素环境分析,提出我国实现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型的策略,以推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

## 一、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型是实现科技强国的必然选择

模仿创新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普遍采取的一种科技创新模式,但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输出动机和世界各国的科技创新历程的研究,可以得出一条规律:依靠引进和模仿不可能成为科技强国。

### 1. 推进技术梯度转移是发达国家维护自身科技优势地位的一贯做法

从技术输出国的行为动机看,在世界科技进步的不同阶段,发达国家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为了维护自身在技术竞争中的有利地位,都强烈地维护和推广现有分工格局,极力保

持和巩固自身在产业链上的优势,强化其在关键技术、关键行业的垄断地位,使欠发达地区在技术引进方面对发达国家形成持续性的依赖。在全球技术转移的实践中,发达国家决不会无私地、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地把自己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欠发达国家,我们看到的普遍现象是: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转移政策从来是止步于“梯度转移”——技术梯度转移和产业梯度转移。发达国家技术输出、产业输出的主要目的就是不断地把本国那些落后的、衰退的、淘汰的技术、产业、产品向欠发达国家转移。这样,一方面可以为那些即将淘汰的技术和产业找到新的出路,获得巨额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顺利实现“腾笼换鸟”,为国内新技术的利用和新产业的发展腾出发展空间。总之,既要借转移攫取利益,又不致因转移而失去优势。从欠发达国家来看,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技术引进,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进一步扩大了。

## 2. 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型是西方科技强国的成功秘诀

德国、法国、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是在经历了早期的模仿创新模式后及时、坚定地转向自主创新模式才发展为现代工业强国和科技强国的。学术界一向公认日本是最擅长技术引进和模仿的国家之一,但实际上日本并不是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才成为工业化强国和科技强国的。二战后,日本从自己的基本国情出发,不断地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策略。1950—1970年代,日本实行“贸易立国”战略,主要通过政府部门的干预、引导,从欧美国家引进大量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在产品加工组装和形成规模化生产方面形成初步的优势,并积极引导企业的创新方向,通过政策鼓励将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重点从技术引进转向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促进企业向产业链的

上游迈进。进入1970年代,一部分企业开始具备创新研发能力,尤其是在外观设计方面的创新成果比较明显,产业结构开始由劳动、资源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包括汽车、家用电器等产品的出口开始席卷全球市场。1980—1990年代,日本实行“技术立国”战略。这一战略调整主要是由于利用引进技术和设备生产的同类产品的出口在欧美国家受到围堵和打压,日本不得不把进一步提升自主研发能力当作解决外部贸易争端的突破口,推动日本企业由之前的以外观设计创新、追求专利数量为主转向以独立发明创造、追求专利质量为主。在这一阶段,科技创新对日本产业振兴的促进作用得到比较好的发挥,使日本成为继英、法、德、美之后的又一世界科技强国。2002年至今,日本实行“知识产权立国”战略。这一战略调整可以看作其“技术立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主要是通过希望通过从战略层面创造、保护和应用知识产权,更好地应对来自欧美国家的知识产权压力,以及来自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竞争,尽快摆脱长期经济疲软、产业竞争力下滑的局面,重振日本经济,提升日本国际竞争力。研究日本的技术创新史可以发现,战后初期的技术引进、模仿只是奠定了日本技术创新的基础,而推进自主创新才是日本成为科技强国的根本保障。

## 3. 中国不可能通过引进和模仿成为科技强国

基于社会性质、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西方国家一直把阻碍中国获得先进技术从而迟滞中国的技术发展进程当作遏制中国的主要手段。美国不仅自身长期实行严格的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还通过各种途径控制其他发达国家对华出口高科技产品。由美国发起、成立于1949年11月的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也称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其宗旨就是限制



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禁运产品包括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三大类上万种产品,中国就在其禁运国之列。冷战结束后,“巴统”于1994年4月1日宣告解散,但不久后的1996年7月,以美国为首的33个西方国家又签署了《瓦森纳协定》(全称为《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安排》),决定从1996年11月1日起实施新的控制清单和信息交换规则。控制清单有两份,一份是军民两用商品和技术清单,涵盖了先进材料、材料处理、电子器件、计算机、电信与信息安全、传感与激光、导航与航空电子仪器、船舶与海事设备、推进系统九大类;另一份是军品清单,涵盖了各类武器弹药、设备与作战平台等共二十二类。《瓦森纳协定》具有明显的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点,中国自然在被禁运国家之列。美国为了更严厉地限制中国军事技术的发展,还要求《瓦森纳协定》国家专门成立中国委员会。按照《瓦森纳协定》的规定,成员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允许敏感产品和技术的出口,但实际上协定成员国的出口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美国控制的。例如,捷克曾经有向中国出口无源雷达设备的意愿,但迫于美国的压力不得不停止交易。近年来中国整体实力的快速崛起,已经引起整个西方国家阵营的高度警惕,“中国威胁论”“零和博弈”“修昔底德陷阱”等论调在各种场合一再被炒作。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现实是:由于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实行技术封锁,中国企业根本无法从国外获得前沿技术、核心技术。过去几十年,我们在很多领域不断地从国外引进技术和成套设备,通过引进、模仿使国内各个产业追踪国际科技进步潮流,对满足国内生产生活需求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长期的大量低水平重复引进、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对国外的严重依赖、不掌握核心技术造成的盈利空间狭小、抑

制国内自主创新等弊端渐渐地凸显出来。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依靠引进、模仿根本不可能成为科技强国。

## 二、我国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型的多要素环境分析

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两种基本途径。中国作为技术后发国家,过去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以引进、消化、吸收为特征的模仿创新一直都十分重视,但基于以下因素,推动科技创新由以模仿创新为主向以自主创新为主转型已经成为实现创新发展战略的关键。

### 1.《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的由跟踪向并行、领跑转变的实质是推动创新模式转型

鉴于目前发达国家在科学前沿和高技术领域整体上占据明显领先优势,而我国还有一大批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还有相当多的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特别是我国支撑产业升级的科学技术储备还明显不足,《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了我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三步走”战略目标:第一步是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其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目标是要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一系列重大瓶颈问题,初步扭转关键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在若干战略必争领域形成独特优势,为国家繁荣发展提供战略储备、拓展战略空间;第二步是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其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目标是从总体上扭转科技创新以跟踪为主的被动局面,在若干战略领域由并行走向领跑,形成引领全球学术发展的中国学派,产出对世界科技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有重要影响的原创成果,攻克制约国防科技的主要瓶颈问题;第三步是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其中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的目标是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和创新型企业,涌现出一批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和国际顶尖水平的科学大师,成为全球高端人才创新创业的重要聚集地。总体上看,《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对创新能力提升的要求就是由跟踪向并行、领跑转变,重点是加强对关系全局的科学问题和技术问题的研究部署,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我国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品产业创新的整体水平,在创新模式上从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型。

## 2. 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强化企业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为实现科技创新模式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和保障

创新主体即创新活动的实际发起者和实施者。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校都是创新主体,改革的方向应是强化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的创新主体地位,政府在引导、扶持、营造创新环境、保障创新效率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企业是直接面对市场的,它们最了解市场需求,也最有条件优化配置市场上的研发资源与创新要素,从而在最短时间内形成研发成果并产生经济效益。学术界公认,美国、日本和韩国成功地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主要原因是这几个国家在跨越阶段都确立了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而以巴西为代表的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则是因为企业创新主体建设滞后。统计显示,1960年代,美国约有75%的研发工作是在企业完成的,企业是美国科技活动和创新体系名副其实的主体;而在巴西,1986年350万大学毕业生中仅有5万多名研究人员,并且其中的91.6%都进入了政府研究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生产部门吸纳的研发人员合计不到4%。<sup>[5]</sup>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政府虽主动从创新主体的位置上退

出,并把大量的技术创新任务交由企业,但科技人员、用于研究开发的专用技术设备、技术专利、信息等创新所需的资源仍然主要集中在政府所属的科研机构 and 高等学校,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突出、自主创新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依然比较严重。企业自主创新积极性不高主要是因为内生动力不足。其一,外商投资企业由于以加工贸易为主且可以享受大量优惠政策,因此不仅缺少自主创新的现实需求,也缺乏内生动力。其二,国有企业虽然具备自主创新的要素优势,残酷的市场竞争也提出了强化自主创新的现实需求,且国有企业的创新风险主要由国家或全民承担,但由于政治关联度高、激励机制不健全、体制依赖惯性、创新风险可能会影响企业绩效等原因,国有企业也缺乏推动自主创新的动力。其三,民营企业虽然政治关联度不高,长期遭受政策歧视,且一开始就在市场竞争中摸爬滚打,要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和市场支配地位,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增加原始技术积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但因为缺乏风险规避分担机制,也存在自主创新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针对企业在创新主体地位和自主创新内生动力方面存在的不足,一方面,十分重视对企业创新主体的培育壮大,强调要明确各类创新主体在创新链不同环节的功能定位,激发主体活力,系统提升各类主体的创新能力,夯实创新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经营者绩效考核、薪酬机制改革、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开放创业板市场等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这些改革措施都为实现科技创新模式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保障。

## 3. 要素禀赋的变化和前期科技自主创新的成功实践,为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中国工业化发展整体上进入中后期阶段,一方面,低成本劳动力等资源优势日益削

弱。虽然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依然存在,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单纯靠劳动力、土地等各种资源优势推动经济发展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另一方面,资本、技术、自主研发能力等过去的稀缺要素正变得日益丰富,许多领域的自主创新优势正在快速形成。特别是在航天、军工和一些民用高端制造领域,中国近年来已经通过自主创新形成了北斗系统、中国“天眼”、2000 预警机、超级计算机、雷达技术、3D 打印、激光技术、微晶钢、量子存储器、盾构机、引力精密测量、高导热超柔性石墨烯膜等一大批国际前沿科技成果。在一部分领域,中国与国际前沿技术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总体上看,中国在全球的技术位置快速前移。由康奈尔大学、英士国际商学院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发布的 2017 世界各国创新指数显示,中国的排序已经由 2016 年的全球第 25 位提升为 2017 年的全球第 22 位。

#### 4. 对外贸易战略调整为推动科技自主创新提供了行动指引

我国经济增长从 1980 年代开始实行出口导向战略,1990 年代初期经济发展即进入出口主导型快速增长阶段。长期实行的出口导向战略对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都形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我国实行的出口导向战略是以允许外资企业大量进入为前提的。这样以来,一方面,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市场战略是直接投放处于成熟期的产品并迅速占领我国市场,其产品研发主要以局部改进为主,不存在自主创新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加工贸易企业作为外资企业的在华生产主体,其产品特点是部件生产及其工艺技术高度标准化,组装环节的技术含量低;其生产布局特点是全球范围内分散化、模块化,连续的生产过程被打散后分布在世界各地,产品质量主要是由关键部件决定,国内的外资加工贸易

企业主要从事简单配件生产和最后组装,虽然可以快速形成大规模的生产能力,但很难从分散的生产过程中获得有价值的技术溢出,也很难把加工组装优势转化为技术能力和技术优势;其技术创新特点是由跨国母公司全面主导技术变化,母公司通过控制核心部件实现对全球价值链的控制,关键部件越来越复杂、核心技术创新频率越来越高,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越来越短。任何一家加工贸易企业都只能在模块内进行工序工艺的革新,而不可能进行自主的技术创新。这就决定了外资加工贸易企业极度缺乏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

在这种出口导向战略下,国内企业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市场竞争策略主要是价格战。虽然也有少数国内企业注重自主创新,以高度原创性的新产品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但多数企业则是选择追随、适应性的产品技术战略,模仿发达国家已有的或者由外资企业带入我国的产品和技术标准,企业的创新活动大多体现在对产品进行局部的工序创新与组织创新方面。

基于出口导向战略的影响,这一时期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突出特点就是“大进大出”,虽然出口规模大、增长快,但出口结构不合理,效益不理想。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由于全球市场萎靡不振,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兴起,我国外贸出口的市场份额受到挤压,一般制成品、传统产品出口难度加大。在此背景下,我国迅速把出口导向型战略转向更为务实的出口与内销并重战略,大力推动对外贸易方式转变,鼓励企业提高出口的质量和效益,并将“优进优出”作为新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目标。从目前情况看,这一战略转变对企业创新方式选择的正面引领作用已经开始显现,技术含量比较高、附加值比较高的机电产品和高新产品出口增长较快,2016 年我国机电产品和高

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达到57.6%和28.8%。

### 三、实现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型的策略选择

推动我国科技创新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型,可考虑有针对性地采取以下策略。

#### 1. 消除各类创新主体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体制、机制障碍

首先,应切实提升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积极性。一是应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优化法人治理结构,完善期权激励措施,将高管的工资收入与企业的年度绩效、期权与整个任期的创新收益挂钩,从而将国有企业经理人个人的任期利益与企业的长远利益紧密联系,强化企业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sup>[6]</sup>二是应对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设定分阶段目标,设置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分类增长目标、技术投入比率要求,完善企业自主创新绩效考核体系,形成企业自主创新的外部压力。

其次,应消除民营企业科技自主创新的体制和制度障碍。一是应通过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赋予民营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我国民营企业具有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已经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自主创新模式,但近年来出现的由民营企业自主选择形成的政治关联问题应该引起关注。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参政议政,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现象也由此凸显。王增男<sup>[7]</sup>通过对2009—2014年创业板230家上市民营企业研发投入比例进行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已经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因此,要更好地调动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有效抑制民营企业通过政治关联发生寻租行为,不仅要从法律层面增加其寻租的成本,更需要在产业进入、项目获得、资金支持、人才引进

等方面消除民营企业遭受的实质性限制,注重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二是应促进民营企业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民营企业与职业经理人密切合作的体制和机制。重点是从外部引进民营企业自主创新所需要的具有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的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加强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管理,进一步从制度、技术、管理等层面增强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创新优势。

再次,应对外资企业设置自主创新门槛。应依据我国的产业发展政策和国家推进科技自主创新的主攻方向,对相关行业引进外资提出明确的自主创新能力和行为要求,如要求外资企业将研发机构、核心产品与关键部件的生产引入中国,在中国设立联合研发机构,在已有研发机构中扩大对本土企业的开放程度,吸纳本土企业参与重大研发创新活动,为本土企业增强技术吸纳能力提供帮助等。

最后,应进一步深化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的科研体制改革。应按照分类改革的思路,将属于技术开发类的应用型科研机构 and 设计单位彻底改制为科技型企业,或者将其应用性最强的部分直接并入科技型生产企业,以提升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对公益类科研院所应进一步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在保障基本运行经费的前提下,鼓励它们到市场上找项目,提升自主创新水平。<sup>[8]</sup>应推进高等学校的研发机构与企业进一步融合,鼓励它们更好地利用大学科技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开放型创新平台,更多地参与一线的研发项目。

#### 2. 加大政府部门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

虽然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但支持自主创新活动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日本创新驱动模式有一些突出的特点,如政府主导、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有机结合,建立了包括宏

观、微观各个层面的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财政支持力度大,且支持措施不断创新,注重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重视科技成果转化等。<sup>[9]</sup>从中可以看出,政府的作用不可缺少。

加大政府部门对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应重点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应明确支持科技自主创新的主攻方向。应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基因编辑和新材料、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科技自主创新,力争用较短的时间突破核心技术,解除技术瓶颈制约,拿出原创性成果;二是应建立自主创新基金,搭建自主创新平台,对高新技术企业加大所得税优惠力度,对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鼓励创新实力突出的企业更多地参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使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能够获得来自各方面的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三是应从政府层面优化创新资源分配机制,把创新资源更多投向好项目、好团队,降低企业自主创新成本,为各种所有制企业提供完善的自主创新公共服务;四是应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作用,重点选择采购那些国内影响力大、消费者认可度高、国内市场容量大、潜力大、可持续性强的产品,通过有效的进口限制,营造良好的内需导向市场环境,为相关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有效保护;五是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造适宜自主创新的的社会环境。基于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状况,应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领域的宣传,建立统一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平台,增强知识产权信息服务能力,并通过培育完善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进一步扩大知识产权的商业应用范围,形成鼓励创造、发明的社会氛围;应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形成与国际接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大侵权案件查处力度,切实保护专利权所有者的权益。

### 3. 以科技开放创新促进科技自主创新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已经由原来封闭环境下的运用区域性资源转变为开放环境下的全球资源共享,科技开放创新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利用科技创新资源,把国内外的科技创新优势资源结合起来,使科技创新成为一种全局性的活动。对于一个区域或者一个企业而言,科技开放创新可以充分利用来自外部的创意与技术资源来强化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同时对外部新技术的引进还可以极大节省内部研发活动的时间、资金投入,提高科技创新速度。对参与科技开放创新的各个主体来说,创新合作不仅可以实现科技创新资源的互补,还可以共担科技创新风险和科技创新成本,提高各自的科技创新效率,实现协同效应,通过创新合作产生全新的技术,获得重大技术突破。以科技开放创新促进科技自主创新,应着重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应构建开放的科技创新合作体系。创新资源分布不平衡、创新能力不平衡是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表现。创新资源密集、创新能力较强的地区,如沿海发达地区,由于科研院所密集,科研人才储备多,资金充足,创新的体制机制都比较完善,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区域的自主创新活动就可以有效开展。但对于创新资源相对匮乏的区域,如内陆一些地区,由于高层次科研院所少,科技人才外流现象严重,科研人才引不来、留不住,科研启动资金不足,体制机制创新滞后等原因,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活动的难度就比较大。因此,加快构建开放的科技创新合作体系,对于培育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就显得特别重要。应打破国别、行政区域、所有制等方面的制约,充分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努力引进和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平台,吸引国内外知名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参与研发活动,积极引进金融

机构、创投公司,尽快形成一批新型、高端、专业、市场化的研发和服务机构。应鼓励跨区域协同创新,将更多的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仪器设备向各类创新主体开放。

其次,应突出政策设计、管理体制、人才队伍建设的开放性。一是应突出政策设计的开放性。应发挥开放创新对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鼓励各地结合自身的区域特点、主导产业特点和产业发展方向、自主创新现状等,积极开展科技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大胆借鉴国内外特别是发达国家鼓励自主创新的经验和政策,在科研项目选择、股权激励、科技金融结合、知识产权运用与保护、科技成果转化、科技评价等方面进行探索。二是应建立开放高效的管理体制。应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创新创业活动的干预、消除行政审批过程中政府部门相互掣肘等方面进行大胆改革;应在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按照国际惯例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实现“多规合一”等方面进一步推进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三是应突出人才队伍建设的开放性。应以更优的政策引进人才,以更活的方式用好人才,以更好的服务留住人才,尽快形成一大批创新型科技团队。应打破传统官本位制度特别是行政级别制度的束缚,把最合适的管理人才放在最合适的管理岗位上。对管理人才的选择,应主要考虑他们的能力而不是现有级别。应从国内外选择一批具有开放理念

和科技创新管理经验、掌握科技创新前沿知识的高端管理人才,大胆地把他们放在重要的管理岗位上。应通过建立灵活高效的人才培养、评价、选拔、聘用、流动配置、薪酬激励等机制,对首席科学家、特聘研究员等岗位采用人在岗在、人走岗销的新型管理模式。

#### 参考文献:

- [1] 彭纪生,刘春林. 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的博弈[J]. 科学管理研究,2003(6):18.
- [2] 卫平,张玲玉. 不同的技术创新路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J]. 城市问题,2016(4):52.
- [3] 胡小娟,陈欣. 技术创新模式对我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J]. 国际经贸探索,2017(1):57.
- [4] 陈虎,王一鸣. 企业创新主体建设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 中国发展,2017(2):26.
- [5] COE D, HELPMAN E.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J]. European Economics Review, 1995(39): 12.
- [6] 王东京. 创新主体的动力从哪里来[N]. 北京日报,2017-04-10(013).
- [7] 王增男. 高管政治关联与我国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J]. 时代金融,2016(2):67.
- [8] 魏世杰. 中国创新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和完善思路[J]. 中国科技论坛,2017(2):6.
- [9] 童爱香,孙艳艳. 美国与日本创新驱动模式比较[J].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11,26(10):61.



引用格式:袁金星.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路径探析——基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实践的思考[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6):87-93.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6.013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6-0087-07

#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路径探析

——基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实践的思考

##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Zhengzhou-Luoyang-Xinxiang national independent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national independent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袁金星

YUAN Jinxing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新形势下践行创新发展新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新战略的重要抓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中的主要经验有:强化政策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突出自身优势以集聚发展动能,发展双创以激发区域创新动力,整合创新资源以推进区域创新一体化,加快开放式创新以链接全球创新网络。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正处于起步阶段,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基本全面形成,体制机制创新和支持保障力度正在加大,各类创新资源加速集聚,还存在高端创新资源相对不足、协同发展机制不够完善和政策环境营造不够充分等问题。要加快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就要把郑州、洛阳、新乡三市的国家级高新区作为自创区发展的主要阵地,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作为自创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把高新技术企业作为自创区发展的主要力量,把创新一体化发展作为自创区发展的主要特色,把壮大创新人才队伍作为自创区发展的主要支撑,把与国家战略融合发展作为自创区发展的主要策略。如此,才能切实促进河南打造中西部科技创新高地,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关键词:**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高新区;  
人才;  
创新一体化发展

收稿日期:2017-09-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JY046);河南省政府决策招标课题(162400410008);河南科技智库调研课题(HNKJZK-02B)

作者简介:袁金星(1983—),男,河南省卫辉市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科技经济、区域经济。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曾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冲击,此后,发达国家纷纷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推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发展战略,期望经济发展由虚拟经济回归实体经济,从而继续占据全球新一轮产业分工制高点。为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2009年我国提出“要发挥国家高新区在引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支撑地方经济增长中的集聚、辐射和带动作用”,并先后批复中关村、东湖、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自创区”)。中共十八大又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自创区作为重要战略抓手开始加速布局,孵化了新产业,催生了新业态,形成了新模式,有力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2016年5月,郑(州)洛(阳)新(乡)自创区正式揭牌,标志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河南落地。建设好郑洛新自创区成为河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历史机遇,也成为关系河南当前和长远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拟在系统梳理国内自创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总结自创区发展的一般经验,并结合郑洛新自创区的发展现实,提出郑洛新自创区的发展路径。

## 一、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相关研究综述

“自创区”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充分的理论依据,从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发展理论到埃弗雷特·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再到克莱顿·克里斯滕森的破坏式创新理论和亨利·伽斯柏的开放式创新理论等,都从创新的技术演化、动力机制、技术创新模式等角度揭示了欠发达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创新路径,为开展自创区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就国内而言,学者对自创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领域。

一是关于自创区创新能力和创新效能的比

较研究。齐晶晶<sup>[1]</sup>通过建立区域创新体系效能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径向基神经网络模型对中关村、东湖、张江和长株潭四个自创区创新体系效能进行了对比分析;周洪宇<sup>[2]</sup>构建了自创区创新能力评价模型,对中关村、东湖、张江进行了创新指数对比分析;卢长利等<sup>[3]</sup>运用定量分析法,对中关村、东湖、张江自创区知识产权、人才政策、企业状况、创新产出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岳书敬等<sup>[4]</sup>以苏南五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跨市域的综合创新效率评价模型,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对五市综合创新效率进行了评价。

二是关于自创区不同发展模式的探讨。王剑等<sup>[5]</sup>认为,中关村自创区以产学研合作模式为主,张江自创区为政府权力下放模式,并对两种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刘剑等<sup>[6]</sup>认为,苏南自创区作为首个以城市群为基本单元的自创区,应重点突破地区间创新定位同质化、创新资源差异、行政壁垒等问题,走区域创新一体化发展模式。此外,媒体、报刊和众多学者言谈中对苏南自创区这一以城市群为基本单位、以创新驱动为内核、以一体化发展为特色的发展模式常常冠以“新苏南模式”称谓。

三是关于自创区发展中具体问题的研究。宋艳红等<sup>[7]</sup>对苏南自创区创新一体化过程中政府间合作机制构建进行了研究;李燕萍等<sup>[8-9]</sup>对自创区人才政策、创业政策进行了分析;周楠<sup>[10]</sup>指出了张江自创区产学研合作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对策建议;傅首清等<sup>[11-13]</sup>均对中关村自创区构建产学研合作体系提出了建议;代丽娟等<sup>[14]</sup>从信用贷款、资本市场等四个方面提出了科技金融支持东湖自创区发展的政策建议。

纵观已有研究,自创区的建设发展受到了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整体而言,相对于新形势下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要求和经济结构调整对科技创新



的新需求,相关研究略显滞后,其主要表现在:其一,对设立较早的中关村、东湖、张江自创区和首个以城市群为基本单元的苏南自创区研究较多,对其他自创区的研究偏少;其二,对不同自创区进行定量比较的多,而对不同自创区的发展特点、示范主题、建设路径、创新模式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的少;其三,对自创区发展中的具体问题研究较多,而对于实践中的一般经验总结归纳较少。笔者认为,对国家自创区发展的一般经验加以总结,有助于各自创区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 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的主要经验

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我国践行创新发展理念、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力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自2009年3月北京中关村自创区获批以来,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已经建有17个自创区(见表1),在推进自主创新、打造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可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 1. 强化政策与体制机制创新

自创区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试验田,享受国家相关优惠政策,允许在相关领域先行先试探索,进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此,各自创区都将落实中关村“6+4”政策作为首

要任务,同时积极出台先行先试政策,开展体制机制创新,如苏南自创区实施了“一所两制”、合同科研、项目经理、股权激励等改革措施,推动形成了专业化、社团化、国际化的产业研发创新网络;西安自创区推行服务承诺、超时默认等服务制度,205项审批服务事项中的90%以上做到了即来即办等,营造了良好的发展氛围。

### 2. 注重突出自身优势和特色

各自创区的发展基础、战略定位、发展思路等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是都特别注重依托自身优势和资源,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和经验。一是突出地区区位优势,如珠三角自创区发挥其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搭建了粤港科技创新走廊、深港创新圈等港澳创新合作平台。二是突出科技资源特色,如西安自创区依托国防科技资源集群优势,建设了军民融合产业基地,有效促进了军企与民企合作、互动融合发展。三是突出政策高地特色,如天津自创区积极探索自创区和自贸区联动发展,初步形成“双自联动”政策框架,给企业发展带来巨大便利。四是突出全局工作特色,如杭州把自创区发展与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国家科技金融试点城市等工作结合起来,形成了杭州创新工作一盘棋。

### 3. 大力发展“双创”以激发区域创新动力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通过“双创”加快科技创新、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已经

表1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情况表

地区	名称	设立时间	地区	名称	设立时间
北京	中关村示范区	2009.03	浙江	杭州示范区	2015.09
湖北	东湖示范区	2009.12	广东	珠三角示范区	2015.11
上海	张江示范区	2011.03	河南	郑洛新示范区	2016.04
广东	深圳示范区	2014.06	山东	山东半岛示范区	2016.04
江苏	苏南示范区	2014.10	辽宁	沈大示范区	2016.04
湖南	长株潭示范区	2015.01	福建	福厦泉示范区	2016.06
天津	天津示范区	2015.02	安徽	合芜蚌示范区	2016.06
四川	成都示范区	2015.06	重庆	重庆示范区	2016.07
陕西	西安示范区	2015.09			

成为一个共性路径,各自创区都把加快“双创”发展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一是以优化环境服务“双创”,如张江自创区搭建了产权服务平台、企业专利联盟建设试点、科技金融服务平台,苏南自创区成立了2500人的创业导师团队等。二是以平台建设支撑“双创”,如深圳自创区设立了2亿规模的创客专项资金和3亿规模的创客母基金,支持创客空间建设。三是以赛事活动引领“双创”,如东湖自创区持续举办“硅谷—光谷”双创节、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等大型赛事活动,以赛事激发创业激情。四是以机制创新促进“双创”,如成都自创区通过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形成了天使投资、创业投资、专业化私募基金、产业投资股权融资产品链,集聚了近400家股权投资机构,有力支撑了区域“双创”发展。

#### 4. 整合创新资源以推进区域创新一体化

各自创区均将加快创新资源整合、推进区域内外创新资源互通共享、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创新布局优化整合,作为推动区域创新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任务。一是推进创新功能集聚,如张江自创区布局了上海量子通信产业园、胶囊内镜机器人试生产线等国际领先、带动作用明显的重大项目,启动了科技创新功能集聚区建设,形成了资源集聚高地。二是整体联动统筹发展,如苏南自创区跨行政区域统筹重大科技平台、区域产业发展和创新空间布局,形成了区域创新上下联动、统筹推进的良好态势。三是深入开展区域合作,如张江自创区发起建立了长江流域园区合作联盟,与其他自创区、高新区共建科技园区,形成了“基金+基地”的合作园区市场化运用模式,有力推动了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协同创新。

#### 5. 加快开放式创新以链接全球创新网络

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来,全球创新版图正在加速重构,调动和运用全球创新资源、加快

融入全球研发创新体系,已成为各自创区应对竞争的主要手段。一是开展国际合作促开放,如成都自创区积极建设中韩创新创业孵化园、中古生物医药产业园等,同时依托欧盟项目中心深化中欧技术商务合作,实现了世界级的创新团队、资本和技术的双向流动。二是举办大型会议促开放,如中关村自创区通过举办国际科技园区协会2015年世界大会,直接促成26个国际合作项目落户中关村。三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促开放,如张江、天津等自创区纷纷在硅谷、爱尔兰等全球公认的创新中心设立联络机构,以链接全球最活跃的生产力、核心技术和人才。四是实施“引进来”战略促开放,如深圳自创区引进了微软、甲骨文等一批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同时建设了一批国家化特色学院,打通了对接国外创新资源的通道。

### 三、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的成就与不足

郑洛新自创区获批以来,河南省将其作为引领全省创新发展的综合性平台,多措并举支持该示范区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

其一,规划体系、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基本形成。围绕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坚持省、市联动,河南省对自创区发展进行了一系列顶层设计。一是编制实施方案和发展规划。从省级层面颁布了《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出台了《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6—2025年)》,明确了郑洛新自创区建设的规划图和施工图。二是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了30条具有突破性、前瞻性、实用性的政策,相关部门出台了相关配套政策措施,与此同时,郑、洛、新三市也出台了相关政策,初步构建了有效支撑自创区发展的“1+N”政策体系。三是工

作机制初步建立。省级层面成立了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设立了领导小组办公室,形成了专门机构、专门人员、专职从事示范区建设的工作机制,三市及其高新区相继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制,形成了共同推动自创区建设的体制机制。

其二,体制机制创新、支持保障力度正在加大。河南省采取省、市、高新区联动的方式,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思想,创新体制机制,以加快形成有利于自创区健康发展的服务保障体系。一是推动科技与金融紧密结合。创新财政科技投入方式,采取“直接变间接、无偿变有偿、资金变基金”的方式,发起设立了首期规模3亿元的示范区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带动金融资本、民间资本、地方政府和其他投资者共同支持创新创业,同时,与金融机构开展战略合作,采取科技信贷损失补偿等方式,引导银行和担保机构加大对科技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二是设立示范区建设专项资金。河南省财政设立3亿元的示范区建设专项资金,同时郑、洛、新三市也分别设立了专项配套资金,省市两级投入总额近10亿元的专项资金,支持自创区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和建设重大创新平台等。三是协调联动推动机制形成。省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统筹谋划重大事项,科技、财政等部门整合资源向自创区进行政策倾斜,郑、洛、新三市落实主体责任,形成了省统筹、市建设、区域协同、部门协作的推进机制。

其三,创新主体、平台、人才等创新资源加速集聚。围绕创新能力提升,河南立足郑、洛、新三市及其高新区的现实基础,统筹发展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要素合理流动,自创区创新能力明显提高。一是创新主体明显壮大。2016年,自创区高新技术企业超过900家,占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的比重接近60%;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4600多家,占全省的1/3。二是创新平台载体进一步丰富。郑州市获批国家促进科技

和金融结合试点城市,洛阳市获批国家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基地示范城市,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正式投入运行,全省80%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均集中在自创区;2016年全省新建的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将近一半集中在自创区。引进清华大学启源先进光源产业技术研究院、光启洛阳尖端技术研究院等一批新型产业研发机构,成为示范区产业技术创新的核心引擎。三是创新创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郑、洛、新三市持续实施“智汇郑州·1125聚才计划”“河洛英才计划”“牧野人才计划”,成功引进一批高层次人才带着团队和项目落户自创区。通过上述举措,郑洛新自创区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在全国高新区排名中稳中有升。

与此同时,郑洛新自创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比较明显:一是高端创新资源相对不足。与其他自创区相比,区域内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不多,高水平创新平台较少,以两院院士、“千人计划”为代表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在全国所占比例较低,与其他省、市、自治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相比,实力明显不济。二是协同发展机制不够完善。各片区在发展定位上存在同质化倾向,产业发展战略定位不够清晰,还没有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协同推进的机制。三是政策环境营造不够充分。模仿其他自创区的政策较多,原创性、突破性的政策较少,同时政策宣讲、督导还不够,不少好的政策还存在落实不到位的现象。

#### 四、加快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的路径选择

郑洛新自创区是带动河南创新发展的核心载体和构建区域创新格局的重要战略支撑点,对于河南打造中西部科技创新高地和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结合其他自创区发展实践经验与郑洛新自创区的发展基础,

要加快郑洛新自创区建设与发展,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 1. 把郑、洛、新三市的国家级高新区作为自创区发展的主要阵地

拥有较强实力的科技园区是创新驱动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自创区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建设郑洛新自创区,实质上是在更高层次上建设郑、洛、新三市的国家级高新区。应争创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使郑州、洛阳、新乡高新区成为自主创新的战略高地、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载体和攻占高新技术产业制高点的前沿阵地。应培育创新核心区,在三市国家级高新区中建设一批集知识创造、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培育为一体的创新核心区,显著提升高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内生发展能力。应统筹高新区比较优势,针对各自的发展基础,坚持错位发展,对三市国家级高新区的优势产业加大支持力度,推动各高新区做强做大特色主导产业。

### 2. 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作为自创区发展的主要方向

创新型产业处在整个产业链条和产业体系的前沿和高端,发展创新型产业,是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根本方向和自创区建设的重要任务。应重新梳理三个片区的产业布局,在继续做优做强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装备制造产业的同时,瞄准全球产业链的重点领域、技术链的主流方向和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推动郑洛新自创区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应努力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新高地,通过与国内国际科研院所、高等学校进行产学研合作,大力培育新兴产业和自主品牌,推动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3D打印,以及基于开源硬件的创客、众包、众扶等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的发展,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成为自创区的主导产业,引领全省产业转型升级。

### 3. 把高新技术企业作为自创区发展的主要力量

高新技术企业是创新的主导者、实践者。建设郑洛新自创区,应抓住高新技术企业这个关键点,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应加大创新型培育力度,在重点产业领域选择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处于行业骨干地位的企业,集成国家、省、市及社会创新资源,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引领产业发展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应加大对自创区高新技术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完善优先使用创新产品和服务的政府采购制度,使高新技术企业尽快成长为行业龙头企业。应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契机,综合考虑国际前沿、河南战略需求与未来产业发展,在自创区范围内建立起覆盖企业初创、成长、发展等不同阶段的政策支持体系,以促进高新技术企业持续大量涌现,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sup>[15]</sup>

### 4. 把创新一体化发展作为自创区发展的主要特色

郑洛新自创区是跨行政区划的自创区,郑、洛、新三市是全省创新资源最集中的区域,区域创新一体化发展能够带动河南经济的整体跃升。应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打破现有行政区划限制,突出优势互补和竞争合作,使其既能在相关产业领域公平竞争,又能在重大创新项目中强强合作,进而建立起协调有序、科学高效、互动合作的区域创新体系。应彰显特色,错位发展,按照“要素集聚、资源共享、错位竞争、联动发展”的要求,注重依托自身优势和资源,围绕各地的主导产业,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推动主导产业在特色发展中向中高端攀升。

### 5. 把壮大创新人才队伍作为自创区发展的主要支撑

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在推进郑洛新自创区建设时应大力培养和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应以产业发展为导向、企业需求为

重点,广泛吸引各类人才特别是科技领军人才、紧缺人才和创新人才团队,对“中原学者”、省管优秀专家实行特殊支持政策。应探索技术移民制度,以“人才绿卡”制度为基础,争取国家在郑洛新自创区开展技术移民制度试点,推进外籍高层次人才永久居留政策与户籍管理、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有效衔接。应健全科技人才流动机制,加快实施中央《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建立开放式综合服务平台,打破户籍、地域、身份、人事关系等制约,实现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创新人才双向交流。<sup>[16]</sup>

## 6. 把与国家战略融合发展作为自创区发展的主要策略

将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洛新自创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事关河南的国家战略全面实施,可拓宽自创区发展协作领域,营造更多的机遇。应在推进郑洛新自创区建设过程中,进一步统筹与其他国家战略间的关系,构建充满生机的现代创新体系,充分运用科技力量,形成国家战略规划之间相互融通、相得益彰的生动局面,使省内的国家战略形成发展合力。应深度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拓宽郑、洛、新三市国家级高新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领域,在科技人文交流、国际科技合作、产业技术转移等方面不断探索国际合作新模式,发出更多“河南声音”,配合中央讲好“中国故事”。

## 参考文献:

- [1] 齐晶晶.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体系效能的评价与比较[J]. 统计与决策, 2015(24): 49.
- [2] 周洪宇.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能力比较研究——以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上海张江为例[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5(11): 34.
- [3] 卢长利, 董梅.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创新比较研究[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5(4): 455.
- [4] 岳书敬, 胡姚雨, 邹玉琳. 跨市域地区综合创新效率分析——以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例[J].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12): 33.
- [5] 王剑, 张天竞, 塔娜.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模式比较与示范效应研究——以中关村、上海张江为例[J]. 科学管理研究, 2016(12): 17.
- [6] 刘剑, 陶应虎. 城市群创新一体化发展难点与对策建议[J]. 经济纵横, 2017(4): 91.
- [7] 宋艳红, 孙琳. 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一体化进程中政府间合作机制研究[J]. 特区经济, 2017(3): 41.
- [8] 李燕萍, 郑安琪, 沈晨, 等.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人才政策评价——以中关村与东湖高新区为例(2009-2013)[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3): 85.
- [9] 潇潇, 汪涛.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大学生创业政策评价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15(10): 11.
- [10] 周楠. 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学研合作研究[J]. 管理观察, 2017(1): 52.
- [11] 傅首清.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产学研合作体系的建设与发展[J]. 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 2009(8): 42.
- [12] 梅文智. 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高新企业“产学研”合作的调查研究[J]. 兰州学刊, 2010(9): 28.
- [13] 易水.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高端平台促进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J]. 中国科技产业, 2013(8): 37.
- [14] 代丽娟, 张毅. 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金融创新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13(6): 4.
- [15] 袁金星. 加快河南开放式创新的思路及建议[J]. 决策探索, 2016(12): 34.
- [16] 袁金星. 河南加快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思考及建议[J]. 科技创新, 2016(10): 4.



引用格式:高岩. 空港型自由贸易区金融业发展的国际经验与启示[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6):94-100.

中图分类号:F83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6.014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6-0094-07

# 空港型自由贸易区金融业发展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inspiration of financial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airport free trade zones

高岩

GAO Yan

河南大学 经济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0

**摘要:**我国于2013年启动了自由贸易区建设,其中以机场为核心、临空产业为导向的空港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为外向型自贸区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然而,不完善的金融制度和滞后的金融产品开,严重制约了空港经济区向自贸区的顺利转型。国际上美国孟菲斯对外贸易区、新加坡樟宜自由贸易区与迪拜机扬自由贸易区三个成熟的空港型自由贸易区金融业发展经验和上海自贸区的金融体制改革经验启示我们,我国空港型自由贸易区金融业发展应围绕临空产业进行金融市场培育和金融产品创新,运用多元化投资方式支持空港型自贸区的初期建设,建立健全外汇和资本流动监管体系。

**关键词:**

空港型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区;  
金融业发展;  
空港经济区

收稿日期:2017-09-20

作者简介:高岩(1985—),女,河南省新乡市人,河南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金融结构和制度。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自由开放的金融制度是自由贸易区发展的重要制度条件。从国际经验来看,以大型机场为依托而建立的空港型自由贸易区,凭借其快速运送客货流的天然优势,在吸引大批贸易范围广和时效性强的产业自主集聚的同时,也促使大量物流、客流、信息流在区内不断集聚,由此衍生出强劲的金融需求。自2013年我国建立第一个自由贸易区——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之后,空港经济区所在城市如郑州、西安、成都等,都已成功地向国家申报了自由贸易区,这些城市的空港经济区遂成为自贸区迅速发展的有效载体。空港型自由贸易区的快速发展,不但需要发达的交通网络、雄厚的经济实力、高水平的人才集聚等基础条件作为支撑,更需要完善的金融体系和丰富的金融产品来作保障。本文拟在深入分析我国空港型自贸区建设所面临的金融问题的基础上,结合上海自贸区的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空港型自由贸易区的金融业发展经验与启示,以期为我国空港型自由贸易区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 一、空港型自由贸易区的内涵及其金融业服务内容

从世界范围来看,自由贸易区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界定。广义上,自由贸易区一般是指基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间自由贸易协议而建立的经济同盟组织,旨在通过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在缔约国间推行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大区域。狭义上,自由贸易区是指位于所在国境内关外,由海关进行特殊监管,以实行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为主要目的的多功能经济区域。本文研究的空港型自由贸易区或自由贸易区内的空港经济区(以下简称空港自贸区),主要是指位于大型机场内部或附近区域,利用航空运输的优势,以临空产业为导

向、享受境内关外特殊支持政策的自由贸易区,属于狭义自贸区的一种。刘渝阳等<sup>[1]</sup>提出,与其他类型的自贸区相比,空港自贸区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依托大型航空枢纽;二是政府主导推进;三是享受海关、土地、税收、金融等方面的配套支持政策;四是以大型机场为核心,并有铁路、公路、轨道或港口相连接的立体化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五是以航空运输、航空制造、生物医药等临空产业为导向。

随着速度经济时代的到来和空港自贸区在全球自由贸易地位的不断提升,国际上发达的空港自贸区一般以航空货运为核心,通过拓展转运、制造、贸易等功能集聚大量的客货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吸引了大量的物流、航空制造、贸易或加工、旅游等相关产业集聚,从而逐渐成长为以国际集散枢纽、国际贸易中心、国际加工制造中心等功能为导向的大型航空枢纽。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空港自贸区内物流、客流、信息流高度密集,并具有较强的产业指向性和交通依赖性,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国际客货流的集散、商贸、加工制造等相关产业的发展,都需要自由开放的金融制度和相对应的金融产品来保障,因此,金融流的投资消费服务就成为贯穿空港自贸区初期建设与后期发展的关键因素。

虽然每个国家空港自贸区的产生背景、发展历程、功能定位与产业发展特点有所不同,但为了满足空港自贸区大量的金融需求,其所在国都出台一系列金融政策或进行金融制度改革来支持自贸区的发展。这一方面可为空港自贸区发展提供自由开放的金融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为境内区外的金融制度创新和完善提供宝贵经验。从国际经验看,目前国际空港自贸区金融业服务内容主要包含以下三个层次:一是围绕以机场为核心并与铁路、公路、轨道、航运等相连接的交通网络等区内基础设施建设而进行的投融资方式创新;二是围绕以商贸物流、加工

贸易、航空制造、生物医药等临空产业发展而开发的银行、保险等个性化金融服务产品;三是围绕客流与区内人员的集聚所产生的个人金融服务需求。创新和完善以上三个方面的金融服务,可以为空港型自贸区经济发展打造良性的金融生态环境。

## 二、我国空港型自由贸易区建设面临的金融问题

伴随着民用运输机场体系的完善和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航空运输已深深地融入我国经济运行体系,在国际旅行、国际贸易、国内客货运输、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有62个城市依托54个机场规划或建设了63个临空经济区,其中,已经发展成规模的有北京顺义临空经济区、上海虹桥和浦东临空经济区、天津空港经济区、成都双流临空经济区、西安西咸空港新城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等。<sup>[2]</sup>目前,上海、天津、成都、西安、郑州等地已经成立了自贸区,其空港经济区都成为该省市自贸区创新发展的核心要件。但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度大、管理难度高,其临空产业发展和各类服务水平仍相对滞后,这些空港经济区迄今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存在着诸多问题,如航空客货流量不足,空港经济区内规划布局混乱,机场周边区域城市服务功能滞后,物流、电子、医药等临空产业发展落后等。出现这些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产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在金融方面尤其突出。我国空港型自由贸易区建设面临的金融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金融资源错配严重,金融产品开发跟不上实体经济发展速度。空港型自贸区以发展航空物流业为核心,然而与之相配套的物流金融、贸易融资、融资租赁类金融服务却严重不足。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不能与物流

等实体企业深度合作,不能有效结合需求创新开发新的专业化金融产品。另外,虽然近几年来国家通过新三板、股权投资基金、中小企业集合债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目前空港区内以生物医药、航空服务、旅游会展等为代表的研发型、轻资产的初创型企业还是很难找到顺畅的融资渠道。

其二,资本市场体系单一,不能提供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空港型自贸区设立的首要条件是拥有以机场为核心,并有铁路、轨道交通、公路或港口相连接的综合性交通网络。我国空港经济区都在积极地进行交通基础设施的扩建或改造,如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投入190多亿进行机场二期扩建工程,西安西咸新区计划投资700多亿用于建设轨道交通设施,这些都产生了大量的融资需求。但由于地方政府本身已债台高筑,PPP等融资模式刚开始推进,再加上拆迁安置成本高、建设周期长,都曾受困于有效的融资渠道。

第三,合理管控资本流动风险面临挑战。放松人民币跨境使用、资本项目兑换、金融服务业负面清单,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平台建设等,是上海自由贸易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发挥了先行先试的作用。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自贸区金融管制放松的同时,短期资本流动将越加活跃,人民币币值浮动也将愈加频繁,这会导致一方面跨区和跨境金融业务的复杂性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境外风险可能借道自贸区影响境内在岸金融稳定。因此,如何对资本异常流动进行有效监控,处理好“金融开放”与“金融管制”之间的关系,提前识别和消化金融风险,是金融监管者面对的极大挑战。如不快速提高监管者风险识别防控水平和能力,稍有不慎将影响我国金融稳定大局。



### 三、国际空港型自由贸易区金融业发展案例

根据国际上空港型自贸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功能导向、客货运吞吐量排名和国际影响力等因素,本文选择了以下三个有代表性的空港型自贸区作为研究案例。

#### 1. 美国孟菲斯对外贸易区

孟菲斯对外贸易区(在美国,自由贸易区通常被称为“对外贸易区”)以货邮吞吐量美国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二的孟菲斯国际机场为依托,是以进出口、转运功能为核心的国际集散枢纽,拥有极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交通网络;由于其位于北美的中心地带,不但拥有货运功能强大的国际机场,还是发达的公路、铁路、内河港口的交汇处,大批国际知名的物流、生物医药、加工制造企业选择在此落户,建立了营运中心、研发中心和运输中心等。研究发现,从对自由贸易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到各类产业的针对性金融产品研发,再到个人特殊化的金融消费服务,美国有一整套非常成熟和完善的金融体系来支撑。虽然没有对自由贸易区或是空港型自贸区出台特殊的金融支持政策,但我们仍可以从一些区域性的金融政策发现,美国发达的金融业对自贸区特别是对孟菲斯对外贸易区的腾飞起着关键的作用。

美国多元化的信贷融资政策是自贸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的基础。美国政府支持国家以高额低息贷款和发行债券、股票为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建设融资,并允许交通部门经营银行业务和彩票来筹集建设资金。在我国,虽然政策性银行也可以为大型基建项目提供低息贷款,地方政府也能通过发行债券筹措资金,但其灵活性、额度、期限严重受限,不允许交通部门通过股票、彩票或银行业务来融资,这极大地限制了我国交通网络建设和地方公用设施建设的

融资能力。另外,美国还在各级政府设立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低利率融资或信用担保等服务,并根据私人金融机构对特定产业融资服务提供信贷保险等给予私人金融机构奖励。这些灵活多样化的信贷政策让各类融资需求都得到支持,值得我国金融机构学习和借鉴。

美国特别注重丰富和创新对外贸易区内的各种金融服务,不但允许各区根据实际情况放宽或取消银行存款利率、贷款规模的限制,而且还允许在区内进行外汇的自由兑换和资金的自由出入,外商在资金使用方面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除此以外,进出对外贸易区的货物还可以作为抵押进行低利率融资,并能享受较低的保险费率,鼓励金融机构在区内进行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工具创造。孟菲斯对外贸易区以发展航空物流产业为核心,在以上这些金融政策的支持下,以 UPS、联邦快递等国际物流公司为代表,开创性地发展了一系列物流金融产品,如通过供应链管理为客货提供设备租赁、资产抵押贷款,通过货物保险、信贷保险等管理贸易风险,以及通过应收账款管理、出口信贷融资、商务信用证等业务,进行全球化的贸易信贷。<sup>[3]</sup> UPS 等国际物流企业直接开展金融业务,能够为其上下游企业提供针对性强的金融产品,特别是对于时效性强的航空物流、生物医药等产业,能够有效避免金融产品期限错配等问题,大大提高了融资效率,极大地促进了物流产业与金融业的有效结合。但是,我们也发现,虽然大型航空物流企业通过自己的信息系统直接为其供应链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解决了中小企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对于服务其他物流企业的供应商来说可能存在金融排斥问题。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企业自行设立金融业务部门是否存在集中度风险、单一行业顺周期操作风险、道德风险等,需要我们进行

深入研究。

## 2. 新加坡樟宜自由贸易区

与孟菲斯对外贸易区以进出口、转运功能为核心业务不同,新加坡樟宜自贸区是以通过保税仓储吸引商品贸易集聚的国际贸易中心。1996年,新加坡政府在樟宜国际机场内设立了自由贸易区,主要由机场物流园和航空货运中心两部分组成,承担了新加坡所有的航空物流业务。作为新加坡唯一的空港型自由贸易区,樟宜自贸区利用免税仓库吸引物流,通过商品贸易、会展、商务办公和专业机构等高效的服务设施集聚信息流,并以自由贸易区法令和优惠政策等法律制度保障区内各方的利益,使人员、资金流动更便利。后来新加坡政府逐渐意识到,单凭税收减免,樟宜自贸区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并没有太多优势,只有利用天然的地理优势并且发挥物流和国际金融市场的高效性,樟宜自贸区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贸易中心。因此,新加坡政府设计了高度开放的金融政策,对樟宜自贸区的自由贸易发展给予全方位的支持。

新加坡作为亚洲金融中心之一,一直以来积极推行金融国际化和自由化,建立了自由、开放、宽松的外汇管理体制。自1960年代起新加坡就开始逐步放宽外汇管制,如放宽银行的外汇交易机制,取消亚洲货币单位必须持有流动准备金的规定等。1978年,新加坡全面开放外汇市场,取消所有外汇管制。在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内,各种形式的合法外汇收入均可自由出入。这种高度宽松的外汇政策和较少的金融管制,还使得新加坡的离岸金融市场高度发达,许多跨国公司在区内聚集,开展离岸贸易活动。尽管离岸金融市场发展迅速,但新加坡政府通过合理有效的监管措施,并未出现资金过度流入房地产市场和非生产性领域的情况,保证了离岸金融市场的健康运行。除此以外,新加坡政府完全开放外贸、商业、租赁、直销广告和通

信等市场,除新闻、广播、公共事业外,对于其他行业均没有外资出资比例的限制。<sup>[4]</sup>从新加坡自贸区金融业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金融改革也是根据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循序渐进地进行的,并且每一次较大改革都配有合理有效的监管措施。通过设定科学合理、严格有效的金融业发展基本规则,新加坡对所有金融机构和持有资金市场服务执照的公司均可进行有效监管,通过打造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金融业竞争秩序来控制金融风险,有效促进了金融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 3. 迪拜机场自由贸易区

迪拜经济的腾飞离不开其航空业的快速发展。截至2016年,迪拜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为8365万人次,同比增长7.23%,全球排名第3,货邮运输量259.2万吨,同比增长3.5%,已经超越伦敦希斯罗机场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客运枢纽,航空业的繁荣极大地促进了迪拜物流、金融、旅游等行业的发展。<sup>[5]</sup>目前,依托于迪拜国际机场的自贸区已经成为以出口加工和转口贸易为核心的航空城,吸引了大批出口加工贸易企业来此设立生产中心、物流基地等,已有1600家涉及航空货运与物流、电子、医药、食品、珠宝和化妆品等行业的企业入驻。迪拜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与金融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为机场自贸区内公共设施建设和客货流的平稳运转提供了强大支撑。

迪拜政府一直以来非常注重金融业的发展,并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通过有效利用直接融资、发行债券、衍生品交易等金融手段,迪拜的各个产业也得到了有力的拉动。2004年,为充分发挥金融业的集聚效应,迪拜根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联邦法律和迪拜酋长国法律设立了“联邦金融自由区”,即迪拜国际金融中心。该中心奉行金融充分自由化的理念,几乎取消了一切金融限制:取消了区内一切汇

率管制政策,实现了资本项目的完全自由兑换;实行所有入驻金融机构享受零税率优惠和完全外资所有权;区内企业经营收入和利润自由汇出;区内法律规则独立,所有民事和商业纠纷或与中心内注册机构和公司有关的纠纷具有专属管辖权。虽然只有区内企业才能享受以上优惠政策,但这样一个金融完全自由的区域吸引了大批金融机构集聚,使金融资本不断涌入迪拜,不但增加了资本的流动性,大幅降低了区内企业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更形成了集聚效应,为区外的金融市场增添了活力。

但我们也应注意到,由于其高杠杆率的债务融资方式、对外资的高度依赖性和低效率的风险评估控制能力,迪拜没能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由于迪拜金融中心内国际资本不断撤离,加速了迪拜资产价格持续下跌,最终导致迪拜发生世界性债务危机。迪拜金融危机警示我们,在以航空业为基础的机场自贸区,宽松的外汇政策与资本的自由出入虽然是迪拜吸引物流、加工贸易等行业集聚的重要条件和实现其全球化和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但这也为国际游资进行资本套利提供了温床,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较大,一旦遇到风吹草动,极有可能引起大量资本出逃、资金链断裂。

#### 四、国际空港型自由贸易区提供的经验和启示

与其他类型自贸区相比,空港型自由贸易区或自贸区内的空港经济区具有较强的产业指向性,常以航空物流为核心,以航空制造、生物医药、旅游会展等临空产业为导向,区内常常集聚大量的客流、物流和信息流,因此其所产生的金融需求也具有较强的指向性。从美国孟菲斯、新加坡樟宜、迪拜三个空港型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经验来看,我国空港型自由贸易区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但需要结合我国国情借鉴上海自

贸区的金融改革经验,也需要学习国际空港型自由贸易区在提升金融功能方面的先进理念和建设模式,结合实际需求找准定位,在提升自贸区金融服务功能的同时,又能防范金融风险,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 1. 围绕临空产业进行金融市场培育和金融产品创新

空港型自由贸易区一般以航空物流为核心,并衍生出航空制造、生物医药、旅游会展等其他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产业,可通过建立专业化金融体系,让金融产品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有效解决金融领域资源错配问题,从而对空港型自贸区建设形成强有力的金融支撑。因此,应鼓励金融机构与物流企业合作,在传统物流金融业务的基础上进行业务创新,通过整合供应商、生产商、分销商、需求商的信息构建金融合作平台,为整个物流供应链提供金融支持。可通过物流企业的托运、监管、信息咨询等职能,利用金融机构专业化技术条件,开展进出口信用证、进口未来货权融资、国际赊销贸易应收账款融资或规模化的应收账款池融资等国际贸易融资业务。<sup>[7]</sup>另外,在发达国家,由于融资租赁是发展航空经济的重要金融手段,航空设备、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大型设备都可以借助融资租赁的方式来进行采购和销售,因此,可围绕自贸区重点发展的航空制造维修、电子加工或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与其相关的金融租赁业务,为第三方物流企业提供用于专用性资产投资的资金。

##### 2. 运用多元化的投融资方式支持空港型自贸区的初期建设

目前,由于我国已设立自贸区的郑州、西安、成都等空港经济区均是以大型机场为依托,建设有铁路、公路、轨道线相连接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仅机场和轨道两种交通设施的建设就需要长期大量的资金投入,单凭政府的财政

支持难以为继。自2013年起,我国开始推行公私合营融资模式,鼓励各类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政府购买、股权合作等多种方式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空港型自贸区应积极探索创新融资方式和信贷手段,通过PPP公私合营模式、发行债券和股票、创新信贷保险产品、申请国际低息贷款等,来支持区内交通基础设施与公用设施的建设。从国际经验看,通过BTO模式支持机场建设是非常可行的做法。可由航空公司向机场申请土地,用以建设符合机场发展要求的货站设施,待货站设施全部建成后,其所有权移交给机场,而航空公司则可通过获得货站硬件设施的有期限的经营权来进行营利。通过采用多元化的融资方式,充分利用民营企业的现金、技术和专业开发经验,能为政府减少大量建设成本,有效降低各方的投资风险,为空港型自贸区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

### 3. 建立健全外汇和资本流动监管体系

宽松灵活的外汇政策是吸引金融资源集聚、促进贸易便利化的基本条件。从国际型空港自贸区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出,其产业的发展具有全球性、开放性和速达性的特征,这就要求资金使用的高度自由化。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设立之初首先进行的就是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区内投融资汇兑,以及人民币跨境使用便利化等金融制度的改革。因此,应给予空港型自贸区宽松的外汇政策、利率市场化、较少的信贷规模限制和平等的国民待遇等较为自由的金融政策,以促进区内产业与

贸易的发展。然而,如果自贸区的金融业务自由化和开放度过高,监管措施尚未完善,就容易导致自贸区成为资本套利的场所,产生大量非法外汇交易,严重影响国内货币和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因此,空港型自贸区在对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经验进行复制和推广的同时,首先应建立起完善的监管体制,然后再根据实际需求逐步推广实施。

### 参考文献:

- [1] 刘渝阳,袁境. 以空港优势推动成都自贸区建设[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4(11):67.
- [2] 新华网. 两部委联合出台关于临空经济示范区发展的指导意见[EB/OL]. (2015-07-06) [2017-07-06]. [http://news.xinhuanet.com/air/2015-07/06/c\\_127990402.html](http://news.xinhuanet.com/air/2015-07/06/c_127990402.html).
- [3] 张永胜. 世界主要航空大都市发展经验及对郑州航空大都市建设的启示[J]. 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27):30.
- [4] 张建鹏,黄菁. 新加坡经验对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启示[J]. 中国上海自贸区研究,2014(3):38.
- [5] Airport Council International. Annual world airport traffic report [EB/OL]. (2017-04-05) [2017-08-12]. <http://www.aci.aero/Publications/ACI-Airport-Economics-and-Statistics>
- [6] 朱一鸣.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物流金融模式探析[J]. 金融理论与实践,2013(7):66.



引用格式:李国政.生态文明视域下和谐矿区建设路径分析——以西藏为例[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6):101-108.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6.015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6-0101-08

# 生态文明视域下和谐矿区建设路径分析

——以西藏为例

Analysis of the path of harmonious mining area construction under the view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aking Tibet for example

李国政

LI Guozheng

郑州轻工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和谐矿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体现,其逻辑结构可以概括为“一个目标、两对关系、三个责任、四大机制”:“一个目标”即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和谐、持续发展,“两对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三个责任”即经济责任、社会责任、生态责任,“四大机制”即资源调节机制、生态补偿机制、利益共享机制、长效监管机制。西藏和谐矿区建设在生态保护和治理、发展利益共享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还存在观念较为落后、监督力度不够、利益分配失衡、忽视生态建设等问题。基于内地和谐矿区建设经验,针对西藏实际,需要从资源的节约利用、矿区的生态补偿、矿产开发的利益共享,以及矿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监管等方面构建有效机制,以推进西藏和谐矿区建设,从而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矿群和谐的矿业发展格局。

**关键词:**

和谐矿区;  
西藏;  
生态文明;  
资源节约;  
生态补偿;  
利益共享;  
可持续发展

收稿日期:2017-06-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5CMZ015)

作者简介:李国政(1981—),男,河南省卫辉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西藏经济社会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sup>[1]</sup>在生态文明视域下，中国的工业化不能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必须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矿业作为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西藏矿产资源丰富，不少矿产储备量位居世界前列。但由于受到诸多因素限制，目前西藏的矿产资源并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开发。和谐矿区建设是西藏矿业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西藏融入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和谐矿区的关注度日渐增强。关于和谐矿区建设问题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直接以和谐矿区为研究对象。例如，张菁<sup>[2]</sup>分析了西部地区和谐矿区建设的影响因素和保障对策，并以新疆为例探讨了矿产资源开发的多重影响；龙涛<sup>[3]</sup>从经济指标、环境指标、社会指标、综合指标四个方面构建了青藏高原和谐矿区评价体系；杨树旺<sup>[4]</sup>从经济发展、生活质量、生态环境、资源利用、社会风险等方面构建了和谐矿区评价体系，并对若干矿区进行了评价；姚华军等<sup>[5]</sup>分析了和谐矿区建设的发生机理，并从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两个方面探讨了和谐矿区建设的策略选择；盖逸馨<sup>[6]</sup>以内蒙古为例，分析了和谐矿区建设中的问题与不足，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上述文献从不同角度对和谐矿区建设进行了分析，主要涉及评价体系和对策分析，也有一些文献分析了和谐矿区的形成机制，但对和谐矿区建设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探讨不足，对生态敏感区和集中连片贫困区域的分析很少。第二类对涉及和谐矿区建设某些方面的问题进行

了探讨。例如，乔繁盛<sup>[7]</sup>分析了绿色矿山建设的路径与理念；杨俊鹏<sup>[8]</sup>分析了新常态对绿色矿山建设的影响，并提出了解决途径；张鹏<sup>[9]</sup>对矿山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了阐述；张倩等<sup>[10]</sup>、程倩等<sup>[11]</sup>运用博弈论分析了矿产开发中的生态补偿行为，认为绿色矿山是和谐矿区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内容，也是未来矿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但上述文献在分析绿色矿山建设时，未将绿色矿山置于和谐矿区建设的大背景下加以探讨。鉴于此，本文拟在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分析和谐矿区建设的内在逻辑，以西藏为例阐述和谐矿区建设的机制与路径，总结和谐矿区建设的一般规律和特殊地区的实践经验，以期为全国其他类似地区的和谐矿区建设提供借鉴。

## 一、和谐矿区建设的一般逻辑

矿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据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我国目前有建制市的矿业城市 178 座，非建制市的矿业城镇 246 座，人口超过 3 亿，其 GDP 占全国 GDP 的 40% 左右。<sup>[12]</sup>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和谐矿区建设，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将构建和谐矿区上升到国家层面。随后，各地区纷纷开始探索带有区域特征的和谐矿区建设。

一般认为，和谐矿区是指矿区与周边的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矿业开发做到矿产资源利用集约化、开采方式科学化、生产工艺环保化、企业管理规范化、矿区社会和谐化、矿区环境生态化的矿区。<sup>[13]</sup>和谐矿区的特征是以生态文明的理念和新型工业化发展方式贯穿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全过程，以和谐平安和科学发展的理念统领矿区生产运行的各个方面。

生态文明规定了和谐矿区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指必须统筹协调矿业开发与环境保护

的关系,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开发矿产资源,打造绿色矿山、生态矿山;人与人的和谐是指在矿业开发中,必须处理好各方利益,统筹协调矿企与地方、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矿地和谐与矿群和谐,共享矿业开发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和谐矿区建设的逻辑结构,可以概括为“一个目标、两对关系、三个责任、四大机制”,具体见图1。“一个目标”是指矿业开发最终要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和谐,持续发展的目标;“两对关系”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三个责任”是指在矿业开发过程中,矿企应担负的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生态责任;“四大机制”是指在矿业开发过程中,需要建立资源节约集约的调节机制、矿区生态恢复治理的补偿机制、化解矛盾纠纷的开发利益共享机制,以及矿业持续发展的长效监管机制。

和谐矿区建设的逻辑结构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内容构成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其中,“一个目标”决定了“两对关系”,后者又决定了“三个责任”和“四大机制”,人与自然的和谐涉及到矿企的生态责任,人与人的和谐涉及到矿企的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鉴于西藏特殊的生态环境、历史传统和宗教文化传统,矿企的社会责任和生态责任极为重要,实施有效的政策机制来推进西藏和谐矿区建设已成为政界和学界的共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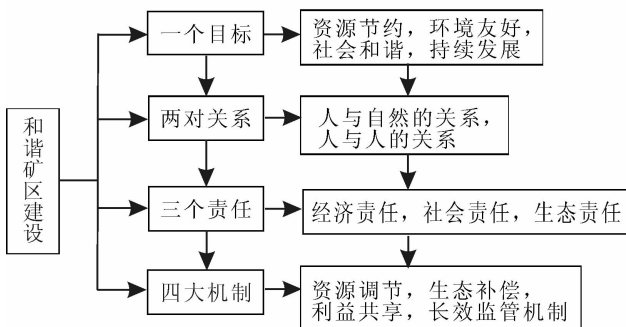


图1 和谐矿区建设的逻辑结构

## 二、西藏和谐矿区建设的成就与问题

西藏和谐矿区建设虽起步较晚,但在生态保护和治理、矿业发展利益共享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

其一,矿区生态保护和治理方面。鉴于西藏地区生态的脆弱性,西藏矿业开发对生态保护的要求比内地更高,任务更重。近些年西藏自治区将生态文明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框架中,不断加大生态补偿力度,取得了积极成效(见表1)。目前西藏已有560个村、54个乡镇、2个县被命名为自治区级生态村、生态乡镇、生态县。<sup>[14]</sup>例如,拉萨市实施“环境立市”战略,强调矿山开采过程中须采取种植植物和覆盖等复垦措施,妥善处理露天坑、废石场、尾矿库等永久性坡面,力争到2020年,历史遗留矿山开采破坏土地复垦率达到50%以上,新建矿山要做到边开采、边复垦,破坏土地复垦率达到85%以上。<sup>[15]</sup>拉萨市还建立了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汇报制度和安全生产协管员制度,加大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的缴存力度,对矿企制定严格的生态恢复保证金制度,实施矿山生态环境年报和检查制度,加强对矿区生态环境的监管<sup>[16]</sup>,取得了有效进展。

除了直接确立矿业绿色发展战略外,将生态补偿与精准扶贫脱贫相结合,实施生态脱贫,是西藏矿业绿色发展的一大特色。构建参与式生态补偿机制,让当地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农牧民转为生态保护人员,并将聘用贫困人口转为生态保护人员作为重点生态转移支付测算的重要因素。对生态补偿脱贫岗位实行精准控制,对已经实现稳定脱贫的农牧民要腾退岗位。在贫困地区开发能源资源的,可以尝试给居民集体股权进行补偿。例如曲水县实施了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示范工程,通过带动当地的群

众参与工程建设,直接和间接实现增收 217.8 万元<sup>[17]</sup>,既解决了灌溉问题,又保障了农业增产增收。

其二,矿业发展利益共享方面。在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共享型经济发展方式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其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使经济发展收益能够得到社会共享。实际上,西藏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很好地诠释了这一模式。具体到西藏矿业发展,建立利益分享的新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构建西藏和谐矿区的要求。在和谐矿区建设实践中,西藏一些地区和矿企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矿业利益共享和矿地和谐的有效模式与方法(见表2)。以西藏华泰龙公司为例,该公司隶属于中国黄金集团,位于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甲玛乡。长期以来,该公司充分履行中央企业的政治责

任和社会责任,致力于构建和谐矿区,在用工本地化、精准扶贫、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治理等方面,都进行了大量实践,社会效益显著。例如,成立甲玛工贸公司,实现了当地松散运输力量的整合和农牧民的增收;再如,在驻地村种植蔬菜大棚 44 个,并对甲玛乡政府原有的 24 个蔬菜大棚分两期进行了重新改造,年实现利润 10 万元以上。<sup>[18]</sup>

可以看出,通过地方政府和矿山企业的共同努力,西藏和谐矿区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囿于自然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发育程度、现代化发展理念和行政管理水平等方面与内地仍有较大区别,虽然自治区政府高度重视,但西藏和谐矿区建设起步较晚,观念较为落后,很长时期内监管力度不够,矿区开发过程中利益分配失衡、忽视生态建设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因此,构

表1 近年来西藏生态补偿取得的成就

补偿层面	具体内容
政策层面	颁布了《西藏自治区“十三五”时期生态补偿脱贫实施方案》《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关于建设美丽西藏的意见》《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考核办法及实施细则》《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责任规定》等政策文件
资金层面	“十二五”期间,西藏总计投入生态补偿资金 147 亿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范围由 8 个县扩大到 18 个县,并计划“十三五”期间投入 4800 多万元,在那曲地区中扎县、日喀则市定结县和山南地区浪卡子县试点开展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机制,通过资金补偿方式,西藏陆续建立起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草原生态保护奖励补助、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等机制
机制层面	建立因采取湿地保育、湿地限牧等措施而对农牧业发展造成损失的常态补偿制度,农牧民协议管护与专业管护相结合的长效管护机制,促进湿地资源的长效保护

资料来源:根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网、西藏环境保护厅网站等整理

表2 西藏部分地区和谐矿区建设的利益共享方式

地区	和谐矿区利益共享的主要内容
山南地区曲松县	实施“经济矿山、绿色矿山、安全矿山”三大战略,成立了矿山协调会,针对矿产开发带来的粮食减产,多次召开减产补偿费协调会,最终,西藏矿业等 3 家矿企和罗布莎村、朱麦莎村签订了粮食减产补偿协议,罗布莎村和朱麦莎村分别得到补偿金 10.5 万元和 40 万元
拉萨市尼木县	确立调解信息员制度,每半月对各矿区矛盾纠纷排查一次,对纠纷当事人进行法制、政策教育和思想宣传,达到“调解一处纠纷,教育一片群众,构建一方和谐”的效果
拉萨市墨竹工卡县	协调矿群利益关系,走出一条“政府选人、企业出资、学校培养、企业安排就业”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将矿企的部分运输业务交给个体运输户承担,既减轻了企业负担,又提高了农牧民收入
昌都玉龙铜矿	培育“矿业报国,振兴民族经济”和“六个协调发展”的企业文化,制定具体政策,改善当地卫生、教育、公路建设和农牧民生活条件

资料来源:根据西藏政府网、西藏日报等资料整理



建西藏和谐矿区建设的机制和路径,推动西藏和谐矿区持续健康发展,势在必行。

### 三、西藏和谐矿区建设的机制和路径构建

在2012年前后,国土资源部在内蒙、贵州、云南、青海、山西等一些资源富集地区已经开展了和谐矿区建设的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就(见表3)。内蒙古自治区非常重视和谐矿区制度体系建设,出台了一系列的有关和谐矿区建设的规划方案,在鄂尔多斯和锡林郭勒两盟市16个矿山试点的基础上,构建了以移民搬迁补偿和生态补偿制度为核心,以当地政府和居民入股矿山为补充的利益分配机制,严格准入矿山项目,探索建立事前风险排查、事中相机处置、事后积极调解的多层次矛盾化解机制,取得了较大成效。贵州、云南等地除了建立矿业开发收益共享机制外,还致力于打造以矿山地质公园为主题的绿色矿山。青海省明确规定矿产开发必须使群众受益,完善征地补偿机制,鼓励当地群众参与矿业开发全过程,促进矿企发展

多种非矿产业,完善产业结构。山西省通过“一矿一村、一矿一厂、地下转地上”的策略,要求一个地下煤矿建设一个地上非煤产业,调整产业结构,增加群众收入。内地和谐矿区建设经验无疑为西藏和谐矿区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之处。

西藏是典型的边疆民族地区和集中连片贫困区域,同时矿产资源储量在全国处于前列,若适当开发,会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若开发不当,则会引起相反的效果。建设和谐矿区,中央有要求,地方有需求,群众有诉求。鉴于西藏地区的特殊性,西藏和谐矿区建设需要从思想上重视,从机制上创新,既要汲取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又要结合自身实际,构建促进西藏和谐矿区建设的有效机制和路径,探索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生态脆弱区和谐矿区建设的特色之路。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 1. 构建资源节约集约的调节机制

在当前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的背景下,西藏矿产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凸显。实现矿产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不仅是缓

表3 若干典型地区和谐矿区建设的政策与内容

地区	和谐矿区有关政策	和谐矿区建设内容
内蒙古	《和谐矿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	建立以移民搬迁补偿和矿区生态恢复补偿制度为核心、以矿区基层政府和居民入股矿山企业为补充的利益分配机制
贵州	《关于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兼顾“三者”利益建设和谐矿区的意见》	建立“地方政府、矿山企业、矿区群众三者利益共享”的长效机制
山西	《关于贯彻中发[2008]1号文件精神 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实施意见》	按照“一矿帮扶一村”模式,坚持“以煤补农”,开展“结对帮建新农村活动”
青海	《关于建立矿产资源开发 带动当地群众收益机制的若干意见》	提出调整财政支出和收入分配结构,强化矿山企业社会责任,多渠道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西藏	《〈关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建设和谐矿区的意见〉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创新社会管理,化解各类矛盾,建设和谐矿区,通过企业为村民垫资入股推进企、地文化融合
云南	《关于建立矿村共享资源开发成果新机制的意见》	提出资源节约共创、环境友好共保、开发成果共享的“三共机制”
陕西	《关于推进和谐村矿建设的工作方案》	通过村矿共建、共治、共享三种途径,加强村、企联合党建机制、村矿协调机制和全面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制度三项建设,构建和谐矿区

资料来源:根据各省和谐矿区建设规划整理

解矿产资源压力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西藏资源开发和生态安全目标的唯一选择。

其一,应树立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观,走内涵式集约化发展道路。应重视矿业科技创新在矿产开发中的作用。如果说矿产资源管理创新是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制度保障,那么矿产资源开发创新则是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技术支撑。目前西藏仅有少数骨干矿企生产技术达到比较先进的水平,大部分矿企的生产技术水平还有待提高。

其二,应严防乱挖滥采,规范采矿秩序。目前西藏的矿产资源虽然没有进行大规模开发,但长期以来小规模无序开发不断,大矿小开、圈而不探等浪费资源的现象比较严重,给当地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紊乱。因此,应严格执行西藏自治区“一支笔”制度,优化矿业布局,提高采矿的技术水平、安全水平和环保水平,杜绝盲目开发和粗放开发。

其三,应鼓励土地的集中利用、复合利用和立体利用,以及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高效利用、循环利用。鉴于西藏地质环境的复杂性和脆弱性,应特别重视西藏矿产开发中的地质环境治理,按照“点上开发、面上保护”的原则,实施“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循环利用模式,将矿产开发与生态保护相结合。

其四,应加强矿产资源整合,有条件地引进国内大型矿山企业参与西藏资源开发。目前,西藏自治区内已有一些央企入藏开发矿产,如中国黄金集团、中国铝业集团等,但数量有限,西藏本地矿企在资金、技术、理念等方面与央企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应进一步优化区内矿业权格局,整合矿业资源,推动西藏矿业走现代化、集团化、规模化发展道路。

## 2. 构建矿区生态恢复治理的补偿机制

矿山企业是和谐矿区建设中最重要参与者。矿区出现不和谐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矿企

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将财富拿走、将污染和贫困留下,由地方埋单。绿色矿山是基础,和谐矿区是根本,矿业开发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生态破坏,进行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对于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非常重要。

其一,在前期参与式生态补偿机制基础上,应根据西藏生态系统的特殊性,分领域对森林、草原、水资源等进行差异化生态补偿,制定和完善相应的补偿标准和体系,防止“一刀切”式的生态补偿。同样面积的森林和草原,其生态价值西藏要高于内地,一旦遭到破坏,恢复将更为困难。应进一步扩大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专项资金规模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县的范围,力争将涉及西藏禁止和限制开发区域的所有地区全部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范围。

其二,应推进绿色矿山建设。绿色矿山是一种新型矿业发展模式,是生态文明理念运用于矿业开发的具体体现。应以“资源利用集约化、开采方式科学化、企业管理规范化、生产工艺环保化、矿山环境生态化”为目标来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强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优化矿业用地方式,落实企业社会责任,加大生态治理力度。<sup>[19]</sup>完善矿山环境治理恢复的保证金制度,推进矿山复绿复垦行动,解决好矿区残余资源和历史遗留问题。

其三,应因地制宜、分区补偿。按照生产方式西藏分为农区、半农半牧区和纯牧区,根据这三类地区的生态环境、地理特征、矿产资源特点,制定生态补偿政策和标准,推进受益地区与保护地区通过资金、产业、人才等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方式建立地区间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 3. 构建化解矛盾纠纷的利益共享机制

矿区是否和谐,利益分配是关键。矿产资源开发的经济利益被矿区各方分享,矿区群众

生活水平得到实质性提高,无疑将会显著促进和谐矿区建设和西藏社会的和谐稳定。

目前在西藏不少矿区,“参与式开发”的特征并不明显,缺乏吸纳农牧民参与矿业项目开发的实施机制。正如杨明洪指出的,长期以来,西藏矿业开发存在的“局外人决策、局外人参与”现象较为严重,没有很好地将矿业开发与矿区农牧民的增收、就业结合起来,存在着矿区群众参与度和积极性低下的问题。<sup>[20]</sup>马戎在考察援藏项目时也指出,无论是中央部门还是各省市政府,都与大型建筑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甚至就是政府下属的企业,这样就难以排除在立项时这些部门会考虑到让下属的建筑企业承接这些项目的可能性。<sup>[21]</sup>内地矿企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想,主要使用内地工人,当地农牧民被排斥在外,矿业出现“回飞式开发”现象,加之固有的习俗差异,很容易引起矿群矛盾,破坏民族团结和矿区稳定。因此,必须构建矿产资源开发的利益共享机制。

第一,应建立矿群矛盾调节组织,形成地方政府、矿企、矿区农牧民合作议事机制。矿群发生矛盾冲突时,政府应及时介入和引导,企业和农牧民之间应通过协商谈判化解矛盾,以形成长效机制和共赢局面。另外,矿企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还需要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

第二,应强化参与式开发机制。应坚持“用工本地化”原则,吸收当地农牧民参与矿业开发过程,这样在对农牧民“输血”的同时,还可增强其“造血”功能和自我发展能力。

#### 4. 构建矿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监管机制

转变西藏矿业发展方式,推动西藏矿业可持续发展,是构建和谐矿区的必然要求。建立矿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监管机制,就是要对矿业开发的整个过程加强监管,完善开发的体制机制,提高矿业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发展生态矿业和绿色矿业,实现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第一,应强化矿山储量动态监督。各类矿山均应当设立地质测量机构和人员,配合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对矿山开采定期进行测量、核准和检查。应强化矿产督察员的执法监督力度,建立资源综合利用申报认定制度,引导和强制企业在采矿、选矿、冶炼等环节上切实做到矿产资源综合利用。

第二,应加强矿产开采回采率的管理,对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共伴生资源综合利用率、土地复垦率进行考核,改变以前的运动式、突击式、集中式整治,确立常态化的稳定监管,加强监督巡查,打击无证开采、乱挖滥采。

第三,应加强对矿企落实社会主体责任的监督管理,重点监督矿区农牧民民生(包括农牧民的安置和补偿、农牧民增收、农牧民生活的便利等)是否得到改善;应监督矿企是否付诸行动去改善生态环境,提升技术水平,做到规范开发。

## 四、结语

作为新时期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微观基础,和谐矿区建设成为各地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抓手。西藏作为我国重要的边疆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重要的资源储备基地,其矿区的健康和谐发展关系着国家能源资源的持续安全与有效保障。因此,西藏的矿业开发必须高度重视和谐矿区建设。

西藏和谐矿区建设具有明确的目标,它是“中国特色、西藏特点”发展路经的组成部分,是西藏特色矿业发展道路的应有之义,是西藏矿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西藏和谐矿区建设需要通过构建一系列的机制来实现,它们是和谐矿区实现的内在机理、具体要求和重要保障。

西藏和谐矿区建设需要地方政府、矿企和矿区农牧民三方共同作出努力,虽然三方在经

济发展过程中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但在矿区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上有一致的利益。因此,应在政府的规划与引导下,重视农牧民的发展权与合理诉求,优化矿企的发展环境,落实矿企的社会责任。另外,还应充分发挥西藏矿业协会的功能与作用,加强行业指导,形成政府主导、协会推动、矿群合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化发展格局。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EB/OL]. (2017-10-18)[2017-10-20]. news.sina.com.cn/0/2017-10-18/doc-ifymyxw3516456.shtml.
- [2] 张菁. 西部和谐矿区建设研究[D].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0.
- [3] 龙涛. 青藏高原和谐矿区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初探[J]. 中国矿业,2013(12):73.
- [4] 杨树旺. 基于AHP模型的和谐矿区评价研究[J].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16(1):74.
- [5] 姚华军,朱清. 关于和谐矿区建设的认识和思考[J].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3(1):4.
- [6] 盖逸馨. 内蒙古自治区推进和谐矿区建设的调查和思考[J]. 中国矿业,2015(5):24.
- [7] 乔繁盛. 将生态文明贯穿于绿色矿山建设全过程[J]. 中国矿业,2013(1):53.
- [8] 杨俊鹏. 新常态下我国绿色矿山建设面临的问题与解决途径[J]. 中国矿业,2017(1):67.
- [9] 张鹏. 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矿山企业社会责任探讨[J]. 中国矿业,2015(S1):234.
- [10] 张倩,曲世友. 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博弈分析[J]. 中国矿业,2013(8):40.
- [11] 程倩,张霞. 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及各方利益博弈研究[J]. 矿业研究与开发,2014(3):127.
- [12] 姚华军,朱清. 关于和谐矿区建设的认识与思考[J].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3(1):4.
- [13] 王琼杰,史京玺. 扬帆起航风正顺——我国和谐矿区建设纪实[N]. 中国矿业报,2014-04-22(B4).
- [14] 王菲. 我区实施10项生态安全屏障工程[N]. 西藏日报,2015-03-27(1).
- [15] 田沙沙. 新建矿山要边开边复垦[N]. 西藏商报,2014-05-23(11).
- [16] 焦建俊. 扎实推进拉萨市和谐矿区建设[N]. 西藏日报,2010-08-28(03).
- [17] 国新办. 实施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工程,农牧民增收致富获保障[EB/OL]. <http://www.scio.gov.cn/m/34473/34576/34516/Document/1495645/1495645.html>.
- [18] 新华网. 精准扶贫奖案例申报——中国黄金集团[EB/OL]. (2016-10-20)[2017-04-23]. [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16-10/20/c\\_1119711701.html](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16-10/20/c_1119711701.html).
- [19] 刘玉强. 建设绿色矿山,发展绿色矿业是中国矿业发展的必由之路[J]. 中国矿业,2012(21):2.
- [20] 杨明洪. 提高对口支援西藏的有效性分析[A]//西部发展评论[C].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95.
- [21] 马戎. 重思援藏项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靳薇《援助政策与西藏经济发展》序[J]. 青海民族研究,2011(4):61.